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楊婉瑩 博士

參政還是工作？

世代差異下民進黨女性黨工對黨職工作的想像

研究生：林煒智 撰

中華民國一零三年六月

謝 辭

碩士班三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至今算是告一段落了。認真來說，這篇論文從題目發想，到最後完成寫作，整整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開始的起點是碩二修習楊老師的性別政治課程時發想，期間經過半年對於研究問題的修正與理論基礎的補足，最後在 2013 年的 5 月完成論文大綱的發表。後來又經過一整年來的資料蒐集與分析撰寫，2014 年的 6 月我完成了這篇雖稱不上是巨作，但也花盡心思的碩士論文。這篇論文得以完成，首先我要感謝的就是我的指導老師，楊婉瑩老師。

楊老師不論是在理論基礎或資料分析上，都給我非常多的實質建議。特別是老師總是把我的論文看得非常仔細，修改過不同版本，老師總能記住我之前寫了什麼，之後又改了什麼，非常感謝老師的用心。同時，老師雖然公務繁重，但也總能快速的幫我解除論文寫作上的種種疑惑。在碩士論文撰寫的道路上，我也常因寫作遇到瓶頸，感到挫折，但楊老師總是即時給我鼓勵打氣，這成為我非常重要的寫作動力。

除此之外，我也要萬分感謝我的兩位口試委員，林瓊珠老師與范雲老師。瓊珠老師算是開啟我對學術研究產生興趣最重要的啟蒙老師，大學時代與研究所時代有幸能參與老師的研究計畫，最後還能使用老師計畫中的資料於我的論文中，瓊珠老師給我的協助不在話下。特別是在我找尋受訪者的過程中，瓊珠老師積極地透過管道幫我引薦幾位關鍵的受訪者，這是開啟我資料蒐集的重要一步，非常感謝老師的大力協助。

在此也要再次感謝，范雲老師能夠擔任我的口試委員，范老師非常親切，並且在我論文大綱以及最後論文口試時，從社會學觀點都給我非常重要的修改建議。這本論文得以完成，范雲老師的指導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太陽花學運期間，我曾在現場巧遇老師好幾次，但因為害羞，不太好意思跟范老師打招呼。不過，其實我非常想告訴老師，我非常敬佩您。

最後，我必須要感謝的還有，政大呂阿嘎、新店白歆惠(又名學運解放「均」)、三重衝組黃，三位一起在太陽花學運期間不斷前往支援的好夥伴。雖然我們都因為學運讓論文寫作進度停滯不前，但最後大家也都拼命追趕進度，大家一起在學校寫論文的日子是我碩士生涯中，不可抹滅的重要回憶，當然啦，還有 couple 雙人組。

此外，我也要特別感謝博士班的諸位學長姊，有珮婷學姊、雅雯學姊及冠成學長，感謝你們不論在研究案上或論文寫作上對我的鼓勵與指導。當然還有定暉，謝謝定暉在我論文寫作後期最忙碌的時候，幫我多分擔研究案的工作，甚至有次還跟我說，「你先放假一天，交給我來處理」，這句話至今讓我印象深刻與感動，非常感謝你的體貼。

同時，也要感謝凱凌學姊、孟哲學長及崇漢學長，在我碩士班修課期間給我的協助與指導，這對一位剛從大學進入研究所的我來說，有你們的提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最後的最後，我還要特別感謝幾個人，大學好友政均、老屁、裕盛等，謝謝你們在我寫作過程中時常找我出去看電影啊、閒聊一下之類的，讓我不至於時常處於緊繃的狀態，當然也還要謝謝 PoHan 啦。

最後的最後的最後，要感謝我爸媽，雖然你們還是一直不斷催促我要趕快畢業，但最後還是非常包容我，讓我順利在學校念了三年書，這段日子謝謝你們的支持。真的是最後了，我一定要感謝我所有的受訪者，謝謝你們接受我的訪談，也熱心推薦其他受訪者給我，謝謝民進黨的姊姊們。

林煒智，寫於宜蘭冬山老家

2014 年 7 月

參政還是工作？

世代差異下民進黨女性黨工對黨職工作的想像

摘要

本研究基於女性參政的理論基礎，主要探討從事政治幕僚工作的民進黨女黨工，看待黨務工作的看法，除了政治參與的意涵外，還存在何種可能？此外，本研究也試圖從性別世代的角度理解，不同世代的民進黨女黨工看待黨務工作有何認知差異。關於世代劃分，本研究初步透過民主化歷程、民進黨重要的發展階段以及台灣婦運發展經驗，將民進黨黨工區分出兩個主要世代。在世代概念操作上，切劃的時間點是以受訪者出生年在 1971 年前後為界，1971 年及以前出生者為九 0 前黨工世代，1971 年以後出生者則為九 0 後的黨工世代。

研究結果發現，如同世代研究的理論預設，時代的改變透過經歷不同政治民主經驗以及不同的性別意識氛圍影響，形成了民進黨兩個世代女黨工對工作的認知差異。對年長黨工而言，她們看待黨務工作似乎較偏向「政治參與取向」，而九 0 後黨工則較傾向「工作職業取向」的認知。九 0 前世代偏重政治參與的認知，是因為這群黨工們所處的時代背景主要是威權轉型階段，她們看待「政治」的角度經常是懷有一種高度的價值目標。而九 0 後黨工成長於民主時代，「政治」不再是一種高不可攀的精神價值，而是存在於每個人日常中的生活議題。民眾對「政治」的想像，也就隨著民主制度的落實逐漸與前世代的看法產生變異。時代的遞嬗改變了政治，時代同時也對民進黨的組織制度產生影響，隨著工作條件與環境改變，這些因素都使傳統政治工作中充滿的政治味被沖淡許多。

透過 90 年代以後的性別平等改革，台灣女性參與政治不再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在傳統公私領域逐步鬆動的界線下，女性面對「政治」與面對政治「工作」便與前一代有著截然不同的認知圖像。然而，雖然兩個世代面對不同時代的性別經驗有所差異，但兩個世代也並非截然不同，女性的政治參與在兩個時代中，同樣需要面對工作與家庭間的兩難問題，只不過兩個世代的處理方式不盡相同，而這也再次突顯出兩個世代黨工看待黨務工作的角度差異。

關鍵詞：女性政治參與、民進黨黨工、性別世代、工作認知、世代差異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章節安排.....	4
第二章 文獻與理論.....	5
第一節 從政治參與到女性政治參與.....	5
第二節 從政治世代到性別世代.....	14
第三節 理論建構.....	21
第三章 研究現象與研究方法.....	30
第一節 研究現象說明.....	30
第二節 研究方法.....	37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說明.....	41
第四章 黨務工作的差異化認知.....	43
第一節 民進黨黨工的初探.....	43
第二節 政治理想與工作現實間的拉扯.....	57
第五章 新與舊之間的價值轉變.....	72
第一節 兩個世代的生命經驗差異.....	72
第二節 世代認知差異的解釋.....	90
第三節 跨世代的生命經驗：價值的變與不變.....	113
第六章 結論.....	118
第一節 研究結果.....	118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發展.....	121
附錄.....	122
參考文獻.....	131

圖表次

圖次

圖一、女性黨工對黨務工作想像認知圖.....	26
圖二、兩個民進黨女性黨工世代的劃分.....	29
圖三、民進黨中央黨部架構圖.....	30
圖四、研究架構圖.....	42
圖五、兩種工作認知取向的條件指標.....	70
圖六、政黨變革與黨工特質差異的示意圖.....	99

表次

表一、民主化歷程、民進黨重要發展事件與性別關係重點整理.....	25
表二、民進黨中央黨部黨工相關法規整理.....	34
表三、訪談對象一覽表.....	39
表四、不同年齡層的男女黨工人數比較.....	45
表五、不同世代男女黨工的交叉比較.....	45
表六、黨工黨齡與在黨部工作的長短.....	46
表七、黨齡與年齡層交叉比較.....	47
表八、教育程度三分類與男女黨工的比較.....	48
表九、黨工加入民進黨的原因之複選題分析.....	49
表十、黨工加入民進黨原因與性別間的複選題交叉表分析.....	50
表十一、黨工加入民進黨原因與教育程度的複選題交叉表分析.....	51
表十二、黨工加入民進黨原因與黨齡長度的複選題交叉表分析.....	52
表十三、黨工加入民進黨原因與世代間的複選題交叉表分析.....	53
表十四、本研究中的世代與黨齡層的時間概念之異同比較.....	55
表十五、黨工加入民進黨選擇最多的三個因素排名.....	56
表十六、兩個世代黨工進入民進黨原因與看待工作認知整理.....	69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女性政治參與在性別政治研究中，一直是重要的研究主題。因為過去的時空背景，女性總是難以進入或參與公共的政治領域討論，此種現象除了存在現實社會中，政治學界同樣有著類似的問題。雖然隨著婦女運動興起及社會外部事件等因素影響，女性政治參與情形已明顯改善並逐漸獲得各界重視 (Tolleson-Rinehart and Carroll, 2006)，但社會上對於女性政治參與仍多將研究對象放置於女性政治人物，如立法委員、各級民代或各級行政官員身上，這樣的結果也不乏散見於相關性別政治研究中 (Mansbridg, 1999；唐文慧與王怡君，1999；王名駿，2005；陳淑蘭，2010)。

不過，性別政治研究除多聚焦討論女性政治人物的政治參與，也有不少研究討論女性和國家間的關係 (Mackinnon, 1989)、女性公民身分的討論 (Young, 1989) 等。相較之下，性別在政黨政治 (gender and party politics) 領域的研究成果卻略顯不足。在幾個性別與政黨的相關研究中，如 Joni Lovenduski、Pippa Norris (1993) 以及 Lisa Young (2000) 等人也曾多聚焦討論不同國家的政黨內部女性候選人的產生，或談性別中的政黨認同差異等主題。但是對於政黨內部中，影響一個政黨是否能正常運作且不可或缺的重要人事—黨職 (務) 工作人員 (簡稱：黨工)，相關研究則顯少著墨。

探究這類型研究較少的其中原因可能在於，黨工從事黨職工作在性質定位上，可能同時存在雙重性或模糊性的問題。首先，黨職工作不會完全被視為一般性質的工作，因為政黨是一個政治團體，其目標之一是追尋政治權力或推行某些特殊政策，進而爭取政治地位 (游清鑫，2010)。因此，黨務工作自然有許多工作內容會涉及政治層面的核心問題，如協助黨的政策擬定、選戰規劃與分析或配合黨

的組織動員等，所以黨務工作相較其他非政治性工作有其特殊性。然而，若從廣義角度來看，先不論是否牽涉到政治，政黨工作也像各種行業一般，提供給參與其中的人員一份薪資報酬，因此黨務工作也是各行各業中的一種「工作」類別。除此之外，黨務工作中雖存在政治性的工作內容，但也有牽涉到如行政庶務輔助、行政管理、升遷規劃或工作滿足等一般性的工作特質。

因此，若要從黨職工作層面探討女性黨工參與政治的情形，研究者往往需要面臨此種政治參與定位的雙重性問題。也就是，黨務工作除了政治性的工作特質可能讓黨工有參與政治的認知外；另一方面黨務工作也是一種工作行業，黨工似乎也可選擇將黨務工作視為一種工作認知。所以當性別政治研究，觸及女性在政黨領域的參與情形，此種特殊性便容易被研究者忽視，進而研究成果較為不足。

然而，正因為黨務工作存在上述工作性質的特殊性，引發了本文的研究動機。因為該工作性質的雙重特殊性，可能使黨工對於黨務工作的認知圖像，至少存在兩種不同的認同選擇。不過，本研究也認為，雖然黨工對黨務工作的認知可能有其選擇差異，但兩種認知選擇也並非是互斥關係，兩種看法也可能並存，只是認知的內涵與程度上可能不盡相同。因此，黨工對於黨務工作存在的想法與認知是本研究感興趣的地方之一。

另外，本研究將焦點鎖定為女性黨工而非男性，除因許多女性參政的相關研究都聚焦女性政治人物，對非傳統檯面上政治人物的女性政治參與研究相對較少外，過去習慣將「政治」二分成公（public）私領域（private），導致女性角色受到父權結構為主導的社會所限制，因而女性或被忽視於社會，或被排除於政治的公場域之中，甚至女性的足跡只在於私人的家庭領域中才得以看見。如今女性走出私領域並參與政黨工作成為黨工，接觸許多政治相關事務，比起過去政治就是男性活動場域而言，女性黨工相較男性參與黨務工作，更有打破過去公私領域劃分的深層意涵。不過，女黨工參與黨務工作雖有其特殊意義，但當女性走入傳統以男性為主的政治性工作時，黨務工作對女性又會遇到何種問題？女性所面臨的問題又可能對工作的看法產生何種影響？這也是本研究鎖定女性黨工為研究

對象的重要因素。

黨務工作的特殊性可能影響黨工對黨務工作的認知有不同看法外。另一方面，女性黨工對黨務工作的看法差異，可能還受到世代（generation）差異的影響。因為在探討人們的價值觀或態度差異時，「世代」差異往往提供一個重要的解釋途徑（楊婉瑩，2011）。在政治社會化的討論中，世代之所以對個人價值觀或行為差異具有解釋力在於，一群人的自我性格或態度價值的形成期（formative years），相同世代的人會經歷相同的歷史事件，透過經驗的共享，相同世代的人會產生相似的看法，並與其他世代有著態度上的差異（Jennings,1987:368）。因此，不同世代的女黨工，勢必經歷不同的歷史背景、社會上不同的性別價值觀以及該政黨在不同階段上的發展關係，這些世代的共同記憶將可能影響女性黨工對於黨務工作的看法與認知。故本研究試圖從世代角度切入，從而了解不同世代的女性黨工對於黨務工作的看法是否有所差異？

本研究以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女性黨工為研究對象，選擇民進黨而非中國國民黨的原因在於，相對國民黨來說，民進黨經歷了黨外時代的歷史身分，也就是這群民進黨黨工經歷了從非正式組織階段，到 1987 年的解嚴前組黨，再到 2000 年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從過去長期的在野黨變成執政黨，再經過前總統陳水扁八年執政後，於 2008 年再度政黨輪替失去政權。面對種種歷史事件發生，民進黨中不同世代的女黨工，對黨務工作的看法是否有所差異，是本文研究旨趣所在。

另一方面，國民黨與民進黨對於黨工的招募方式亦有其本質上的差異。國民黨黨工招募方式是透過招考而來，¹而民進黨除了有透過人際關係的牽引外，也曾舉辦公開招募的經驗，因此就進入政治工作場域或參與的動機上，民進黨可能相較國民黨黨工來的多元。基於上述兩點考量，本文將研究對象放置民進黨黨工進行探討。基此，本研究同樣想探討女性政治參與形式，但不同過去多專注女性政治人物或一般民眾的傳統政治參與情形，本研究將焦點擺在政黨中相較基層的

¹國民黨黨工招募主要有兩階段，一是筆試；二是口試，第一階段成績佔 40%、第二階段成績佔 60%（國會助理第一階段成績佔 60%、第二階段成績佔 40%）。詳情參閱中國國民黨聘用人員甄試簡章，<http://www.kmt.org.tw/page.aspx?id=31&aid=20519>（查詢日期：2014 年 6 月 15 日。）

女性政治工作者的政治參與認知。因此，本研究嘗試回答以下問題：

- 一、政黨提供的黨務工作，除了政治參與外，還有什麼可能？對民進黨女性黨工來說，從事黨務工作的意義究竟是一種比較偏向政治參與類型？還是比較有一種單純的工作參與意義？
- 二、就不同認知取向而言，是否有程度上或內涵上的差異？
- 三、不同世代女性黨工對黨務工作的認知是否有不同的差異？
- 四、如果有世代差異，那麼世代將如何影響女黨工看待黨務工作的看法？

第二節 章節安排

在論文章節安排方面，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首先介紹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本研究的問題意識。第二章為文獻與理論，文獻方面主要探討兩部分，一是從政治參與到女性政治參與，二是針對政治世代到性別世代的文獻討論，最後依據文獻討論建構本研究對於黨工世代劃分的說明。

第三章則為研究現象與研究方法說明，包含探討民進黨黨工現有的相關規定及研究資料的蒐集與執行方式。第四章及第五章為資料分析，主要分成兩大部分，第一為透過量化資料對民進黨黨工做一初步探討，第二則針對訪談的質化資料對民進黨中央黨部女性黨職人員對於黨職工作的認知圖像進行深入探討。第六章則是針對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研究限制。

第二章 文獻與理論

本研究試圖從世代差異的角度，分析不同世代的民進黨女性黨工對於黨職工作的認知想像是否有其差異性，因此文獻檢閱將分成兩個部份討論，第一個部份先從傳統的政治參與討論至女性政治參與的相關研究；第二部分再針對世代的概念加以釐清，並從政治世代的討論延伸至性別世代的探討。

第一節 從政治參與到女性政治參與

黨職工作既是參政的一種過程或方式之一，但也兼具一般非參政的工作內容。從此雙重特殊性來看，本研究認為，有必要先從傳統的政治參與定義談起，藉以了解黨職工作在政治參與的範疇為何？同時討論哪些因素可能會影響民眾的政治參與？女性的性別身分在傳統政治參與上又需要面對哪些困境？是否導致日後女性參政的動機與熱情有所差異？從上述問題中本文試圖透過既有研究了解，這些問題對於女性黨工在黨務工作的參政與非參政的認知上，是否可能同樣因此產生不同的認知選擇？所以，重新理解政治參與和女性政治參與間的性別意涵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關鍵。

一、傳統政治參與討論

所謂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學者間的定義方式略有不同。²根據Conway（1991）的說法是，公民藉由參與政治活動企圖影響政府結構或政府的政策，該定義強調參與是具有一種工具性或目的取向（goal-oriented）。而Verba、Schlozman及Brady（1995:37）的定義則是「在一個民主國家中，公民可以透過政治參與，向政府表達他們所關心的議題資訊、政策偏好，並且透過參與政治給

²雖然各家學者對於政治參與定義不盡相同，不過Lamprianou（2013）指出，political participation（政治參與）也常與political engagement以及public involvement in decision making（涉入公共決策）等字詞互相使用；Lamprianou認為，政治參與可說是人類生活中一種有意義的社會表現，而該表現也與個人的多種生活面向息息相關（Lamprianou,2013）。

與政府壓力，促使政府回應公民的需求。」儘管政治參與的定義還沒有較為普遍性的定義，然而從上述說法中可知，政治參與至少會有以下四個要素：分別是公民、行動、政府與目的。也就是說，政治參與的主體是公民，這些公民會有一種具體行動的表現，這些行動與表現是和政府的決策、行動有關，所以政治參與必定有其目的性（盛杏媛，2010）。

如果從政治參與的模式分類，政治參與又可分為傳統（conventional）與非傳統（unconventional）兩種。前者的政治參與包含投票、競選活動、參與選舉有關的集會、捐款給候選人或政黨、幫某位候選人助選等；後者則如遊行、示威、抗議、抵制、暴動等抗議性活動（Conway,1991；楊婉瑩，2007；盛杏媛，2010）。

在此脈絡下，傳統政治參與研究多探討的是，民眾政治參與情形的演變，並針對參與變化的趨勢及參與原因提出不同的解釋空間。例如有研究指出，影響一個人去參與政治最主要是個人的參與動機，而動機類型大致有四種：為了物質性利益、為了自己的社會滿足、為了滿足自己是公民的認知以及為了集體利益的考量。³除了個人參與動機外，也有研究從不同面向來談政治參與，包括個人的社會特徵（社經地位）、心理因素、政治環境、政治參與的合法性，或從理性的角度來看民眾的政治參與。⁴其他研究也有針對參與政治的邏輯提出兩種看法，第

³為了物質性的利益包括，參與是為了工作、為了解決個人或家庭問題等；社會的滿足則指的是，認為參與活動可以讓自己認識到重要或有影響力的人，會讓自己覺得滿足或愉快；滿足公民的認知則是指，參與的動機是認為這是公民的責任等；集體利益的考量則是指希望藉由參與能改變或影響政府政策（Verba、Schlozman、Brady,1995）。

⁴Conway（1991）指出，個人的社會特徵指標如：年齡、種族、教育程度、性別、居住區、婚姻狀態、個人或父母的社會階級等都可能影響一個人的政治參與情形，而這些因素其實與個人的生命經驗（life experiences）是息息相關的，同時這些不同的特徵也讓公民產生不同的政治態度。以下舉幾個社經地位指標談起：在教育程度方面，高教育程度的民眾政治參與通常較高，並且也比較常參加不同的組織或活動，究其原因可能在於，高教育程度較能刺激一個人的政治興趣，進而參加政治活動。收入方面，收入越高者參與程度也比收入低者高，許多研究指出不同的解釋途徑，其中一點認為貧窮的民眾必須更關心自己切身的的生活需求或處境，而較少時間專注於政治。職業方面，在美國的研究指出，擁有自己的農場以及政府的公職人員參與程度也較其他職業或失業來的高；心理因素方面則是說，個人的態度、信仰與價值觀也關乎民眾的政治參與情形，例如個人是否把政治參與視為是一種責任等，這與本文中Verba等人所述的個人參與動機類似；另外，第三種從政治環境來看政治參與指的是，一個政治環境中是否鼓勵或壓迫人民參與，而大眾媒體在政治環境中如何影響民眾也是一個重點。政治參與的合法性談到的是，誰有權去投票，這之間涉及到女性、少數族群取得投票權以及投票是否有登記制等問題；另外，從政治參與是否理性的角度，也有許多不同的辯論。

一是個人因素 (personal)，另一個則是政治因素 (political)。前者指的是個人會因為有好處或利益可得而參與，或者參與時相對個人所花費的成本並不高，但這也要看參與者本身所擁有的資源條件情況而定 (如時間、金錢等)，⁵後者則是說民眾會策略性的因為某政治人物而參與政治活動 (Conway,1991;Rosenstone and Hansen,1993; Verba、Schlozman and Brady,1995)。⁶

從上述討論發現，相關研究主要多針對一般民眾的政治參與給予不同的解釋途徑，大致可以了解個人的社會化、社會特徵及動機對於民眾政治參與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對本研究而言，這些研究成果，雖然並非特別針對黨工進行探討，且參與政黨固然有政治參與的意涵，但參與對象的不同，便可能有不同的參與動機。⁷不過，在理論概念上，這些政治參與的討論仍有助於本研究從中理解，黨工擔任黨職參與黨務工作的動機與認知是否也可能受到上述因素影響。

回到國內的實證研究上，也有不少相關研究在探討台灣民眾的政治參與或投票參與情形，無論是探究媒體使用與政治參與間的關係，還是用個體資料和總體資料來分析台灣選民參與情況，或用政治參與情況，來談選民的政治效能感等研究 (彭芸，2001；黃桃芳，2005；吳重禮、鄭文智、崔曉倩，2006；王靖興、王德育，2007；崔曉倩、吳重禮，2011)。在這些研究中，似乎都可以發現，「女性」時常只是被當成一種社會人口學的變數處理，藉此探討男女性別間存在著政治參與差異，並沒有對性別產生較有分析架構的研究出現。⁸

⁵Rosenstone、Hansen (1993) 認為，公民參與政治是因為他們能從中得到特殊的混合了集體和選擇性的利益 (a unique mix of collective and selective benefits)。

⁶相關研究還有如：Zukin 等人 (2006) 將民眾參與政治、參與公共生活模式化。他們認為有八個階段 (steps) 是跟民眾參與政治有關：一開始的個人特徵 (如性別、父母教育程度、少數族群等)、早期的社會化、教育、使用電視情況 (指電視的影響)、世代認同、社會資本 (社會網絡)、政治資本 (政治資源) 以及對政治和政府的態度認知。而 Jones (2005) 的研究則特別針對電視媒體對於民眾政治參與影響提出看法。Jones 認為大眾媒體特別是電視，在文化角度的貢獻在於，媒體是支持民主運作的一個基本的元素，因為媒體型塑出人們的共同價值、知識訊息、公民的認同等，扮演了使民眾討論政治或參與政治一個重要角色。

⁷也就是說，對於一般民眾，參與政黨或許可以純粹視為一種政治參與，但對黨工而言，參與政黨雖然也屬政治參與的範疇，然而政黨也提供了黨工一份薪資與工作職位，因此兩者的參與基礎便有所不同。

⁸事實上，不只在國內，Tolleson-Rinehart 與 Carroll (2006) 也曾表示，1970 年代以前的美國，相對婦女運動尚未蓬勃之際，且在行為科學當道的相關研究中，性別 (sex) 也常只是被視為相關的人口學變數中的自變數之一。

簡言之，傳統政治參與的研究，可以說忽視了政治參與中的性別角色問題。究其主因，這與將近兩世紀以來把「政治」二分成公私領域有關。對此，不同女性主義者對於二元化的劃分有不同看法，有些女性主義者將這種區分視為是普遍性的（universal）、超越歷史和超越文化，是人類社會中既存的特徵或現象。而 Firestone（1970）則直指，這種二分法是來自男性權力壓迫，男性把女性只局限於從事再生產（procreation）的角色，男性認為自己因為需要賺錢養家，所以有創造及掌控文化的權力（引自 Pateman,1987）。Okin（1998）也認為，公私領域的二分是將勞動的概念分成男性屬於政治經濟領域，女性則是家庭照護，是一種透過對性別的規範轉化出政治上對公或私的想像。無論何種看法，公與私的討論在女性主義學者間，仍有許多不同意見與辯論。

但從此討論中反映出，傳統對於性別角色存在的觀念，普遍認為女性應該在家從事家務勞動、照顧家庭，就連過去從柏拉圖到黑格爾等的政治理論家也多將女性排除於公共生活或公民身分以外。⁹同時，在這些理論大家的父權態度觀點（patriarchal attitudes）中，「女性」都時常被描繪成，女性不是一種全人（not fully human）、女性沒有理性（not fully rational），或女性不是具有政治性格的人（not fully political beings）（轉引自 Carroll and Zerilli,1993; Young,1989; Brennan and Pateman,1998; Stacey,1993）。

因此，性別研究長期在政治參與範疇中被邊緣化，一方面與上述女性角色在公領域受到忽視與限制有關，例如當「公民」成了特指男性的身分代表時，男性就可使用其公民身分進行政治參與，因而過去政治參與似乎成了男性專利；另一方面，這也牽涉到傳統政治學者對政治參與的概念多數預設成一套選舉過程的參與，諸如參與各式競選活動、參與投票以及捐錢給候選人等等。此種政治參與的

⁹Brennan 與 Pateman（1998）就指出，霍布斯與洛克的契約論展現出的自由與契約，其實都是為了成年的男性所設計，具有濃厚的父權意識色彩，因為契約論總是難以解釋為何一個平等且自由的女性總是要臣服於男性之下。另外，盧梭的社會觀中也認為，女性是有慾望的、是照顧者的角色、有物質需求的特色，而假如將這些物質需求、慾望也帶入公領域的討論中，那麼將使公共審議結果更加破碎化（Young,1989）。另，對於女性的公民身分或公民權的討論，可參見 Voet（1998）*Feminism and citizenship* 一書的討論。

概念不僅過於狹隘，其中更隱含著傳統上的男性經驗，而忽視社會上確實存在的男女性別上的各種經驗差異。

就如 Pateman (1987) 指出，個人就是政治 (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 的口號，其實就是強調個人的生活環境是被許多公共因素 (如法律、政策) 所型塑或規範而成，個人的問題也可透過政治工具或行為來解決。政治參與的概念同樣可以用此種方式來理解，意即政治參與不應僅是指涉傳統公領域的選舉過程，女性在私領域的經驗，如參與社區活動、關懷社區公共事務、參與民間社團等，也都面臨傳統公領域上涉及到的權力分配或權力行使過程，都應該算是政治參與的範疇。因此，私領域中的政治意涵也不應該被忽視 (Okin, 1998)。所以，男女在性別上的角色差異，以及對政治參與的概念不同，對於政治參與的認知便就可能有許多不同的面貌產生。

基此，黨務工作做為一種政治參與的管道，同樣也會面臨上述男女性別角色與政治參與概念上的差異問題。黨務工作長期以來因為涉及許多政治性工作內容，女性在傳統公私領域思維下，一方面難以進入屬於男性為主的政治場域工作，而進入之後，女性也要面對長期被男性經驗主導下，產生的工作文化，女性與男性對於黨務工作的認知便可能產生差異。

另一方面，就黨務工作的雙重特殊性來講，黨務工作也並非都是純粹的政治性內容，但因為政黨所處的場域在傳統定義上仍屬於政治公領域範疇，因此女性黨工參與其中，自然可視為政治參與的一環。¹⁰然而，此種政治參與的型式與傳統政治參與的概念差異來自於，黨務工作不僅僅提供黨工有政治參與的看法，也可能會因為非政治性的工作內容或其他因素，讓黨工呈現出不同的參與認知與行為。簡單來說，無論是傳統政治參與的討論，或將女性經驗納入的政治參與，這種政治參與的概念相較都是一種「固定」的認知，然而黨務工作的政治參與型式，則可能因為性別角色的不同，以及工作性質的雙重特殊性特色，讓黨工對於黨務

¹⁰黨工可視為一種參與主體 (公民)，而黨工參與政黨工作便是一種行動策略 (行動)，當然政黨的目的之一是為了爭取執政，因此政黨的行動策略是與政府有關 (政府)，自然也有其目的性 (執政或監督目的)。

工作的政治參與看法有了「變動」的可能。

二、女性政治參與討論

當性別研究從政治學界的邊緣化到逐漸獲得重視後，女性政治參與便是許多性別政治學者的研究重點之一。特別在 1970 年代以後，許多研究者開始為過去女性政治參與較男性來的低，因而產生參與上的性別差距（gender gap）現象，¹¹ 提出有別以往的看法與說明。例如 Welch（1977）在其著作中便直言，過去將女性描繪成對政治是消極、對政治不感興趣、不具備政治知識與能力等是不真實的看法（untrue）。綜合許多研究成果，關於兩性政治參與差異，大致有三種解釋途徑，首先是情境式因素（situational explanation），其次為結構性因素（structural explanation），再者則是社會化的因素（political socialization）（Welch, 1977; Chou、Clark and Clark, 1990; Conway, 1991；楊婉瑩，2007）。

在情境式因素方面，主要強調傳統上女性被賦予家庭照顧的責任，此一責任將使女性在家庭中從事家務工作時間變長，減少接觸政治資訊的機會，進而產生女性對於政治較不感興趣，也較不熱衷參與政治的現象（Welch, 1977; Chou、Clark and Clark, 1990）。¹²從此解釋中可知，女性參與公共事務低落的原因，一部份是來自於女性具有承擔家務母職的負擔與責任，然而隨著時代性別觀念的演進與個人生命歷程（如是否有結婚、生育的經歷）的不同，不同世代的女性面對女性的性別角色應該負擔家庭責任的觀念，也應產生不同程度的變化。透過該解釋途徑，本研究認為，年長的女性黨工比起年輕世代黨工，或許更可能需要面對兼顧家庭

¹¹所謂性別差距，是源自於美國國家婦女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NOW）於 1981 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主要是談美國女性公民在 1980 年代比較傾向支持民主黨，而男性較支持共和黨的傾向有了較劇烈的差距變化，而在 1982 年後性別差距的概念便在選舉研究分析上被廣泛使用（Norris, 1997:3-4）。然而，楊婉瑩與劉嘉薇（2006）探討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性別差距研究中指出，「行為研究對於性別差異的討論並無一致的理論觀點」，其概念有多重意涵，廣泛指稱男女在教育、職業成就、乃至於政治態度與行為上的差異。周碧娥（1999）的文章中則表示，性別差距相關理論主要牽涉兩個層面，一為兩性在政治體制上的代表權機會、程度和影響的差距；二為女性的政治態度、政治理想等與男性間的差距情形。

¹²在其他相關研究中也顯示，有工作的職業婦女政治參與的結果往往也較家庭主婦來的高（Conway, 1991:34）。

和工作參與的兩難負擔。因此，從情境式因素考量，不同世代女性黨工看待黨務工作的參與認知可能有不同程度的看法差異。

在結構式因素的討論中，主要強調個人參與政治會受到一些客觀條件影響。不同的教育程度、收入或年齡等幾種社會人口學變數，會導致個人在政治資源上的差異（Welch,1977）。例如 Verba 與 Nie（1972）指出，引起兩性政治參與差異最大的原因是社會地位（status groups）的不同，特別是教育程度或收入的差異。對此，有研究也指出，當女性的教育程度或社經地位改變時，女性在政治場域的角色與參與的情況也會跟著轉變（Anderson,1975）。因此，社會結構因素之所以有影響，涉及到個人政治資本或政治資源的多寡問題。從女性黨工參與黨務工作的認知來說，在早期台灣社會中，女性常被認為不需要接受高學歷。而隨著時代轉變，這種思維雖已不復見，然而卻可能已經在不同世代的黨工中，留下不同程度的影響與差異。意即社會結構因素一方面影響著不同世代女性黨工參政的資源多寡，一方面也可能影響女性對參政的認知意義有所不同。

相較前兩者用相對客觀的外在因素來談性別在政治參與中的差異，社會化對於性別角色的影響解釋，則比較屬於內在主觀的心理認知問題。社會化因素的討論主要有兩種論調，分別是指孩童時期的社會化及成年之後的社會化影響。前者指涉兩性在小時候便被教導成不同的性別角色認知，例如男性應該獨立、果斷、追求成就，女性則被教導要有熱情以及有家庭取向等，¹³因而導致日後兩性政治參與的差異。

但也有學者提出，成年後的性別角色社會化對於女性參與政治，是比孩童時期的社會化來的更有影響力，因為小時候的性別角色對於政治的概念還是抽象模糊的，只有長大成人後，兩性間的政治行為才是真實的（引自 Chou,Clark and Clark,1990:17; Conway,1991）。然而，無論何種社會化影響，其原因都來自於傳統公私領域對女性的限制或論調所致。此種影響通常不易察覺，但卻可能直接或

¹³此一論調產生，”public man” and ” private woman”的說法。

間接對女性的政治興趣或政治資訊取得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一旦社會化影響女性的政治效能感或政治涉入感低落，那麼自然也將影響女性政治參與的結果。因此，從社會化的觀點反思，女性黨工參與政黨工作的認知，或許當女性黨工不被傳統思維社會化成應對政治較為冷漠時，那麼黨工對於政治或對黨務工作的認知便可能較為正面。另外，社會化又會隨著世代間的性別意識觀念不同而產生差異，亦即當婦女運動興起後，傳統文化認為女性對政治應該消極的思維，比起過去應該會減少許多。因此，不同世代間的女黨工對於政黨工作的認知也應有不同的結果。

在上述三種討論兩性政治參與差異的解釋中，許多研究結果認為，社會化的影響是最為重要的。例如Welch（1977）研究結果顯示，當控制住情境式及結構式的解釋時，男女的政治參與情形便相差不大，而政治社會化對於兩性參與差異的影響是比較有解釋力的。在國內研究方面，楊婉瑩（2007）也透過實證研究來釐清，過去主要解釋兩性政治參與差異的途徑在台灣究竟有何不同的影響力。¹⁴ 她的研究發現，台灣仍然存在政治參與的性別差異，縱使將兩性的社會結構與情境位置控制住，女性的政治參與仍較男性來的低，相較之下，透過社會化所形成的政治涉入感（政治知識、政治資訊、政治效能感等），是更能有效的解釋兩性政治參與的差異，但她也提醒，並不能因此認定資源條件等客觀因素就沒有任何影響力，兩者是具有複雜的相互連結。

除了社會化、情境式因素或結構性因素的解釋途徑，其他研究還指出兩性政治參與差異的原因還包括，男性對女性參與政治總有負面的態度與看法（對女性的歧視）、男女性別具有先天上的差異（*innate differences*）、¹⁵受到政治結構因素

¹⁴政治參與呈現性別差異，大致有兩種解釋途徑，第一，女性政治參與低於男性，乃因女性無法參與，而無法參與又因兩性的社經條件有所不同，或過去私領域限制女性，導致兩性間的政治參與的資源條件有所差異。第二，女性不願參與，因為社會化的差異，使得女性的政治涉入感低，而產生認知態度上的差異（楊婉瑩，2007）。

¹⁵Chou、Clark 與 Clark（1990）指出，男女先天差異的看法是指，男女在生理、心理上本質就有生物性的差異，男性的心理被認為和政治人物一樣，有追求權力、具有個人動機的取向，然而女性則較不具此特點。但也有許多研究反對此種論點，認為政治人物不一定需要追求權力，男女性的生物性特質差異並不是這麼重要。

的影響，¹⁶以及女性取得投票權的時間較晚等。¹⁷不過，在這些不同的解釋原因中仍以社會化的影響最受到普遍的討論（Chou,Clark,Clark,1990; Conway,1991; Evans,2004）。

綜合上述，從傳統政治參與到現代將女性加入政治參與的研究可以發現，女性政治參與情形，可以透過許多不同的研究途徑加以解釋，但主要仍以社會化的影響最讓多數研究者所認同。而本研究也認為，不同世代所處的政治社會氛圍或性別意識不盡相同，因此世代之間也應存在著不同的社會化因素影響，即當新時代的社會化把女性教導成參與政治不再是男性的專利時，讓女性的政治涉入感提高，女性參與政治的情況應能獲得改善（楊婉瑩，2007）。而當女性參政的情況得以改善，那麼女黨工參與政治工作的認知也應有不同圖像面貌產生。

然而，就如其他研究提到的，社會化因素、情境式因素與結構因素三者應是有複雜的互相牽連關係，所以探討女性政治參與的因素時，也不能完全忽略了情境式與結構因素兩種影響機制。故在此脈絡的討論下，本文在分析個案時，除了著重集體式的時代背景可能對女黨工看待黨務工作的態度產生何種影響外，也會分析女黨工們的家庭情況及教育程度方面的影響程度。以期此理論概念也能反映到本研究的研究題旨。

¹⁶例如，選舉制度的影響，有些選舉制度對女性競選較為有利，反之則不利。

¹⁷Evans（2004）針對投票參與方面，指出年齡、性別、種族族群、教育程度、收入、婚姻狀況及參與社團組織等，幾個人口學變項對於投票參與是具有影響力的。其中在性別方面，女性通常在投票參與上比男性來的低。但 Evans 也認為，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歷史因素所造成的影響，因為女性在獲得投票權（enfranchisement）的時間比男性來的短許多，因此女性的政治參與習慣也比男性來的少（Evans,2004:153）。

第二節 從政治世代到性別世代

上述討論社會化差異，將會影響女性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涉入感或政治效能感，因而對政治參與可能有不同程度上的差異。然而，造成社會化過程產生差異，其中一個影響因素與世代間存在的歷史經驗與集體記憶的不同也有關聯。因此，世代差異理應也會形塑女性黨工的政治參與型式與認知內涵，故也須針對世代的觀念進行重新思考與理解。

一、傳統世代討論

世代 (generation) 成為社會學中一個有效的分析概念，許多研究者認為 Mannheim 的概念與理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起點 (Jennings, 1987; Schuman and Scott, 1988; 蕭阿勤, 2005)。除研究者常用世代的觀念來解釋個人與個人間的政治行為與態度的差異外，Braungart 與 Braungart (1985) 的研究中也整理出四種對於態度或價值觀差異不同的解釋研究途徑，分別是 (一) 非生命歷程與世代的途徑 (non-life course, non-generational approach)、(二) 生命歷程途徑 (life-course approach)、(三) 世代途徑 (generational approach) 以及 (四) 結合生命歷程與世代的途徑 (life course and generational approach) 以下分別述之。

非生命歷程與世代的途徑 (non-life course, non-generational approach) 被視為最傳統的解釋途徑，其用來解釋政治行為的面向相當多元，如用結構因素或政治過程來談政治行為的差異。此類型的途徑通常被政治社會學、政治經濟學及政治人類學 (political anthropology) 所採用。¹⁸但是，此種研究途徑在某些國家或社會中，可能有解釋上的限制，例如在一些較低度發展的社會中，年輕人口增加快速，而一些較先進的國家中，老年人口則不斷攀升，這些社會的人口結構

¹⁸關於政治社會學的研究，即強調社會面向，特別是階級、地位和組織如何影響政治行為，或政治行為如何影響一個人的階級地位等；而政治經濟學則專注於在政治體系中，經濟條件及政策決定如何影響政治行為或態度；最後，關於政治人類學方面則是研究政治體系的結構、過程、功能等 (Braungart&Braungart, 1985:273)。

轉變，將使「年齡」逐漸成為解釋個人政治行為或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Braungart and Braungart,1985:272-273)。¹⁹

其次，生命歷程研究途徑(life-course approach)主要聚焦年齡與政治態度或行為的改變關係，而生命循環(life cycle)觀點則與此途徑有相當緊密的關聯。生命循環的研究方式是將年齡分成幾個不同階段(stage)，進而探討不同年齡階段中，個人的行為或態度的轉變，此研究途徑已明顯與前述有些不同。²⁰

第三種的世代途徑(generational approach)強調的是，出生於同一時代的人們有著相似的生命循環發展，他們會經歷相同的歷史事件與社會經驗，進而影響這群人的政治態度或行為。也就是說，影響一個人的政治態度或行為的因素，主要是透過社會化、成長於某種社會結構下及經過劇烈的歷史事件(如經濟蕭條、戰爭、科技創新、移民、社會中的文化劇烈改變等)所造成的影響。此種世代途徑中的世代(generation)常與另一個名詞，科夥(cohort)互相使用。²¹

最後，生命歷程與世代途徑(life course and generational approach)是將前述兩種途徑互相結合，並認為兩種途徑的觀點並非是互斥，若能結合此兩種觀點更能提供一個有效的解釋效果。此種途徑背後的解釋原理在於，年輕一代與年長一代對於相同的政治處境會有相異的看法，不只是他們的生命歷程產生影響，同時包含不同世代所經歷的集體經驗差異所致(Braungart and Braungart,1985:278)。

綜合上述，生命歷程途徑主要強調年齡的改變與政治行為改變的關係，較少關注到社會及歷史事件；世代研究則是相反，主要強調社會動員和重要的歷史經驗對於政治行為的影響；而生命歷程與世代途徑則是綜合前述兩者觀點。在上述

¹⁹因為人口結構的轉變，除會使社會中人們的生活型態有所改變，也涉及社會中資源再分配的問題，年齡便提供政治上的一種分歧與衝突的基礎。

²⁰關於生命歷程的研究途徑主要有兩個重要的假定：首先，不同年齡層有不同的政治取向，年紀較輕的人比較能接受政治上的改變，而年紀較長者則傾向保守。其次，個人會隨著年紀的增長，改變自己的政治觀點，年紀越大其政治態度就會越傾向保守(Braungart and Braungart,1985:274)。

²¹Cohort 譯成科夥乃參考游清鑫與蕭怡靖 2007 年所著的研究，然而劉義周(1993)與包正豪(2009)則譯為同年群。本文認為譯成科夥較能與所謂的世代在中文字詞上有些區別，故以游、蕭兩者翻譯為主。而 Braungart 與 Braungart 認為所謂「科夥」指的是一群人出生在同一段時間，而世代除了具有上述「科夥」的特質，還包含不同年齡層間會有其不同的共同意識，即產生與其他年齡層相異的政治態度及行為(Braungart and Braungart,1985:276-277)。

研究途徑的討論中，本研究將以生命歷程與世代途徑出發，除了聚焦成長於不同世代間存在的歷史、政治事件背景下的女性黨工，對於黨務工作的認知是否產生差異化的現象，也會將黨工的個人生命經驗納入討論，以求世代研究途徑與生命歷程途徑間的互補。

談完研究途徑後，國內相關研究中，劉義周首先將政治世代的概念帶入台灣政治學的研究。劉義周（1993）指出，在台灣習稱的「新生代」、「外省第二代」等名詞，指涉的就是世代政治（generational politics）的現象。不過，早期研究囿於研究資料限制，多止於敘述不同年齡組間的態度、行為差異的現象，未有進一步的解釋。因此，他嘗試用政治世代概念，將台灣民眾分類成七個政治世代群，並借此比較說明劃分世代群與單純的年齡層分類方式，對於民眾的政治態度是否有差異。劉的研究指出，純粹的年齡分組常會掩蓋部分現象，政治世代群的使用可使態度變異的情形加大，此為改善年齡分層所造成解釋上的不足。不過，如何將民眾分類為不同的政治世代，便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對此，游清鑫與蕭怡靖（2007）指出，關於政治世代如何分類，不同學者會依其不同的研究主題各有所異，並無一致的認知與共識。而上述劉義周（1993）的研究則依時間、籍貫與完成小學教育的年份三個因素，將台灣民眾分成七個世代群。相較之下，游清鑫與蕭怡靖（2007）則認為，年輕世代的民眾其政治態度已漸不受個人省籍背景影響，且依照游與蕭的研究旨趣，他們將 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定為政治世代劃分的時間點，將 1992 年取得投票權的民眾定義為新選民（即西元 1972 年後出生的民眾）稱之為「後九二世代」。反之，1971 年前出生的民眾則為「前九二世代」，游清鑫與蕭怡靖的研究結果顯示，後九二世代的民主價值比前九二世代的民眾來的高許多。

陳光輝（2010）的研究，則是特別比較兩個世代台灣大學生民主經驗與價值的差異。他的分類依據是將大學生分為 1991 年與 2001 年兩個世代，將 1991 年

在學的大學生定義為「年長世代」，而 2001 年的大學生則為「年輕世代」。²²該研究則指出，年輕世代的大學生其民主價值程度比年長世代學生來的低，可能原因在於，年長世代的大學生處於民主化的高峰期，因而被型塑出較高的民主價值。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陳光輝的劃分緣由雖並非如游與蕭（2007）以國會全面改選為依據，然兩者的研究劃分時點都是以出生於 1971 年前後為依據。故就民主政治的發展角度而言，1990 年代確為台灣重要的時間年份。

另外，包正豪（2009）的研究亦按照其研究需要，以民主化歷程的重要事件時間點為主，並以完成小學教育年度為輔，把台灣民眾分為四個世代別。第一世代和第二世代以 1943 年為切割點，即 1943 年以前出生者為第一世代，而第二代與第三代的時間點為 1960 年，第四代則是 1976 年以後出生的民眾。其研究成果也指出，不同政治世代參與政治經驗，對於民眾領袖情節有顯著影響。

除了上述從政治事件來劃分的政治世代討論外，蕭阿勤（2005）在定義台灣的戰後世代中，他的劃分依據是以 1970 年時處於 20 到 40 歲間的民眾為台灣的戰後世代。蕭認為這群人不管是本省還是外省籍，即使不在台灣出生，這段時間也都在國民黨體制下接受教育並成長於台灣。故此種劃分方式比起前述的研究，多強調受訪者符合某一特定劃分的出生年份，蕭阿勤的劃分方式似乎更強調政治及文化變遷的重要性。可見世代不僅無一定劃分標準，且在概念操作上亦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二、性別世代討論

上述政治世代的研究途徑及實證研究的討論中，除了發現世代的劃分，常因不同研究者的研究旨趣而有不同，同時這些研究使用的世代概念，仍然是一種以傳統的思考模式進行解釋。意即傳統上對於世代的討論，鮮少關注到世代間的性

²²其分類的考量因素在於，年長世代的大學生回推其出生年時，約為 1967-1972 年間出生，這群人約莫在 1980 年代中期進入青春期，此時台灣正由穩定的威權統治進入民主化階段。而年輕世代的大學生則約莫出生於 1990 年代，此時台灣則由民主階段進入到民主鞏固，故以此為劃分依據（陳光輝，2010）。

別關係，因而有批評者認為，過去所討論的政治世代理論中，政治世代往往被視為是性別中立（sex-neutral）的現象，並沒有考慮到整個政治及社會結構中的性別關係。

一些女性主義學者認為，政治世代中用來解釋政治態度轉變的一個主要假設（即年輕人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其自身政治態度），可能只特指男性經驗而沒有考慮到女性的特殊經驗（Schneider,1988）。所以，楊婉瑩（2011）也提醒，若從性別政治的研究角度來看政治世代的差異，不能忽略世代中存在著男女性別對於政治、社會及歷史事件的不同感受，因為不同政治世代確實存在不同的性別意識。

因此，「性別世代」的觀念也在世代差異的研究上，日益受到重視。而當談論性別世代時，研究者則時常將婦女運動發展歷程與世代的關係相互連結，因為婦運的發展與時代中的性別意識有著密切關係。從美國婦女運動談起，在美國婦女運動的發展史上，就被依發展議題取向的不同被區分成三個婦運階段：第一波婦女運動的世代為 18 到 19 世紀，當時主要強調的是爭取女性的工作、財產、教育與參政權的改善，也就是專注於具體的政治與社會議題。第二波婦女運動的世代則為 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在此世代的婦運中，強調的是一種認同政治，女性具有獨特性，同時，當時爭取女性公民權與反戰運動的世代，也訓練出新的一批女性主義運動者。第三代的婦女運動是在 1980 年代以後，此世代的婦女運動強調的是一種反認同政治時期（the politics of anti-identity），而有所謂的多元認同取向（Jennings,1987; Banaszak,2006; Whitter,2006）。

雖然只要涉及分類，分類的依據及世代間的界限就有許多討論空間。然而，要了解世代中存在著何種性別意識的差異，婦女運動或性別意識的發展便無法忽視。從此脈絡下，檢視相關性別世代研究如，Schnittker、Freese 與 Powell（2003）使用 1996 年美國大型社會民意調查資料（General Social Survey；GSS），分析美國民眾是哪些人認同女性主義，其研究結果顯示，不同世代對於女性主義認同有不一樣的看法。即成長於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時間左右，無論男性或女性（出生年約為 1935-1955 年）都比前世代及後世代的民眾更加認同女性主義，這樣的結

果或許反應出，年輕世代女性因為女性主義走向多元議題的認同取向，導致女性主義的認同已不如第二波女性主義時代的民眾強調女性獨特的認同政治。

從美國婦女運動經驗上，回顧台灣婦女運動的發展歷程。王雅各（1999）指出，呂秀蓮在 1971 年提出的「新女性主義」的口號是台灣婦女運動的先鋒。同時在呂秀蓮之後，台灣也成立了第一個婦運組織「婦女新知雜誌社」透過發行刊物的方式，鼓吹台灣的兩性平等觀念。自婦女新知在 1987 年轉型為基金會後，台灣婦運便進入了另一個重要里程碑。對於台灣婦運的分類，范雲（2003a）則整理出台灣婦運的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70 年代「新女性主義」口號被提出為起始點；第二階段是 1982 年以李元貞為首的婦女新知雜誌社成立為開端；第三階段則是 1987 年解嚴後許多婦女團體組織的成立；最後為婦運的差異與異質化階段。²³

在台灣，范雲（2003a）的研究中，探討婦女運動的運動者背景與婦運議題間的發展關係，她認為不同生命傳記背景運動者，會參與不同的組織模式，進而影響婦女運動的議題與策略。例如八 0 年代的運動者有著教育與階級的優勢，因此，此時期的婦運會偏向社會服務或立法宣傳等面向工作，然而九 0 年代新進的運動者，除了有許多家庭主婦、職業婦女或基層婦女，還有年輕的女性主義者及大學生，導致該時期婦運內部產生許多議題上的差異。范雲認為這與參與者的世代經驗差異是有關的。她舉公娼議題為例，年長世代運動者是傾向反對公娼，而年輕世代則較為支持，她認為「世代」的差異是區分其回應態度的一個變數。

另外，楊婉瑩（2011）也使用性別世代的觀念來探討台灣婦女運動的價值是否存在世代差異？她的世代分類的依據同樣以台灣婦運發展歷程，區分為婦運七 0 年代與婦運九 0 年代。楊的研究結果顯示，婦運七 0 世代與婦運前世代在性別平權價值，以及性解放等議題都存在顯著的差異，而婦運七 0 世代與婦運九 0 世代，在性別平權的價值上則有相當高的一致性與延續性，這兩個世代的差異，

²³此外，也有學者將台灣婦運分成三波，如顧燕翎便認為台灣婦女運動主要有三波：1972-1981 年、1982-1992 年以及 1993 年以後（轉引自王雅各，1999）。而王雅各（1999）的劃分則分成，1980 年代以前、1980 年代、1990 年代三個時期。

主要反映在性解放的議題上。

綜合上述國內外的相關研究討論，可以得知世代研究中的兩個重點。首先，關於世代劃分，並無一定的劃分依據，端看研究者的研究取向進行分類，然而，在劃分時也不能忽視不同時代的背景有著不同的性別關係。其次，在國內政治學領域的相關研究中，政治世代的概念常被用來討論，民眾對於民主或選舉等相關政治態度的意向研究（蕭阿勤，2005）。然而，在世代的研究範疇中，使用性別世代概念的研究似乎略顯不足，因而本研究試圖使用上述討論的性別世代意涵，對本文的研究對象進行具有性別意識的世代分類，以期能補足性別世代的相關研究，並了解不同世代的女性黨工對於黨務工作的態度與想像是否有其差異。



第三節 理論建構

文獻探討所談論的世代概念，提供研究者對於個人或一個世代群體，其政治態度或行為改變的一個良好解釋途徑。然而，我們卻也不能忽略世代中存在著男女性別對政治、社會及歷史事件的不同感受，因為不同政治世代確實存了不同的性別意識。關於世代的劃分，雖無一定的劃分依據，然而，在劃分民進黨黨工世代之前，也須先將過去台灣民主化歷程所經歷的重要事件、不同時代的台灣婦運經驗，以及關於民進黨的重大歷史事件應有其基本的脈絡了解。同時，本文也針對整理出來的外部事件因素，可能影響黨工對於黨務工作的看法做一理論上的初步解釋與建構，而這些背景脈絡敘述如下。

一、民主化歷程、民進黨發展及台灣的婦女運動經驗

關於台灣婦女意識的抬頭，國內研究普遍首推 1971 年呂秀蓮提出的「新女性主義」為起點，²⁴新女性運動的提出，挑戰了台灣傳統社會存在男尊女卑的父權結構。然而，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將呂秀蓮提出的兩性平權觀念，暫時中止了一段時間（王雅各，1999；呂秀蓮，2000a；李元貞，2000；范雲，2003a；楊婉瑩，2011）。因此，雖然在 1970 年代台灣社會整體的性別意識，仍在傳統的父權意識下發展，但不可諱言的呂秀蓮在 70 年代的發聲，對於台灣日後的婦女運動有著不可抹滅的歷史影響。

在政治層面上，1970 年代的台灣由於還是處於威權統治階段，一般民眾的政治參與仍然有許多限制，遑論參與「黨外活動」。²⁵然而，黨外運動在 1970 年代末期的美麗島事件達到高峰後並沒有因此沒落，因為在《美麗島》雜誌被查禁

²⁴所謂新女性主義指的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與一種力量。呂秀蓮（2000a）書中提到，這是順應時代潮流的產物，也是主張兩性社會和諧應以男女實質平等為基礎，更是要消除傳統對女子的偏見，再造女子獨立自主的人格。

²⁵1970 年代有許多黨外活動事件，呂秀蓮（2000b）認為，1960 年代的「自由中國時代」以及 1970 年代末的美麗島事件，是當時黨外運動最具代表性的兩波事件。因為敢於公開對抗國民黨，使這兩波反對運動對台灣政治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特別是美麗島事件，主要透過辦雜誌與參加選舉兩種途徑來反抗國民黨的意識推行。

後，其他黨外雜誌在當時也如雨後春筍般在市面上發行，如《新潮流》、《關懷》、《蓬萊島周刊》、《台灣潮流》等（鍾年晃，2001:187-188）。由此看來，雖然當時社會有著高度反對威權統治的聲浪出現，但對當時的民眾而言，黨外活動或相關的政治活動，仍然都被視為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行為。

經歷過黨外活動的高峰後，在台灣民主化的歷程方面，1980年代也扮演了重要的關鍵年代。因為在80年代中期，台灣社會更興起一波波社會運動風潮，議題環繞環境、勞工、原住民、婦女、反核等，這些反對力量透過集體行動的方式，對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形成了政治與經濟領域改變的壓力（張茂桂、鄭永年，2003）。因此，80年代的台灣政治有了巨大變革，其中包含民主進步黨於1986年9月28日正式成立，政府也於1987年宣布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令，乃至1988年台灣開放黨禁與報禁，正式進入民主化初期階段。

若從台灣婦女運動角度考量當時女性經驗，范雲（2010）指出，婦女新知雜誌社成立後，「在仍然政治高壓的八0年代裡，聚合了所有對父權體制有所覺醒並渴望有所改變的女性。」特別是在1987年當政治解嚴後，台灣在當時開始出現許多新興的婦運團體（王雅各，1999；范雲，2010）。而從婦女運動的浪潮劃分，解嚴後的台灣常被許多研究者歸類為第三波婦女運動時期（范雲，2003a）。

換言之，1980年代中期的台灣，無論從民主化角度、民進黨重要事件或女性經驗的立場觀之，都包含了重要特殊意義。這樣的特殊意義，對於政黨及黨工而言，便可能產生若干的影響。首先，就民主化歷程中宣布解嚴的歷史事件中，對政黨最直接的影響便是，使台灣政黨的籌組合法化，政黨不再被視為是體制外的非法組織，因此參與其中的人無論是政黨的領袖或是工作人員，便不再像過去戒嚴時代，需要隨時擔心所從事的工作是否會面臨牢獄之災。

對於經歷過這樣歷史事件的黨工而言，參與政黨工作便可能與過去有著不同的期待與看法。其次，在過去性別關係長期不平衡的發展下，宣布解嚴後的婦女團體蓬勃發展，也帶動了新一波女性意識的抬頭，雖然婦女運動在此階段尚未有顯著成果。然而，婦運組織的蓬勃發展，對於婦女社會地位的提升仍有一定幫

助。²⁶同時無形中也影響著社會上對於女性參與工作，或甚至參與政治有更大的接受度。因此，婦女團體興起導致女性意識抬頭的社會氛圍，將使女性角色不再只侷限於私領域中，也可能使女黨工對參與黨務工作時有更多的想像空間。

除了 1980 年代是關鍵年代外，1990 年代也是值得關注的年代。1990 年代開始，婦女團體所追求的性別正義，已逐漸透過國家體制上的法律修改，累積相當豐碩的成果，例如民法親屬篇修訂、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楊婉瑩，2011）。²⁷此外，李元貞（2000）也提到，1990 年代開始關於台灣婦女的參政門檻在當時也有一番討論。²⁸與過去相較不同的是，90 年代的婦運訴求開始多元化，更朝同志議題、性解放及女性的身體自主權等議題發展，在此發展脈絡下，對於參與政黨工作的女性黨工而言，女性對於工作乃至於對於政治的看法，也可能比起過去 1980 年代解嚴前將有著更多元的看法。而在台灣民主化後，90 年代的台灣社會也逐漸朝向更自由化與多元化發展，期間舉辦多次選舉，如 1991 年國民大會代表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等。

另一個關鍵時間為 2000 年，因為在第十屆總統選舉中，時為民進黨正副總統候選人的陳水扁與呂秀蓮，以得票率 39.30% 贏得第十屆總統大選，²⁹創下台灣政治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結束了國民黨長期以來的執政地位，在婦女經驗上也成就了第一位女性副元首，提供了女性參政更多的想像空間。在此階段中，執政或在野的政黨角色，便是可能影響黨工對黨務工作看法有所差異的因素之一，因為民進黨在 2000 年以前，是一個監督政府最大的在野黨，而取得政權後，其角色轉變成一個讓政府運作的執政黨，從在野到執政這之間，政黨所能掌握的資源相差非常大。

²⁶1980 年代對於台灣婦女運動重要的原因，李元貞（2000）文中如此敘述，「自 1984 以後，由台灣婦女自己組成的新興的民間婦女組織陸續出現，像由離婚婦女組成的晚晴協會、家庭主婦組成的主婦聯盟、參加民主運動的進步婦盟、婦女新知雜誌社成員協助成立的台大婦女研究室等，使得台北市的婦女積極活動起來，逐漸形成一股新興的婦女自主的社會力量。」

²⁷李元貞（2000）對於 90 年代的婦運成果，更直接用婦運「開花與結果」來形容台灣婦運在 90 年代的成就。

²⁸相關討論如黃長玲（2001）便認為，台灣應該從原始憲法的婦女保障名額，修改成婦女團體所提出的性別比例原則的看法。

²⁹中央選舉委員會（查詢日期：2012 年 12 月 27 日）。

一般而言，執政黨因為掌控國家機器，擁有龐大的國家行政資源，且對行政官員的任命亦有相當程度的權利，比起身為在野黨的時期，能有更多有形或無形的資源來輔助政黨運作。從黨工的角度來看，由於政黨所能運用的資源有所差異，因此做為執政黨的黨工與做為在野黨的黨工，對於黨務工作的認知與意義上，便或多或少會產生差異。

另外，在性別意義上，前副總統呂秀蓮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副元首，也直接打破過去女性無法或沒有能力參與政治的傳統思維。因此，在性別思維更為平等，同時民進黨的政黨角色轉化為執政黨的雙重影響下，黨工對於黨務工作的認知與想像，便可能朝向更為開放的態度認知。故 2000 年總統大選的結果，特別對於民進黨而言，有著重要的發展意義。

時序推移，經過長達八年的執政後，民進黨在之後接連兩次的總統大選紛紛敗北，2008 年總統選舉後，民進黨重回在野黨角色，台灣政壇進行第二次政黨輪替，國民黨取得執政權，而 2012 年的總統選舉，民進黨首次推派出女性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參選，在當時的社會氛圍與選舉後期中，不乏看到蔡英文陣營不斷提出「台灣第一女總統」之競選口號。

因而本研究認為，此次大選的意義，不只民進黨想要取回執政權，在社會整體的性別關係上，由於蔡英文是台灣第一位女性總統候選人，對於女性參政將有更大的鼓舞作用。同時從當時民調資料來看，國、民兩黨候選人在選前似有五五波之態。³⁰某種程度而言，顯示台灣民眾對於女性擔任總統職位，並不是如此排斥，民眾在性別意識上或許與過去的保守思維相比已悄悄產生變化。³¹不過，雖然如此，最後國民黨籍的總統候選人馬英九仍以得票率 51.60% 獲得連任，³²繼續穩固國民黨的執政。在連續兩次總統大選的挫敗下，2012 年便成了民進黨另一個關鍵的年份。

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世代影響女性黨工對於政黨工作的看法，主要有兩

³⁰BBC 中文網新聞：台灣總統選舉公布最後民調和預測（查詢日期：2012 年 12 月 27 日）。

³¹不過，這樣的說法，仍有待相關的實證資料佐證，本文提供的是一種初略的看法。

³²中央選舉委員會（查詢日期：2012 年 12 月 2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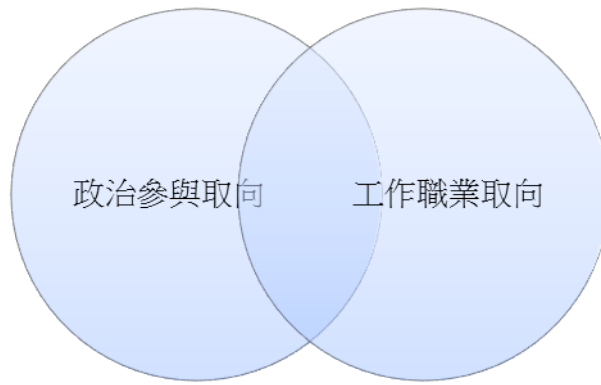
個面向：首先，在民主化歷程的歷史經驗下，反映出政黨的角色與功能的不斷轉變，這樣的改變便可能影響女性對於政黨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說，相較過去的威權時代，政黨工作已不像過去是如此敏感的或具威脅的高度政治性的工作類型；另一方面，隨著傳統上的性別關係改變，女性黨工在黨務工作的位置上或對於政黨工作的認知定位上，也應有更多元的看法轉變或有不同程度的認知差異。基此，本研究將上述談到的民主化歷程、民進黨的幾個關鍵年代與各時期不同的社會性別意識發展，以表格方式整理如下，請參見表一。

表一、民主化歷程、民進黨重要發展事件與性別關係重點整理

民主化歷程、 民進黨重要事件	威權統治 黨外活動	1987 解嚴 民進黨成立	民主化初期 舉辦各式選舉	政黨輪替 民進黨執政	民進黨總統 選舉續敗
	1970 年代	1980 年代	1990 年代	2000 年	2012 年
台灣婦女運動、 性別意識發展	新女性運動 婦運開端	婦女團體 逐漸組織化	婦運多元化 產生社會影響	首位女性 副總統	首位女性 總統參選人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整理。

另外，本研究初步將黨工對於黨務工作看法的異同，主要區分為兩種：一是將黨務工作視為一種政治理念的展現方式，即蘊涵有政治參與的想像，本文稱之「政治參與取向」；二為將黨務工作相較視為是一種工作類型，隱含著與其他工作相差不大，本文稱為「工作職業取向」。然而，如前所述，本研究將黨務工作想像二分，並非認為黨工對黨務工作的看法是有截然清楚的區別，而是透過這樣的劃分，以便了解兩個世代對參政或工作認知上，有何不同程度的區別或內涵上的差異。關於參政或工作的認知圖像，請參閱下圖一。



圖一、女性黨工對黨務工作想像認知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二、民進黨女性黨工的世代劃分

本文從上述討論的五個重要年份，挑選出 1990 年代為本研究對於民進黨女性黨工世代劃分的重要時點。挑選 90 年代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時代在台灣民主政治發展與社會的性別意識上，都扮演了關鍵代表性的轉捩點。

在民主政治的發展中，1990 年代前的台灣，無論是 1970 年代還是 1980 年代，台灣仍然處於民主化前的威權統治時期，縱使 1980 年代末期已透過解嚴的方式，逐步走向民主化的進程，但不可否認的在蔣經國去世後，繼任總統李登輝在統治初期，基本上還是依照著蔣經國所規劃的改革藍圖來推動改革（薛化元，2010）。因此，90 年代以前政治氛圍仍是以國民黨掌握多數資源的時代。

不過，1990 年代以後，在民主政治上，隨著台灣幾項重要的選舉陸續舉行，也象徵著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時代來臨。這些選舉包括 1991 年國民代表大會全面改選，1992 年立法委員全面改選，1994 年台灣省長首次民選以及 1996 年首次總統直選等（游盈隆，1997）。但是，推動這一連串的選舉改革，除了因為政治上的逐漸開放，另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推手便是 1990 年 3 月出現的學生運動，史稱三月學運或野百合學運。

三月學運主要訴求是「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

及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這些訴求最後被當時擔任總統的李登輝允諾實踐後，才結束這場規模最龐大的學生運動（薛化元，2010）。因此，三月學運影響了台灣民主政治改革包括，運動後次年舉行的國大代表全面改選，促成1991年5月廢止在台灣已施行四十三年之《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同時受三月學運影響而召開的國是會議，也成了90年代台灣憲改爭議的起始（鄧丕雲，1993）。

從上述脈絡可知，1990年代的台灣正式從威權走向民主，特別是90年代中的1991年，因為先後推動國民代表大會全面改選以及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後，使得台灣憲政體制回歸正常化，以及才有更後期的一系列民主改革。因此，1991年在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中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年份。

另外，再就時代中的性別意識發展角度審視，1990年代同樣是婦女運動發展的關鍵年代。就婦運組織來看，1990年前後最明顯的差異就是婦女團體數量從1980年代的個位數到1990年代的快速成長（王雅各，1999）。甚至梁雙蓮與顧燕翎（1995）更表示，解嚴前後婦女團體無論就數量、組成方式、活動內容皆有極大差異。在策略上，除了街頭策略外，也不斷透過修法的方式，來暴露父權社會打壓女性的手段，以喚醒女人的憂患意識（梁雙蓮與顧燕翎，1995）。此外，1990年代以後，婦運團體也不再如以往只存在於台北市，開始往中南部發展。使婦女團體的聲音、訴求得以在台灣各地萌芽、被聽見，這是在1990年代以前，尚未走向民主開放的時代所未有的情況。

簡單來說，從上文的五個重要年代中挑選出1990年代，是因為無論在民主政治發展的結果還是婦女運動上，90年代都是一個重要的變革開始。不過，如前述1991年在民主化過程中，發生的國民代表大會改選、廢除臨時條款等重要政治事件，在時代意義上，比起單純以「1990年」為關鍵時點更具有代表性的意義。因此，本文將1990年代中的1991年明確訂為本研究劃分民進黨黨工世代的關鍵時間點，並藉此劃分出兩個世代的民進黨黨工。

基此，本文設定的兩個世代黨工分別為：首先是1991年（含）以前政治體制尚未完全轉型民主化之際，此時期的人們對於政治仍普遍存在許多較為負面，

或認為政治是敏感的、女性不能也不宜參與政治的傳統思維。雖然早在 70 年代就有呂秀蓮提出的新女性運動，成為台灣婦女運動的先驅，然而整個社會氛圍仍是以傳統男女不平等的父權結構所主宰。故在民主政治與性別平等意識，尚未成熟但已萌芽的考量下，本研究以此訂為第一代民進黨女性黨工，暫且將之稱為「黨工九 0 前世代」，而九 0 前的黨工也是民進黨黨工中較為年長的一輩。

其次是 1991 年之後，特別是 90 年代中後期，台灣婦女運動蓬勃發展，也逐漸累積相當的修法成果。在政治方面，1991 年以後也有許多「首次」的選舉經驗，一時之間台灣的社會、政治及文化產生許多變化。因此，此時期的女性在政治或性別意識的經歷相較前世代有著更為平等的氛圍，故本文以此定為第二代民進黨女性黨工，同樣稱為「黨工九 0 後世代」。³³

除了關鍵時間點的確立，對於世代劃分依據，學界主要有兩種概念化的操作。首先，許多研究指出，世代之所以對價值觀或行為差異具有解釋力，在於一群人會在某一定時期內形成自我性格或態度價值，而此時期稱便為社會化形成期（formative years）。在這段社會化形成期間，個人的政治學習過程、個人經驗與社會重大事件對於其日後的政治態度或價值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然而，社會化的形成期也並非永遠存在，有研究認為社會化形成期約為青少年及大學時期（Jennings and Niemi, 1974; Jennings, 1987），而 Mannheim 在其 1952 年文中雖未明白指出，影響人們發展出自我態度價值觀的主要年紀為何，但也隱約指涉為 17 歲左右的年紀開始，到 25 歲是形成期的結束階段（Mannheim, 1952 引自 Schuman and Scott, 1988）。³⁴

然而，除了上述 Mannheim 對於世代的觀念特別著重「特定年齡層」的人群外，另一種概念化的世代取向則如文獻曾提到，蕭阿勤（2005）的世代劃分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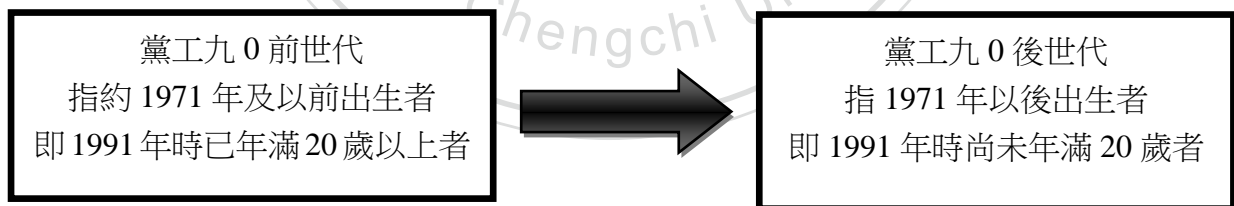
³³關於兩個世代劃分依據，本研究同時也參考楊婉瑩（2011）研究台灣婦運議題的世代差異，對於婦運所劃分的婦運七 0 年代與婦運九 0 年代，以及游與蕭（2007）的政治世代研究以 1971 年出生前後定為前九二與後九二世代，為參考依據。

³⁴Schuman 與 Scott（1988）在探討世代和集體記憶之間的關係時也明白指出，不同世代會有不同的事件回憶，而這些回憶是來自於青少年階段與早期成人階段（early adulthood）。因而，他們的看法，某種程度也較為支持 Mannheim 對於社會化形成期的說法。

更重視處於特殊歷史時期的人們受到社會或政治結構變遷的影響，而此世代概念的劃分操作就不會僅限於單一的年齡範圍之內。即採用此種觀點的世代研究認為，一個社會中存在的文化及政治的特殊歷史事件，比起特別針對出生時間為依據更能對世代進行有效的劃分，因為歷史經驗或社會意識是會在世代間進行傳遞或傳承。(Edmunds and Turner,2002)。

以上兩種對於世代的概念化操作，各有其立論基礎。然而，在兩相比較下，本研究較為認同後者的概念化操作，因為社會間存在的集體意識確實會在相近的年代中有所傳承，³⁵所以一個世代中存在的文化、政治與歷史環境的傳遞，比起只強調單一特定的出生時間與年齡所形成的世代更為重要。因此，在定義本研究黨工世代的操作上，將以強調歷史時期的世代取向為主。

換言之，本研究設定的「黨工九 0 前世代」指涉的是黨工在 1991 年以前約莫是處於 20 歲到 40 歲之間的年齡，³⁶至於「黨工九 0 後世代」則是以 1991 年時，處於 20 歲以下（不包含 20 歲）者定義之。關於劃分依據可參考下圖二。有了世代的區分後，本研究便是想透過黨工的世代間的差異，進而探討女性黨工對黨務工作看法是否有差異。



圖二、民進黨女性黨工的世代劃分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³⁵對此，Edmunds 與 Turner (2002) 舉美國例子說明，1980 年代的美國小孩仍對 1960 年代的反戰思潮有很強烈的認同感，這就說明 80 年代的文化與 60 年代的反戰文化 (protest cultures) 有所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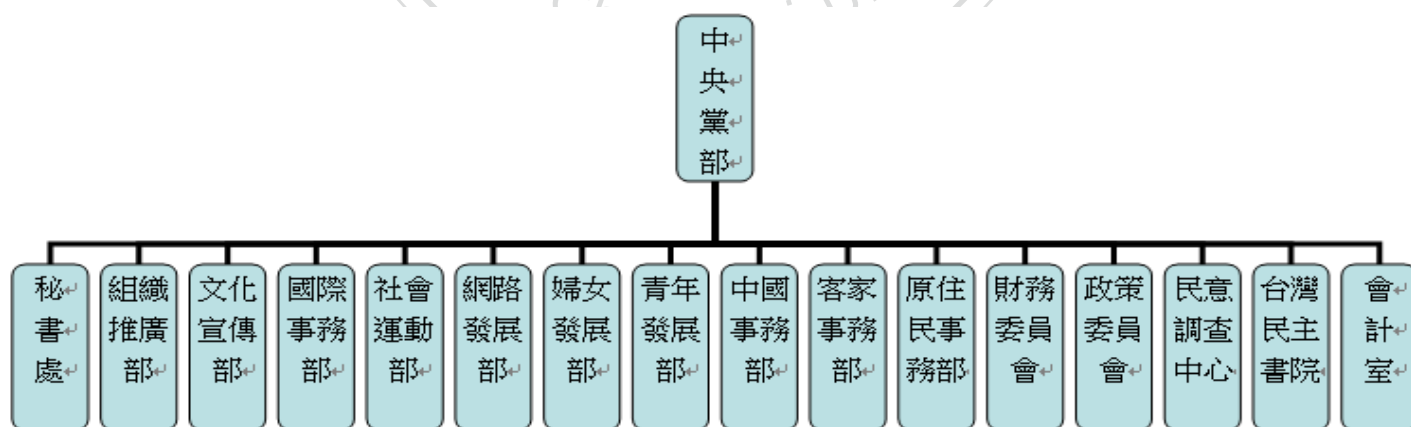
³⁶20 歲至 40 歲的認定乃參考自蕭阿勤 (2005) 研究，而該研究對於世代的區分，便是以強調歷史時期、歷史敘事的世代取向進行劃分。

第三章 研究現象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現象說明

一、民進黨組織及黨工規範

在民進黨組織架構中，根據最新於 2012 年 7 月 25 日第 15 屆第 1 次中執會修正通過的《中央黨部組織規程》中第 8 條規定，「中央黨部分設下列黨務工作單位：秘書處、組織推廣部、文化宣傳部、國際事務部、社會運動部、網路發展部、婦女發展部、青年發展部、中國事務部、客家事務部、原住民族事務部、財務委員會、政策委員會、民意調查中心、台灣民主學院、會計室。各單位之員額編制另訂之。中央黨部於必要時，經中央執行委員會同意，得增設工作單位。」其中，民進黨中國事務部先於 2007 年被當時的黨主席游錫堃廢除，並納入國際事務部，而 2012 年民進黨黨主席蘇貞昌才又於該年 7 月恢復設置中國事務部(李欣芳，2012)。總的來說，民進黨中央黨部組織架構共設有 1 處、10 部、2 會、1 中心、1 書院及會計室。組織架構圖請參考下表三。



圖三、民進黨中央黨部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繪。

在這些部門底下，黨工又是如何安排設置？綜合該規程第 9 條到第 24 條規定，綜述如下：秘書處、組織推廣部、文化宣傳部、國際事務部、社會運動部、網路發展部、婦女發展部、青年發展部、中國事務部、客家事務部、原住民族事務部、民意調查中心、台灣民主書院及會計室都設有主任一職，然而會計室的主任為常務職，其他部門的主任則為主席任命，與主席任期相同。同時，這些部門在主任之下，都有設置一到三人不等的副主任，以及副主任之下的「資深專員」、「組長」、「專員」及「幹事」若干人，皆為專任職。

國際事務部、中國事務部、民意調查中心則另有研究員及副研究員等職位設置。然而，財務委員會及政策委員會的設置則有別於上述幾個部門。財務委員會由十五到十九位組成，設有主任委員，經主席提名後須經中執委同意才得以聘任，其任期與主席相同；政策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則由主席擔任，政策委員共計二十一位到二十五位組成，與主席任期相同，其中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幹事長及書記長為該委員會的當然委員。這兩個委員會除了政務職之外，底下亦設有專任黨工若干人，職級如下：資深專員、組長、專員以及幹事。

另外，關於黨工規範，根據民進黨於 2009 年 4 月 1 日第 13 屆第 8 次中執會修正的《中央黨部黨部工作人員服務辦法》第 2 條關於黨工類別的規定指出，黨工分為政務性黨工及事務性黨工兩種。前者依民進黨規章規定有任期限制，須與主管同進退的政務人員，後者則指未須隨主管同進退之事務人員。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將以沒有任期限制，不會隨主管同進退的「事務性」的女黨工為主。

該辦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1 款也表明，黨工不得未經主席、秘書長等人同意，就參與黨內提名之任何公職候選人的競選相關活動，或參與其他政黨所舉辦的政治性活動。另外，第 2 項第 2 款也規定，黨工若要參選黨主席、中執委或中評委等黨職，必須先離職，才得以競選相關黨內職務。該兩條文都顯示出民進黨中央黨部規定，黨工須扮演好中立的行政角色。

關於任用方面，該辦法第 2 章第 5 條提到，主任以上的政務性黨工由主席任命，而副主任以下的政務及事務性黨工，只要由人評會核可即可，且一經認可應

於就任前先繳交入黨申請書等相關資料。而第 8 條更明確提到，除非有特殊情況，否則黨工應該具備黨員身分。從上述兩條文中可知，擔任民進黨黨工者必須先入黨，方可就任黨職。

二、性別相關規範

此外，本研究也特別針對民進黨黨職人員有關性別規範的法規做一整理，因為當一個政黨重視女性參政時，相關規範也會顯示出對女性參政有較高的保障，當政黨對女性參政越友善，女性也會有更多機會在政治場域中嶄露頭角。因此，透過了解民進黨內規中的性別規範後，本文認為這些性別規範可能對於女性黨職人員參與黨職工作，無論是參與動機上或是對工作的想像，都應該有直接或間接上的影響。

觀察民進黨法規中有關性別規範，可從民進黨黨章中有一清楚了解。根據民進黨於 2010 年 1 月 24 日第 13 屆黨員代表大會通過的最新黨章，第 13 條規範黨代表大會成員的條文指出，各縣市黨部選出之代表、各直屬黨部選出之代表，以及全國原住民代表，³⁷此三款代表的名額、比例及產生辦法另訂之，但「單一性別在總數中每滿四人應有一人」。在第 15 條關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執會）的組成方式也表示，全國黨員代表大會直接選出執行委員三十人，候補委員五人，執行委員並互選十人為常務執行委員，都應該滿足單一性別在選出總數中每滿四人應有一人。又在第 18 條中央評議委員會（中評委）組成人員規範是，中央評議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中，也要符合單一性別在總數中每滿四人應有一人之規定。

根據上述條文規定可以發現，全國黨代表大會之中的三種黨代表、³⁸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以及中央評議委員會成員等三個中央層級的黨職人員，在黨章中都

³⁷第 13 條規定的黨代表成員如下：縣市黨部選出之代表；各直屬黨部選出之代表；全國原住民族代表；現任中央黨部執行委員、評議委員、秘書長；現任縣市黨部及直屬特種黨部主任委員、評議委員會召集人；現任縣市以上民選首長之黨員；現任中央、直轄市及準直轄市民意代表之黨員；現任副總統、總統府秘書長、副秘書長之黨員；現任中央政府院長、副院長、秘書長、政務委員、部會首長及政務副首長之黨員；現任各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之黨員；歷任黨主席之黨員。

³⁸即前述：各縣市黨部選出之代表、各直屬黨部選出之代表，及全國原住民代表，三種黨代表。

明文規定：「單一性別在總數中每滿四人應有一人」。³⁹此一規定，過去又稱為黨職四分之一婦女保障，該制度保障可追溯至 1996 年底，長期在民進黨內部推動四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的婦女部主任彭婉如遇害談起，⁴⁰彭婉如於該年底遇害後，民進黨旋即於 1997 年 9 月 27 日的第 7 屆第 2 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中，以鼓掌方式通過「單一性別在總數中每滿四人應有一人」之規定，透過修改黨章的規定，來傳承彭婉如遺志，讓婦女在參與民進黨黨務決策時更有代表性(葉菊蘭，1998；黃長玲，2001)。

除了中央及地方黨職身分都有單一性別在總數中每滿四人應有一人之規範，在公職提名部分，根據 2011 年民進黨全國黨代表大會修正通過的《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中，第 8 條指出，各類公職之各選區提名名額中，除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外，每四名至少應有一名女性。⁴¹而關於不分區立委提名部分，該條例第 13 條舉出幾種提名方式，其中第二種提名規則提到，提名總額中每兩名應有一名女性。此一規定也有助於擴大民進黨中女性參政的空間。

根據上述法規規定，可知民進黨在不同階段正透過量變而質變的方式，來拓展其黨內婦女的參政空間，這不只影響了民進黨內女性政治人物有更多元的參政機會，同時也可能讓女性黨工在黨職工作參與上，⁴²有更多生涯規劃想像與參與政治的動機，並更可能藉此獲得工作上的成就與滿足感。

綜合上述，民進黨中央黨部共設有十六個部門單位，各單位之下的黨工另區分成事務性黨工及政務性黨工兩種，然而無論何種黨工類型，要成為民進黨黨工

³⁹其實，不只在中央層級的黨職人員有此一規定，在黨章第六章中關於地方黨部的規定，第 22 條地方黨員大會組織成員代表中，地方黨部選出代表、該縣市原住民族代表，也都要符合單一性別在總數中每滿四人應有一人之規定；同時，第 24 條，縣市黨部的執行委員會 9-17 人中，也要符合單一性別在總數中每滿四人應有一人之規定。

⁴⁰參見彭婉如基金會網站，<http://www.pwr.org.tw/about0.html>。(查詢日期：2013 年 4 月 23 日)。

⁴¹關於公職提名類別，該條例第 3 條規定，公職候選人分下列五類辦理提名：第一類：總統、副總統。第二類：立法委員。第三類：直轄市長、直轄市及準直轄市市議員、縣市長。第四類：縣市議員、鄉鎮市長。第五類：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第一類提名投票採一票制，副總統之提名人選，由獲得提名之總統候選人指定。

⁴²雖然上述法規多針對民進黨政務性黨工進行規範，然而，由於事務性黨工也可以轉為政務性黨工來競選黨內相關職位。因此，這些規範仍對於事務性黨工有間接性的影響。也就是說，事務性黨工也可能因黨內性別規範的友善，而對於黨務工作的認知有不同看法產生。

者就必須先加入民進黨。此外，就性別角度檢視民進黨相關法規可以了解，中央黨職中如中執委、中評委的組成都有明文規定，單一性別在總數中每滿四人應有一人；在公職人員提名辦法部分，更直接指出每四名至少應有一名女性的規定，顯示民進黨在相關規定上，給予了女性相當程度的參政機會與空間。針對上述法規條文的討論，本文以表格方式整理如下，請參見表二。

表二、民進黨中央黨部黨工相關法規整理

關於組織規範		
法規來源	法條全文	重點摘要
中央黨部 黨部工作人員服務辦法 第 2 條 界定黨工類別	本辦法所稱黨工係指經主席任命，或經人事評議委員會（簡稱人評會）通過聘用，並可支領薪資之黨務工作人員。黨工分為政務性黨工及事務性黨工。前者係指依本黨規章規定有任期限限制，須同進退之政務人員，後者係指未須隨主管同進退之事務人員。...	政務性黨工：如擔任各部會、處室主任，任期與主席同進退。 事務性黨工：無須隨主管同進退之事務人員。
中央黨部 黨部工作人員服務辦法 第 3 條第 2 項第 1 款 黨工中立規定	黨工非經主席、秘書長或督導副秘書長同意，不得參加或舉辦任何公職候選人提名選舉或黨職選舉參選人之競選餐會或競選活動，或非本黨舉辦之其他形式之政治性活動。	黨工非經主席或秘書長等同意，不得參加或舉辦任何公職候選人提名選舉或黨職選舉參選人的任何競選活動。
中央黨部 黨部工作人員服務辦法 第 3 條第 2 項第 2 款 黨工中立規定	黨工參選黨主席、中央執行委員、中央評議委員或二級黨部主委，應於登記前辭職。前列各項黨職出任黨工者，應於到職日前辭去該職務。	黨工若要參選黨主席等黨職必須辭去黨工身分才能就任該職。
中央黨部 黨部工作人員服務辦法 第 5 條	主任以上之政務性黨工由主席任命，副主任以下政務、事務性黨工由人評會核可。黨工正式任用後，應繳交身分證影本、黨證影本或入黨申請證件影本、學、經歷證件影本	擔任黨工須先入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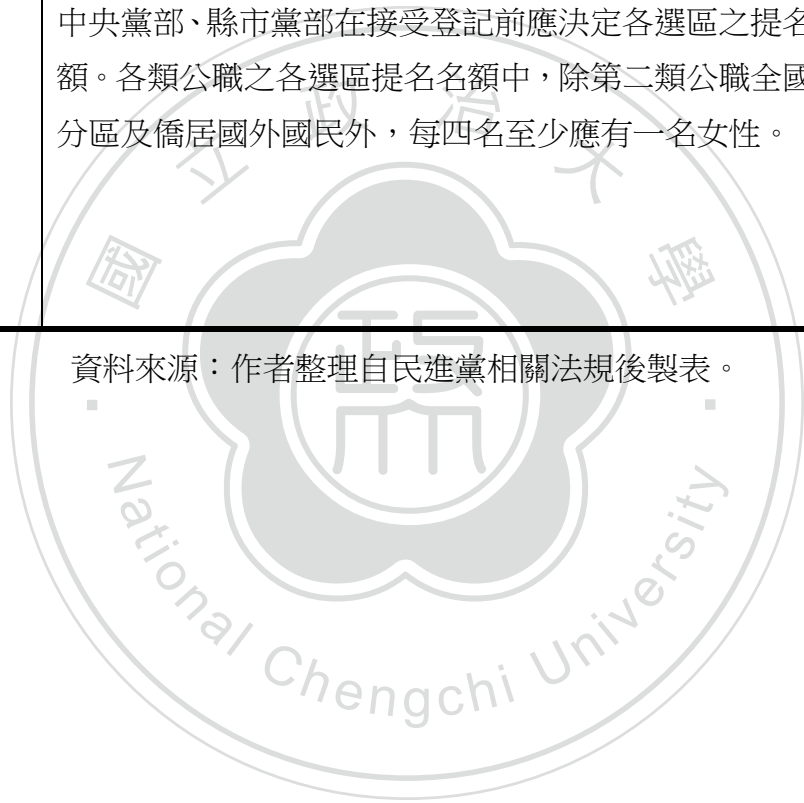
任用相關	以及填寫履歷表，人事資料由人事主管單位保管之。	
中央黨部 黨部工作人員服務辦法 第 8 條 任用相關	黨工應具備黨員身分，未入黨者，應於辦理入黨手續後予以正式任用。特殊情況經人評會同意無須入黨者，不在此限。	擔任黨工須先入黨。

關於性別規範

法規來源	法條全文	重點摘要
黨章 第 13 條 全國黨代表大會	<p>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之成員如下：</p> <p>(一) 各縣市黨部選出之代表。</p> <p>(二) 各直屬黨部選出之代表。</p> <p>(三) 全國原住民族代表。</p> <p>(四) 現任中央黨部執行委員、評議委員、秘書長。</p> <p>(五) 現任縣市黨部及直屬特種黨部主任委員、評議委員會召集人。</p> <p>(六) 現任縣市以上民選首長之黨員。</p> <p>(七) 現任中央、直轄市及準直轄市民意代表之黨員。</p> <p>(八) 現任副總統、總統府秘書長、副秘書長之黨員。</p> <p>(九) 現任中央政府院長、副院長、秘書長、政務委員、部會首長及政務副首長之黨員。</p> <p>(十) 現任各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之黨員。</p> <p>(十一) 歷任黨主席之黨員。</p> <p>前項代表任期二年，第一至第三款代表之名額、比例及產生辦法另訂之，但單一性別在總數中每滿四人應有一人。第四至第十款代表以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開會時在任、第八及第九款代表以入黨連續滿一年者為限。海外代表總數不得超過全國黨代表總額百分之五。</p>	各縣市黨部選出之代表、各直屬黨部選出之代表，及全國原住民族代表；單一性別在總數中每滿四人應有一人。

<p>黨章 第 15 條 中執會組成</p>	<p>全國黨員代表大會直接選出執行委員三十人，候補委員五人，執行委員並互選十人為常務執行委員，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但單一性別在選出總數中每滿四人應有一人。</p>	<p>單一性別在總數中每滿四人應有一人。</p>
<p>黨章 第 18 條 中評會組成</p>	<p>中央評議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候補委員三人，由全國黨員代表大會直接選出，但單一性別在總數中每滿四人應有一人，並由評議委員互選一人為主任委員，任期均為二年，連選得連任。</p>	<p>單一性別在總數中每滿四人應有一人。</p>
<p>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 第 8 條 提名規定</p>	<p>中央黨部、縣市黨部在接受登記前應決定各選區之提名名額。各類公職之各選區提名名額中，除第二類公職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外，每四名至少應有一名女性。</p>	<p>各類公職提名名額中，除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外，每四名至少應有一名女性。</p>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民進黨相關法規後製表。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討論民進黨女性黨工對於黨務工作的想像是否有其世代差異，而差異又有何程度及實質內涵的不同？在研究方法上，將採取量化資料作為研究對象的初步了解，並透過深入訪談法進行資料的詮釋與探討，以期能彌補兩者研究方法上的不足。

首先，在問卷調查方面，本研究使用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林瓊珠副教授所執行的國科會三年期計畫案「台灣政黨組織的持續與變遷：參與度」（計畫編號為：NSC99-2410-H-031-019-MY3），針對民進黨中央黨部黨務工作人員所執行的問卷調查資料，進行整體性的現象探討。⁴³關於該筆資料的取得，該計畫主要透過郵寄 120 份問卷至中央黨部進行全體性的調查，經研究人員的催收後共回收 60 份，回收率為 50%。本文選用的分析方式為，變數間的交叉分析與複選題交叉分析。關於變數使用與編碼請參見附錄一。

另外，在質化的資料蒐集方面，採用的是深入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這是質化研究中經常採用的資料蒐集方式之一，主要是考量到透過訪談，研究者可與受訪者進行一問一答，甚至是適度的追問問題，此一特點能讓研究者更加深入了解所欲探究的研究資訊。在研究對象挑選上，本研究鎖定為曾經或現任民進黨中央黨部事務性女黨工，並按照上述所劃分的兩個世代女性黨工（九 0 前黨工、九 0 後黨工）之出生年齡，挑選出符合該世代的訪談對象。

雖然影響黨工對於黨務工作的認知與看法可能不只受到世代差異的影響，還可能受到如教育程度、外部的政治機會結構改變及加入民進黨時間多寡等因素，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需要加以控制。但本研究在實際執行搜尋受訪者的過程中，並未先將進入民進黨成為黨工的時間點、教育程度以及黨齡等因素列入考慮。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礙於本研究無法事先取得民進黨現任或過去已離職黨工者的職

⁴³「台灣政黨組織的持續與變遷計畫」總主持人為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吳重禮研究員，「台灣政黨組織的持續與變遷：參與度」之子計畫，計畫主持人為東吳大學政治系林瓊珠副教授；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惟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員名冊，因此在找尋受訪者的過程中，僅能透過滾雪球（snowball sampling）的方式，找到相關受訪者。

如果將上述考慮因素列入搜尋受訪者的條件中，研究對象的人數便可能會因為這些額外的條件限制，更加難以找到合格的受訪者，即符合條件的女性黨工人數可能更少。因此，在實際執行訪談的過程中，我主要仍以年齡分佈與有從事事務性工作經驗者為主要的考量依據，並盡可能透過滾雪球方式網羅各種受訪對象。原則上每一位受訪者大多都是推薦一位新的受訪者給我，不過有些受訪者較為熱心會主動提供兩到三位新的受訪者名單給我。然而，這些推薦名單也並非透過接觸就能成功受訪，仍有數次被婉拒訪問的情況出現。

本研究執行訪談的時間為，2013年8月開始至2013年12月止，共計訪談十一位受訪者。這十一位受訪者中，有五位是訪談期間仍然在民進黨中央黨部任職者，其他六位受訪者則是在不同時間點已相繼離開民進黨中央黨部並從事其他工作或待業中。而無論是現任或已離職的受訪者，她們在民進黨中央黨部任職的部門經驗，幾乎都已涵蓋目前組織架構中的所有部門，這些部門包括：秘書室、組織推廣部、文化宣傳部、國際事務部、社會運動部、婦女發展部、中國事務部、族群事務部（現分開成客家事務部、原住民事務部）、財務委員會、政策委員會以及民意調查中心。同時，這些受訪者在民進黨中央黨部任職的職位，涵蓋層面也相當廣泛，包含幹事、組長、資深專員、事務性副主任，以及也有從事務性黨工轉為政務性黨工者，如後來擔任政務副主任的職位等。

此外，十一位受訪者中，有兩位教育程度為高中職畢業者，有三位擁有碩士學歷，其餘六位則是大學教育程度者。在入黨工作的時間點中，十一位受訪者有九位都是在民進黨尚未執政前就進入民進黨工作，並隨即於當年加入民進黨成為黨員（成為黨員與入黨工作時間相同）。另外兩位則是在執政之後才進入民進黨工作，不過這兩位受訪者還有一個共通點是，她們入黨成為黨員的時間都是早於她們進入民進黨工作的時間點（即先成為黨員後，才進去民進黨中央黨部工作）。

在黨齡方面，受訪者黨齡最長者是22年，最短是13年。受訪者的年齡分佈

情況，年齡最長者為西元 1966 年出生，最年輕者為 1980 年出生。關於受訪者的世代劃分，本研究主要依照前述將出生於 1971 年及以前者視為 90 前黨工世代，反之則為 90 後黨工世代。受訪者相關資訊請參考表三的整理。

表三、訪談對象一覽表

受訪者	受訪日期	進入黨部 工作時間點		教育程度	所屬世代	研究期間 工作情況	研究期間 婚姻情況
		年份	黨派				
小雅	2013/08/08	1995	在野	大學	90 後	在職	已婚
文琪	2013/08/27	1996	在野	研究所	90 前	在職	已婚
美香	2013/08/29	1991	在野	研究所	90 前	離職	單身
小雯	2013/09/06	1996	在野	高中職	90 後	離職	已婚
小靜	2013/09/10	2007	執政	高中職	90 後	離職	已婚
秀英	2013/09/11	1993	在野	大學	90 前	離職	已婚
小嘉	2013/10/16	1996	在野	大學	90 後	在職	已婚
小珍	2013/11/01	1995	在野	大學	90 後	在職	已婚
小佩	2013/11/01	2004	執政	大學	90 後	在職	單身
春華	2013/11/19	1996	在野	大學	90 前	離職	單身
君梅	2013/11/28	1993	執政	研究所	90 前	離職	單身

為了保護受訪者與研究倫理需要，表三所提到的受訪者名字都已經化為假名，這些化名與其本名並無任何關係。也就是說，化名並沒有取自本名中的任何一字（包含諧音），但為了能從名字中區分出兩個世代的黨工，我在為受訪者命名時，已將 90 前女黨工（年紀較長者）灌以兩個字的傳統中文名字稱呼，而較年輕的黨工則用「小」名的方式來稱呼。

研究期間，每次與受訪者訪談平均都有一個半小時到兩小時間不等，甚至有

少數一兩位曾聊到三個小時之久。訪談地點主要在民進黨中央黨部，若已離職則會前往該受訪者目前工作地點附近的咖啡廳，或其辦公室內進行訪談。我與每一位受訪者訪談次數絕大部分都是一次，只有一次因為整理訪談稿後發現有些問題尚未得到清楚的解答，而有透過網路郵件方式繼續追問。此外，訪談過程中，只有一位覺得錄音談話不自在，現場以筆記的方式做紀錄，其餘訪談皆有錄音，且在訪談完畢後一一謄寫成訪談逐字稿。

訪談內容主要包括，受訪者的個人背景（如教育程度、出生年、工作職位、負責業務等）、參與政黨工作的原因、在民進黨工作的經驗、對於民主價值的看法，以及受訪者的性別意識等面向，相關訪談大綱可參見附錄二。除了訪談大綱的問題外，我在進行訪談過程中，也會適時對受訪者的回應而加以追問，並在之後的訪談中，增加與補充相關的問題於訪談之中。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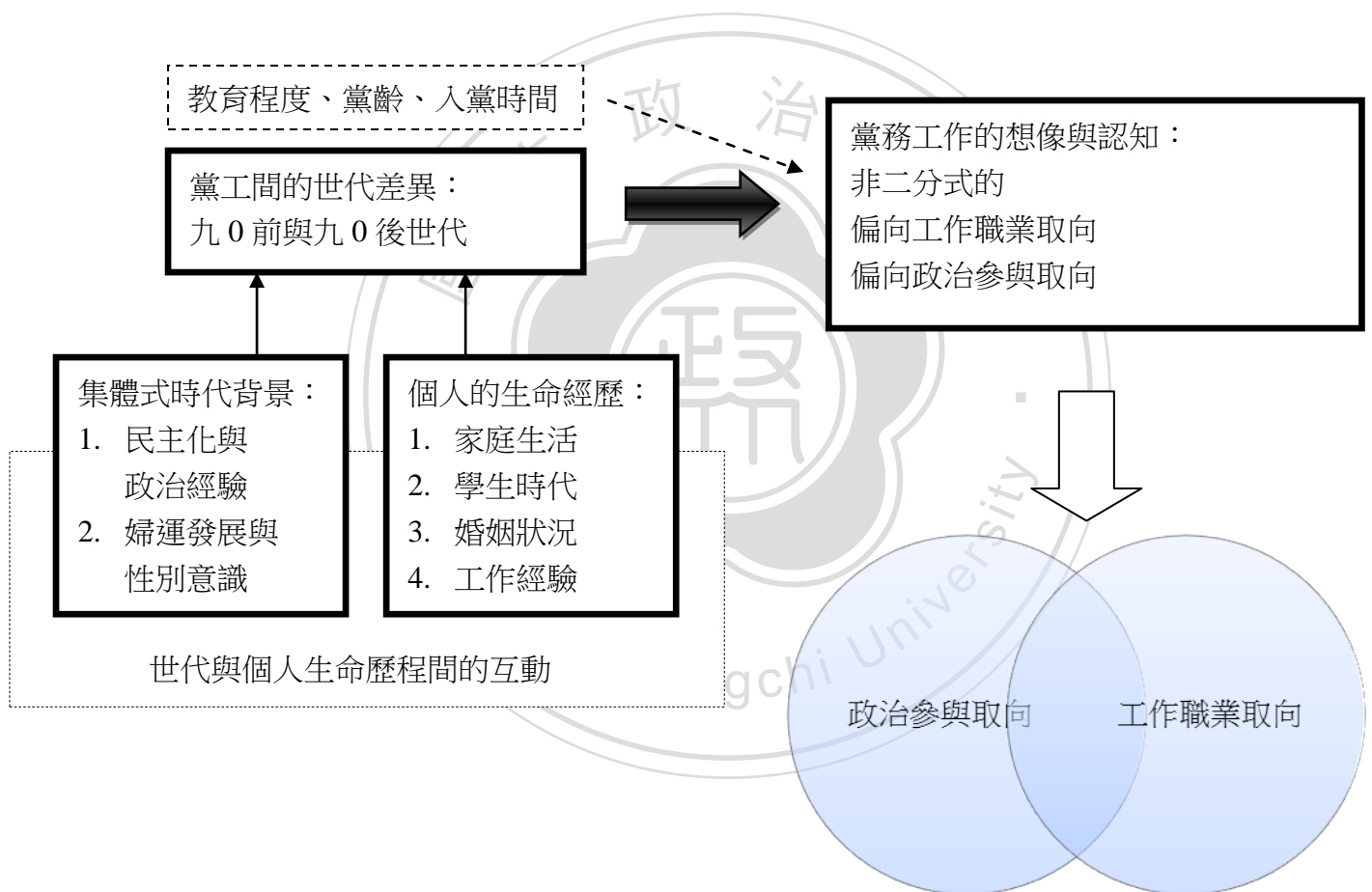
由於本研究旨在討論不同世代的女性黨工對於黨務工作的想像是否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又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差異？因此，依變數為女黨工對黨務工作的看法。在黨務工作的認知看法中，本文主要區分成政治參與取向與工作職業取向兩大類。然而，研究中區分這兩種分類並非認定黨工的認知是存在非一即二的特質，而是為了將女黨工在政治工作認知傾向上大致做出程度差異的分類。此外，本研究的主要自變數則是想透過世代的角度，去理解及釐清世代是如何對民進黨女黨工產生認知差異的影響。

本研究採用結合生命歷程與世代的研究途徑進行分析。因為影響世代間的群眾對於政治態度看法產生差異，一部分可能來自世代的社會化及集體記憶不同導致 (Braungart&Braungart,1985)。而對本研究來說，社會化及集體經歷的事件，一方面以前文所談論的民主化歷程的政治經驗與婦運發展的性別意識有關；另一方面，每個人的生命經驗與歷程也不容忽視，因為在不同的生命循環中，個人的行為或態度也可能有著轉變的契機，故在個人生命經驗中，本文亦將對女黨工的家庭、校園等進入民進黨工作前的生活經驗進行討論。然而，在此將生命經驗與世代的集體經驗分開論述，主要是想凸顯兩種途徑各自的重要性，但並非意指兩者沒有關聯，相反的，世代與個人生命經驗或許也存在複雜的互動關係。

不過，除了世代的主要自變數外，黨工的教育程度、黨齡長短，以及進入民進黨黨職的時間點（即執政或在野）等三項因素，也可能對於黨工看待黨務工作的想法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如前文所述，執政之後政黨所擁有的資源多寡有所不同，可能因此影響了黨工加入政黨或想參與政黨多少程度的動機；而教育程度則可能影響著黨工如何理解政治或對政治理解多少，以及涉及到的是黨工的社會結構背景及其所擁有的社會或政治資本多寡，因此教育程度亦可能對政黨的看法產生差異。最後，黨齡長短時常反映出黨工在黨部工作的時間長短，而工作的長短也可能會因為工作疲態，或其他工作遇到的困難與挑戰，使黨工對黨務工作的

態度產生轉變。

下圖四為本研究架構圖，教育程度、黨齡與入黨時間放置於虛線方框內，並用虛線箭頭連結到黨務工作的想像與認知的方框中。圖中虛線意思表示，教育程度、黨齡與入黨時間三者也可能影響黨工看待黨務工作的看法，但在本研究中並非最主要探究的焦點，故以虛線示之。而世代用實心的箭頭指向黨務工作認知，代表世代因素是本研究所欲探究的核心問題。故研究架構圖中用實線與虛線區隔主要用意在此。



圖四、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第四章 黨務工作的差異化認知

本章主要分成兩大部份，首先透過民進黨黨工的問卷資料加以分析，以整體性的觀點了解誰是民進黨黨工？民進黨黨工有何特徵？男女黨工加入民進黨的原因有何差異等。第二部份則是透過與民進黨女性黨工的深入訪談，用質性資料來細探民進黨女性黨工對於黨務工作的想像為何？兩個不同世代的黨工對黨職工作的看法差異又在哪？

第一節 民進黨黨工的初探

在量化資料上，本研究使用的問卷來自，東吳大學政治系林瓊珠副教授執行的國科會三年期計畫案「台灣政黨的持續與變遷：參與度」，針對民進黨中央黨部所執行的問卷調查。⁴⁴該筆資料是透過郵寄問卷的方式，請所有在中央黨部工作的民進黨黨工填寫。郵寄問卷的結果，雖然可能會因為樣本代表性不易掌握及回收率問題，難以做出嚴謹的統計推論或其結果可能備受保留(游清鑫，2009)。

然而，該筆資料重要之處，一方面是黨工資料取得不易，國內幾乎很少研究針對黨工參與政黨的面向進行大規模的資料蒐集，尤其是針對黨工的問卷調查，因此該份問卷資料有其重要之處。同時，本研究使用這筆資料的主要目的是想先透過初步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陳述與分析民進黨黨工年齡、教育程度與性別等黨工背景分佈情況，以期能對民進黨的黨工概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此外，透過這份資料也想了解，整體而言，黨工加入民進黨大致的原因有哪些？男女黨工在加入民進黨的主要原因可能有哪些不同？不同年齡層對於加入民進黨的原因又會呈現何種比例分佈？總之，透過該筆經驗資料，將有助於本研究以整體性的角度，了解哪些人參與了民進黨？這些人加入政黨的原因有何相似或相異處，進而藉此帶出本文的研究旨趣。

⁴⁴作者再次感謝瓊珠老師提供該筆資料於本論文中使用。

一、誰是民進黨黨工？

根據回收後的問卷分析，關於民進黨黨工基本的背景資料是六十位黨工中，扣除兩位未填答性別者，男性黨工為 46.6%，女性黨工則佔 53.4%。這樣的性別比例，看似女性多於男性，但實際上本研究在 2013 年 8 月訪問民進黨中央黨部時，當時黨部所提供的黨工人數指出，包含黨主席、政務性及事務性黨工在內，民進黨中央黨部共有一百三十五位黨職工作人員，其中女性黨工共有五十九位，約佔總黨工職人數的 44%；男性則有七十六位，約為 56%。⁴⁵

雖然前者資料呈現女性黨工多於男性黨工（46.6%與 53.4%相差約 7%），後者是男性黨工多於女性黨工（56%與 44%相差約 12%）。不過，嚴格來看，兩份資料中的男、女性黨工人數比例相差都不大，性別比例差距都接近 10%左右。也就是，無論根據哪筆資料都可以發現，民進黨中央黨部女性黨職人員比例都將近 50%。從這樣的結果來看，或許可以解讀成，政黨工作在過去雖然較被視為傳統男性涉足的工作場域。但時至今日，這樣的情況有所轉變，其中一項可能的原因或許是，在現今的政黨工作領域中，也存在許多非政治性或沒有這麼高度政治性的工作內容，使得民主時代中，有更多女性也開始積極地投入這份政治「工作」。

在年齡方面，問卷中黨工平均年齡約為 35.8 歲，年齡最小的黨工是 1991 年出生，而年齡最大者是 1965 年出生。整體來看，若以每十年為分層來看，20 到 29 歲有 26.8%、30 到 39 歲有 55.4%，而 40 到 49 歲則有 17.9%。從這樣的年齡分佈顯示，民進黨黨工職以 30-39 歲間的青壯年人為居多，超過 40 歲以上的資深黨工在黨部已不超過 20%。另外，就性別與年齡交叉來看，不同年齡層男女黨工比例參見表四。

⁴⁵兩份資料的結果呈現差異可能來自於，問卷資料雖請黨部所有黨工職人員協助填寫，但實際填寫人員或回收情況因難以掌握，或許多數配合填寫問卷者主要是黨部中較為基層的黨工職為主，而又根據訪談結果，不少女黨工提到黨內的許多一級主管或二級主管仍以男性擔任為主。或許在這樣的情況下，兩份資料的數據才可能不完全相同。

表四、不同年齡層的男女黨工人數比較

年齡層 \ 性別	男性黨工		女性黨工	
	人數	%	人數	%
20 到 29 歲	5	18.5	10	34.5
30 到 39 歲	15	55.6	16	55.2
40 到 49 歲	7	25.9	3	10.3
總和	27	100	29	100

資料來源：林瓊珠（2011）。

整體而言，男性和女性黨工在 30 到 39 歲這個年齡層都是所有年齡層中比例最高的。而女性黨工在 20 到 29 歲間的比例是高於男性黨工的人數比，40 到 49 歲間則是男性（25.9%）高於女性黨工（10.3%）。然而，若再以本研究針對民進黨女性黨工的世代劃分進行比較，符合九 0 前世代的女黨工只有 10.3%，而九 0 後世代黨工則有 89.7%，透過性別與黨工世代的交叉分析結果如表五所示。從世代區分上，更可以明顯看出在該研究的時間點中，民進黨中央黨部黨工多為九 0 後世代的青壯年黨工為主。

表五、不同世代男女黨工的交叉比較

世代 \ 性別	男性黨工		女性黨工	
	人數	%	人數	%
九 0 前世代	7	25.9	3	10.3
九 0 後世代	20	74.1	26	89.7
總和	27	100	29	100

資料來源：林瓊珠（2011）。

另外，資料也指出，這些在中央黨部工作的黨工加入民進黨的時間（黨齡）平均為 7.9 年。⁴⁶然而，當進一步詢問黨工在民進黨工作已經有多久的時間？⁴⁷該筆資料則顯示，黨工在民進黨工作的平均年數則只有 5.9 年。這樣的結果表示，黨工加入民進黨成為黨員時，並不代表黨工一定會同時進入政黨工作，有些情況可能是，先加入民進黨成為黨員之後的幾年才進入黨部工作。因此，兩者的平均年數才有此差距。關於黨齡與黨工在黨部的工作時間比較參見表六。

表六、黨工黨齡與在黨部工作的長短

單位：年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黨齡	58	1	21	7.88	5.43
黨部工作時間	58	1	16	5.93	4.18

資料來源：林瓊珠（2011）。

除了上述兩者的比較外，本文另外將黨齡進行初步劃分，黨齡為 5 年及以下者有 35.0%；6 到 10 年的黨齡者有 31.7%；有 11 年以上的黨齡者是 33.3%。從這樣的劃分來看，可以清楚發現，民進黨黨工的黨齡普遍是在 10 年以下者為多，因為黨齡在 10 年以下者就佔了全體黨工的六成六。

一般而言，黨齡的長短應該會反映出黨工年齡的多寡。也就是說，年齡越大，黨齡也應該越久。然而，如前述，有些情況卻不是如此，年輕黨工可能在尚未進入民進黨工作時就已預先入黨，而形成年輕黨工但黨齡卻「不年輕」的現象。不過，這樣的情況在民進黨內算是多數嗎？其實不然。

因為從表七黨齡和年齡層的交叉分析來看，黨齡在 5 年及以下者的黨工，有將近六成二是屬於 20 到 29 歲的年齡間；黨齡介於 6 到 10 年間的黨工，年齡最

⁴⁶測量的題目是：V01 首先，請問您加入民進黨有多久的時間了？（開放題）

⁴⁷測量的題目是：V19 請問您在中央黨部工作多久了？（開放題）

多是集中於 30 到 39 歲，佔該黨齡層中的 77.8%；最後，黨齡在 11 年及以上者，雖然實際年齡多集中於 30 到 39 歲間，但卻也與 40 到 49 歲間的差距極小。這樣的結果指出，普遍來說，年齡層較低者，黨齡普遍也較低；年齡層越高，黨工黨齡普遍也較高。

表七、黨齡與年齡層交叉比較

年齡層 \ 黨齡	5 年及以下		6 到 10 年		11 年及以上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20 到 29 歲	13	61.9	2	11.1	0*	0
30 到 39 歲	7	33.3	14	77.8	10	58.8
40 到 49 歲	3	4.8	2	11.1	7	41.2
總和	21	100	18	100	17	100

註：*根據民進黨黨章規定，黨員入黨最低年齡為 18 歲，除非 29 歲的黨工在 18 歲時就立即入黨，才可能有 11 年的黨齡。否則黨齡層 11 年及以上，在 20-29 歲間的人數為 0，也是符合常理。

資料來源：林瓊珠（2011）。

在教育程度方面，黨工中具有高中職學位者約只有 8.6%、專科學位者為 15.5%、受過大學教育者則佔所有教育程度的 44.8%，而擁有碩士及以上的學歷者也有 31.0%。整體而言，在民進黨中央黨部任職的黨工有超過一半以上都受過高等教育。然而，當加入性別變數來看教育程度之別時，表八的資料指出，該份問卷的受訪者中，男女性黨工的教育程度也多集中於大學及專科教育者。但教育程度較低的高中職學歷，女性人數是高於男性黨工。而在大學及專科的教育程度上，女性黨工的人數（61.3%）也略高於男性黨工（59.3%）。不過，在碩士及以上的學歷中，男性比例又略高於女性黨工。

表八、教育程度三分類與男女黨工的比較

教育程度 \ 性別	男性黨工		女性黨工	
	人數	%	人數	%
高中職	1	3.7	4	12.9
大學及專科	16	59.3	19	61.3
碩士及以上	10	37.0	8	25.8
總和	27	100	29	100

資料來源：林瓊珠（2011）。

該問卷透過全查的方式，請所有政務性及事務性黨工填寫問卷，雖然回收率並非百分之百，且經過時間的變動，在中央黨部任職的黨工，可能會因為去留而有人事組成特徵的比例更動，特別是經歷不同黨主席時，政務性黨工勢必會跟隨主席任期而離職。⁴⁸因此問卷結果雖然無法直接進行推論，或直接代表整個民進黨人事的組成現況。然而，就以整體性的概況來講，這份問卷仍然可以提供我們對於民進黨黨工的組成背景有一個大致上的參考。

因此，綜上所述，在民進黨黨工的特徵分佈上，可以了解女性黨工雖然仍然少於男性黨工（若以訪談資料來看），但兩者的人數比例差距並不懸殊；黨工的年齡層方面，總體而言，多數仍介於 30 到 39 歲間的年齡層，黨工普遍是較為年輕的青壯年；教育程度方面，無論男女黨工，都有超過一半以上的人是接受過大學及以上的教育，意即在中央黨部中，教育程度在大學以下者的比例並不高。此外，黨齡越高者往往也代表其本身的年齡越長。初步了解民進黨黨工組成的大致背景後，接著要探討的是，那麼這些黨工因為什麼因素想要加入民進黨呢？

⁴⁸其實不只政務性黨工去留較為頻繁，事務性黨工也因不同部門而有不同程度的人事流動，根據訪談結果，有受訪者指出，「我在 XX 部門待了 17-18 年...而其他同仁也都待蠻久的，...政務的來來去去，那事務的有一個待比較久就可以知道整個的傳承東西這樣，因為像有些部門其實連事務性的黨工都是很不安定的。可是我覺得...我們蠻多同仁都待蠻久的。」

二、加入政黨的原因？

黨工基於什麼因素加入民進黨？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雖然黨工加入政黨原因與對政治工作的想像並非是完全相同的命題，但從加入政黨的原因中亦可初步推敲黨工是如何看待政黨，或者一開始進入政黨時，黨工們的動機、念頭為何？釐清這部分的問題，將有助於了解黨工看待黨務工作的認知緣由。整體而言，從該份問卷分析可知，⁴⁹大多數的黨工都是因為喜愛支持政治人物而加入民進黨，選擇這個選項的比例有44%，其次為認同政黨理念（42%），再者為工作因素（8%），相關數據請參見表九。

表九、黨工加入民進黨的原因之複選題分析

加入民進黨原因	個數	%
認同政黨理念	42	42.0
可享多種福利	1	1.0
認識新朋友	4	4.0
喜愛或支持政治人物	44	44.0
工作因素	8	8.0
政黨輪替	1	1.0
總數	100	100

資料來源：林瓊珠（2011）。

若從性別角度來看，大致上也呈現出類似的結果。表十的資料顯示，在男性黨工方面，選擇喜愛或支持政治人物而加入的選項比例將近九成（88.9%），而女

⁴⁹本文分析使用的問卷題目是：V03 請問您那時候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加入民進黨的？該題設計為複選題，請受訪者選出最多三項的加入原因。因此，在此部份本文採用的統計分析方法為複選題分析法，將受訪者選出加入原因的選項進行次數分配與交叉表分析，進而了解各選項被選出的次數，以及與相關變數之間的關連性。

性黨工選擇因為喜愛或支持政治人物而加入的比例也有69.0%；在認同政黨理念方面，男性黨工在選擇加入原因的選項中，有85.2%的黨工認為自己也是因為認同民進黨的理念而加入，女性黨工選擇政黨理念因素選項的比例也有65.5%。

此外，在認識新朋友的誘因中，男性黨工有7.4%的比例表明自己亦是因此而加入民進黨，女性黨工則有6.9%的比例選擇該選項；最後在可享有多種福利以及表明是因為政黨輪替而加入者，男性方面也都有3.7%的黨工選擇這兩個選項，而女性黨工在這兩個選項上都沒有人選擇。

表十、黨工加入民進黨原因與性別間的複選題交叉表分析

加入民進黨原因	男		女		總數
	選項次數	%	選項次數	%	
認同政黨理念	23	85.2	19	65.5	42
可享多種福利	1	3.7	0	0	1
認識新朋友	2	7.4	2	6.9	4
喜愛或支持政治人物	24	88.9	20	69.0	44
工作因素	4	14.8	4	13.8	8
政黨輪替	1	3.7	0	0	1
總數（選項）	55		45		100
個數（受訪者）	27		29		56

註：%為直欄百分比

資料來源：林瓊珠（2011）。

不過，根據上述結果發現，就算民進黨的相關規範中已明確表示，成為黨工前，必須先加入民進黨才能就任。然而，男女黨工在選擇當時加入民進黨的原因時，仍然都有許多不同的考量因素，無論是支持政治人物、認同政黨理念或因為

工作因素等誘因顯示，黨工加入民進黨的背後都有更深層或更多樣的原因考量。

此外，當再細究女性黨工加入民進黨的原因時，有黨工表示加入原因是因為工作需要，這樣的結果也提供了女性黨工對於加入政黨的另外一種看法。也就是黨工們並非完全都是出自「政治性」的因素加入政黨，而仍有其工作上的物質性誘因考量。故從加入民進黨的原因中，反映到本文的研究問題或許也能指出，女性黨工對於黨務工作的想像，除了有政治性的參與認知外，也應該有其他的認知選擇空間，比方說認為黨務工作就是一份工作或一種職業選項的認知。

教育程度方面，表十一結果顯示，教育程度差異似乎並非影響黨工加入政黨的主要原因，因為無論是高中職、大學與專科或碩士以上的黨工，在選擇認同政黨理念與喜愛或支持政治人物的選項比例上幾乎相近。

表十一、黨工加入民進黨原因與教育程度的複選題交叉表分析

加入民進黨原因 選項	高中職		大學與專科		碩士及以上		總數
	選項次數	%	選項次數	%	選項次數	%	
認同政黨理念	3	75.0	25	73.5	14	77.8	42
可享多種福利	0	0	1	2.9	0	0	1
認識新朋友	0	0	4	11.8	0	0	4
喜愛或支持政治人物	3	75.0	25	73.5	16	88.9	44
工作因素	0	0	6	17.6	2	11.1	8
政黨輪替	0	0	1	2.9	0	0	1
總數（選項）	6		62		32		100
個數（受訪者）	4		34		18		56

註： %為直欄百分比

資料來源：林瓊珠（2011）。

再從黨齡來看，黨齡的長短是否在黨工加入政黨的原因中也產生不同趨勢差異？從表十二中發現，黨齡在5年以下者，他們在加入民進黨的原因中，最多被選擇的選項是因為喜愛或支持政治人物而加入（78.9%），其次是認同政黨理念，選項次數的百分比有63.2%；選擇工作因素而加入民進黨者為排序第三的選項因素（21.1%）。而黨齡介於6到10年的黨工，與黨齡在11年以上的黨工，這兩個黨齡層的黨工在選擇加入民進黨中，選擇最多的因素是認同政黨理念，其次才是喜愛或支持政治人物。

表十二、黨工加入民進黨原因與黨齡長度的複選題交叉表分析

加入民進黨原因	5年及以下		6到10年		11年及以上		總數
	選項次數	%	選項次數	%	選項次數	%	
認同政黨理念	12	63.2	14	71.4	16	88.9	42
可享多種福利	1	5.3	0	0	0	0	1
認識新朋友	3	15.8	1	5.3	0	0	4
喜愛或支持政治人物	15	78.9	13	68.4	16	88.9	44
工作因素	4	21.1	3	15.8	1	5.6	8
政黨輪替	0	0	0	0	1	5.6	1
總數（選項）	35		31		34		100
個數（受訪者）	19		19		18		56

註：%為直欄百分比

資料來源：林瓊珠（2011）。

該結果可結合表七針對黨齡與年齡層的交叉分析一起解讀。根據表七得出的結果，黨齡越長通常也代表受訪者的年齡就越長。也就是，當我們在分析黨齡長短的背後，也不能忽略黨齡與年齡間的問題。而若從黨工年齡來分析他們為什麼

會想進入民進黨工作？年齡背後所隱藏的時代背景、政治事件的經歷也是討論世代差異的關鍵之一。

因此，同樣有著時間的概念意涵，接下來要分析的是依照本研究用性別世代概念所劃分的黨工九0前與九0後世代間，對於加入民進黨的因素有何差異的探討。表十三複選題交叉分析可以清楚看到，九0前的黨工世代每一位受訪者都有勾選自己是因為認同政黨理念而加入民進黨，因此在認同政黨理念的選項中的比例是100%，其次才是選擇喜愛或支持政治人物（70.0%）而加入。

表十三、黨工加入民進黨原因與世代間的複選題交叉表分析

加入民進黨原因 選項	九0前世代		九0後世代		總數
	選項次數	%	選項次數	%	
認同政黨理念	10	100	32	72.7	42
可享多種福利	0	0	1	2.3	1
認識新朋友	0	0	3	6.8	3
喜愛或支持政治人物	7	70.0	36	81.8	43
工作因素	1	10.0	7	15.9	8
政黨輪替	0	0	1	2.3	1
總數（選項）	18		80		100
個數（受訪者）	10		44		54

註：%為直欄百分比

資料來源：林瓊珠（2011）。

反觀九0後的黨工世代，表中六個選項都有黨工選擇，其中選擇最多的是因為喜愛或支持政治人物而加入（81.8%），第二才是認同政黨理念，佔該世代選擇所有選項中的72.7%。而選擇因為工作因素進入民進黨則為所有選擇選項中排

序第三。該結果顯示，不同世代的黨工對加入政黨的原因確實有些許差異。而存在這樣的差異，可能是因為世代間黨工對政黨或政治的集體記憶不盡相同，使得不同世代的黨工對於加入政黨的想法產生差異。

無論從黨齡或者性別世代的區分再再都示，這兩個與「時間」概念有關的變數，可看出黨工對於加入民進黨的原因皆有相似的趨勢。而會出現這樣的結果或許可以理解成，這兩個變數在時間概念上都有重疊的部分。比方說，在黨齡層的概念上與世代劃分最大不同就在於，黨齡不是以受訪者的出生年為界定依據，而是以黨工在民進黨工作的年數作為劃分，也就是以每5年為一個黨齡層做為區分。不過，在時間的概念上，如前述，黨齡的長短基本上仍與受訪者的年齡與世代呈現正相關，意即普遍來說，年齡越大或屬於年長世代的黨工，通常黨齡也會越長。

然而，也有些例外的情況，例如前文曾提及過的，有些黨工是先加入民進黨成為黨員之後的幾年，才進入中央黨部工作，因此形成所謂年輕黨工但黨齡不年輕的現象，而這種情況卻是以世代作為時間概念難以處理的部分之一。若以性別世代的劃分方式，這些黨齡長但年齡卻較年輕的黨工，在分類上是歸類於年輕世代的黨工群，而不會因為其黨齡長而屬於年長的黨工世代。這也代表黨齡層有著無法反映時代背景觀的問題。換句話說，以這兩個變數而言，黨齡雖與年齡的時間概念有關，但黨齡層仍然並不能直接反映出黨工的年紀大小。因此，在分析上需要特別注意，世代的劃分是無法完全涵蓋黨齡長短與黨工年紀間例外的部分。

但整體而言，如果「年輕黨工但黨齡不年輕」的現象或例子不多，又或者黨齡與年紀雖有差距，但這差距不大，那麼或許仍然可以從世代的時間角度，來解讀這兩種劃分方式所呈現的結果為何如此相似？因為，從世代的劃分概念中，某種程度也大致涵蓋了以黨齡層劃分的「相對」時間觀。⁵⁰同時，性別世代更補足黨齡劃分方式中缺少的時代背景觀。總之，這兩種概念應是彼此交疊但亦有意義上的些許差異。關於世代與黨齡間的概念交疊的比較請見下表十四。

⁵⁰所謂相對的時間觀本文指的是，黨齡越長者，也大多是年長世代黨工。

表十四、本研究中的世代與黨齡層的時間概念之異同比較

關於時間變數	世代	黨齡層
劃分類別	九0前世代 九0後世代	5年以下 6到10年間 11年以上
劃分依據	受訪者出生年	受訪者工作年數
劃分方式	1971年為界分兩世代	每5年為一黨齡層
劃分概念	考慮到時代背景中的政治及性別意識的社會氛圍。	以黨部工作年份劃分，較無法了解黨工是身處於哪種時代背景。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此外，為了清楚呈現上述所有變數與加入原因之間的趨勢發展，表十五整理了教育程度、性別、黨齡與世代等差異之黨工加入民進黨前三名的原因排序。總體來說，從下表整理結果與上述的討論得知，兩性及教育程度的差異，對黨工在選擇加入政黨原因的排序上尚無太大差別。而黨工加入政黨的原因，在選項比例上產生差異則主要反映在世代和黨齡的劃分上。

如前述，世代與黨齡在時間的概念上經常是疊合的情況，即屬於年長世代的黨工，往往黨齡也會偏高。在資料分析上，我們初步看到，九0前後的世代在加入民進黨工作的考量中，似乎已有些微不同。然而，在此必須說明的是，本節在分析黨工加入民進黨的原因中，許多黨工選擇加入原因無論是「認同政黨理念」或「支持喜愛黨內政治人物」，這兩大選項也並非是截然一分為二的概念。

因為選擇支持或喜愛黨內政治人物的原因，並不表示這個原因在內涵上就一定不包含政黨認同的理念，只是這個選項在概念上更加著重黨工對某些民進黨政治人物的認同。因此，相較來說，年長的九0前黨工世代似乎更強調「認同政黨

理念」這個更加直接觸及理念認同的選項。

表十五、黨工加入民進黨選擇最多的三個因素排序

加入原因排序		第一	第二	第三
性別	男性	支持黨內政治人物	認同政黨理念	工作因素
	女性	支持黨內政治人物	認同政黨理念	工作因素
教育	高中職	支持黨內政治人物 認同政黨理念	(前兩個因素比例相同)	無
	大學專科	支持黨內政治人物 認同政黨理念	(前兩個因素比例相同)	工作因素
	碩士及以上	支持黨內政治人物	認同政黨理念	工作因素
世代	九0後黨工	支持黨內政治人物	認同政黨理念	工作因素
	九0前黨工	認同政黨理念	支持黨內政治人物	工作因素
黨齡	5年以下	支持黨內政治人物	認同政黨理念	工作因素
	6-10年以下	認同政黨理念	支持黨內政治人物	工作因素
	11年以上	認同政黨理念	支持黨內政治人物	工作因素

資料來源：林瓊珠（2011）。

不過，量化的經驗資料只能呈現黨工整體的差異情況，對於性別世代究竟在女性黨工中存在何種更加細微的差異，以及究竟什麼原因導致兩個世代的女黨工看待黨務工作可能有所差異？這部份則需要透過訪談進一步了解。

第二節 政治理想與工作現實間的拉扯

民主進步黨自 1986 年 9 月 28 日創黨以來，便經歷許多大大小小的選舉洗禮，雖然過程中有起有落，但民進黨仍然逐漸從過去一個制度尚未發展齊全的政黨，到現今成為台灣政壇中能與國民黨相比擬的主要政黨之一。這樣的成長與發展，除了歸因於民進黨不同時代的政治人物努力外，幕後的工作人員在黨部的付出更是成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推手。而黨工，特別是女性黨工在這樣傳統充滿男性文化經驗的政治（也是工作的）場域下，如何與民進黨一起共事？如何看待這份政治工作？將是本節以下要討論的重心。

一、政治理念重過一切

任何一個政黨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隨著時空背景與政治情勢不同，會遇到不同的困難與挑戰。無論是草創時期，還是到現在成為一個成熟的政黨組織，民進黨都必須不斷地回應不同時代所產生的不同問題。這些問題有可能是源自政黨內部的，但也會來自政黨以外。然而，能夠使問題得以解決，很大一部分與政黨內的工作人員息息相關。但民進黨中央黨部的黨工組成，不可能始終如一，人員會因為各種因素或理由來來去去，不同時代背景的女黨工就這樣與不同發展時期的民進黨產生微妙的牽連關係。而這樣的時代變化，勢必使參與其中的女性黨工看待民進黨這份「工作」的角度產生不同。

那是個什麼都缺乏的年代

美香是個將近五十歲的「前」民進黨中央黨部黨工，大學畢業就進來民進黨工作，那年是 1991 年也是民進黨成立後的第五年。回憶起剛進民進黨工作的那段時間，美香充滿感性的說，「那時，台獨黨綱剛剛通過，還有新的黨主席選上，就是選上還沒交接，我大概是黃信介進去，1992 年也面臨到國代的全面改選，民進黨當時人力吃緊，…，整個黨部還在草創時期，1991 年進來時，民進黨還

曾有傳出解散的風聲，當時可說是民進黨的風雨飄渺之時。」美香進一步說明：

其實那時候必須講，民進黨還是很有草創性，雖然那時候已經第五屆了，已經第五屆黨主席了，然後江鵬堅、姚嘉文，第五屆選第六屆，可是你會發現他們（指民進黨）那邊沒有很清楚的管理，就是上班到底誰來上班？要做什麼事都搞不清楚這樣子，然後後來我們進去之後，我們就有在討論，幫我們（指黨工）也幫他們，⁵¹我們幾個比較年輕的黨工也幫他們草擬黨務比較完整的工作辦法。

根據她的說法，民進黨在 1990 年代初期，黨部人力吃緊，連同主管職黨工才二十幾位，工作制度與黨工服務辦法都尚未成立，是一個極需建立管理制度的組織結構。由此可知，當時民進黨除了要面臨外部的選舉壓力外，首先還得面對的是黨內制度不完全的問題。那麼，在民進黨相較艱辛與資源匱乏的時代中，為什麼美香還是毅然決然大學一畢業就進入民進黨工作？其實，畢業後美香也不一定非選擇民進黨這份工作不可，因為同時間家人也透過關係，安排她進入一個工作環境與待遇都比民進黨好的工作機會，父母親的態度是希望她不要走政治工作這條路，但美香不接受父母親的安排，原因是她政治犯的遭遇是有情感意識的：

那個時候，還算是整個全面監控的時代，你看那些美麗島審判，他們並不是軍人，然後呂秀蓮，對不對？然後，陳菊這些都不是軍人，然後像姚嘉文那些全部不是軍人，可是他們就被軍事審判。雖然我們那個年代已經沒有，就是說我接觸到的政治犯已經開始陸續出來或者說海外的要回來，那因為我從過程裡面發現說，妳（指自己）身邊這麼多，看起來也不像那種殺人放火，看起來這麼正常的，又這麼優秀的年輕人會通通坐過牢？這些都是政治犯，那這些政治犯他們也算是有意識的政治犯，你就覺得說，那他們覺得我願意犧牲。所以呢，我（指政治犯）就算是坐牢也沒有什麼！不過，……。就是說台灣經過那樣歷史的過程，也許是我家也有親戚是政治犯吧，我對國民黨將有意識的政治犯，讓他們面臨牢獄之災我覺得非常不滿！不過，當時一方面也是覺得這個工作應該很有趣，所以在這樣的種種機會下就進來了。

⁵¹括弧內的文字（ ）係為作者為讓閱讀更加順暢，因而自行標註說明。以下引用訪談對話時，若遇文字使用上較不明確的句子時，也會用同樣的處理方式。

美香雖然早已在 2003 年離開民進黨中央黨部的工作，但在訪談過程中，還是可以發現，她對民進黨的理念堅定不移（或者說她對政治仍然充滿熱情），因為她不只一次陳述時代背景下所產生的政治犯對台灣民主所做的犧牲，她更不時在對話中強調台灣主體性的重要，並抨擊當前國民黨主政下的台灣，亂象重生，甚至直言「台灣還沒有真正的民主化」。所以，當我更進一步直接詢問她，對於黨務工作的認知是較偏向政治理念還是一份工作的看法時，她不加思索的回答：

「如果只當成一般工作，上班等下班，其實在民進黨會待不久，對這個工作要有政治信念，我是覺得這份工作是在幫台灣人服務，並非一般的工作職業類別。」

類似美香的想法，還有小她一歲的文琪。不過，由於文琪大學畢業後，就出國念書，她進入民進黨的時間比起美香晚了五年，也就是在民進黨成立後的第十年進來中央黨部工作。文琪對於在民進黨工作的看法有更直接的表示：

我覺得我不會把它視為一般的工作，因為我來這邊工作是有一種使命感，對於政治有想改革，對於政治有使命感，對於參與政治覺得是一種榮耀，但也不一定是榮耀啦，就是有使命感，不單只是一般工作。

訪談過程中，文琪也透露，自己也曾有參選的念頭，「年輕的時候有想要從政，但等到自己也涉入政治領域後，對於參選這種事覺得有點太複雜，要處理很多事，並不是這麼容易，所以可能還是做政治幕僚為主。」不過，在黨部當幕僚對文琪來說，除了是一種使命感外，更是她生命中一個重要的人生經歷：

我覺得對我來說，就是第一想為國家做點正向的改變，再來就是我參與政治的其中，也參與了一些國家的變化，例如政黨輪替，我們經歷了民進黨爬到最高峰，但也看它（民進黨）從最高峰走下來，這是一種人生經歷。

不在乎民進黨窮，只在乎理念連結

同樣在早期進入黨部工作的還有秀英，她是在 1993 年進入民進黨工作。當時的民進黨除了像美香提到的，許多的組織制度都還沒建立外，秀英更表示，「我覺得當年我們很窮，當年黨部很窮的，我是沒有經歷過薪水發不出來，但我後面的人有經過薪水發不出來的階段。」同樣的，既然秀英覺得民進黨很窮、資源很少的情況下，為什麼還願意進來工作？

因為學運關係，那你知道學運之後，大家會去尋找跟自己其實意識型態大概都是類似的。但是你就是會去尋找自己比較有興趣的出口，你會把興趣跟人生大概做一個比較...一個連結。我覺得「那個年代的我們」，理想性比較高。哈哈。好像會覺得去賺比較多的薪水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不是挺重要的。我是說指我們「那一群人」，⁵²我不是指所有人。

從她的回答反映出，當時的秀英對於政治的理想與熱情是強烈的，因此當她離開校園進入社會後，她並非選擇薪資福利較好的其他工作，反而選擇進入與自己理念相近的民進黨。除了這三位，訪談過的受訪者還有春華（1996 年入黨工作）也有類似的看法，甚至春華對於這份工作的認知，就曾向我堅定地表示，「這是一個志業」。春華會有這樣的看法，主要是來自她對民進黨是有高度期許的：

我始終認為說，民進黨是比起當初執政的國民黨，民進黨是值得被我們期待的，它不管是在政治的推動上面，還是在社會改革推動上面，它的確是從台灣本土長出來的東西，它看到的東西都是以台灣為主的，所以對我們這種對台灣有非常強烈感情的人，它是一個可以實現我們期待與想像的那個政黨。

春華在回應中表示自己是對台灣有強烈情感的人並且對於民進黨有著相當

⁵²在該段談話中，我將「那個年代的我們」以及「一群人」用引號標註，是因為秀英在談這段經驗時，特別強調「我們那一群的概念」。

高的期望。因此，她會進入民進黨工作，無疑的也是一種出自對民進黨有著強烈的認同感受。另一個例子則是君梅，她出生的年代也是屬於 1960 年代的晚期，大學一畢業後，隨即就在 1993 年進入民進黨工作，對於黨務工作的看法，她很直接也很明白的告訴我：

我大概有八成是因為價值的認同吧，那其中有兩成就把它當成一般工作吧，很少有人把它當成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因為它待遇並不是很好，如果沒有一些認同的話，通常不會在裡面待這麼長的時間。

君梅的回應同樣告訴我們，政黨工作並非是一份「好」的工作，會選擇薪資待遇不怎麼好的工作，其背後一定有著更高的理念價值在支撐，而這種更高的價值理念就是對於民進黨強烈的政黨認同。

總而言之，無論是美香因為不滿政治犯被羅織罪名而受牢獄之災；還是文琪與春華對政治充滿熱情與期待，把政治工作視為一種使命感；又或者是秀英與君梅這一類型，比較不在乎工作的金錢報酬，她們覺得自己的理念和興趣相符合的工作才是應該追求的等等情況。

從她們的回答中都可以發現，屬於她們那個時期進入民進黨的黨工們，對於政治都是較有理想性，而這種對於政黨或政治有高度理想的原因，可能是由許多面向因素組合而成，但這裡先不討論究竟為什麼她們會都有較多的政治熱情。這裡要談到的是，她們對於黨務工作的看法，最終都可以歸因於出自對民進黨的政黨理念與認同所致。而這些人，除了都高度認同民進黨的理念外，還有一個特徵就是，她們都是屬於民進黨較為年長的黨工世代，亦即出生於 1971 年以前的「九 0 前的黨工世代」。

二、政治熱情的下降與新世代的加入

新世代的故事就從 1975 年出生的小雯開始講起。小雯在高職畢業後，一心嚮往娛樂圈工作。因此，她在進入民進黨工作前，曾經如她所願在娛樂圈工作兩

年。然而，最終因為家人反對娛樂圈的工作時間不穩定，因此有了轉業的念頭：

因為娛樂圈的工作時間比較不穩定，可能凌晨四點才下班，也是因為家裡的人冀望說要找一個朝九晚五的工作，那剛開始進入中央黨部會認為，○○○這個單位，⁵³它是一個可能是朝九晚六的工作。

對於進入民進黨工作，小雯覺得這份工作在工作時間方面，是符合她所期待的工作類型，而她也認為，政黨工作是一個相較來說較為穩定的工作類型。小雯說，「因為我會覺得每個人的個性不同，有的人可能適合去選舉，有的人可能適合當地方性的幹部，像我是求一份穩定的工作，也不會失去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會覺得在行政單位裡是比較符合我自己的個性。」

從她的說法可以了解，她在民進黨工作並沒有更高的政治企圖心，只想做好行政工作，小雯主要是從工作時間的穩定性來尋找自己想要就業的工作類型。所以，當我進一步直接向她詢問，對於黨務工作的看法是比較偏向一種工作的認知呢？還是有參政上的意涵？她直接回覆說：「對我來講它就是一個工作。」

意外的，政治生涯

同樣屬於年輕世代的黨工，小嘉的看法與小雯有些類似，但與小雯不同的是，小嘉是大學畢業，民進黨工作是她第一份的正職工作，而且在我研究期間，她仍然在中央黨部任職，而小雯則已於 2013 年離開中央黨部。小嘉剛從大學畢業時，那一年，她跟一般的大學畢業生並沒有什麼不同，一畢業之後，就得馬上面臨就業壓力。小嘉透露，她會進來政黨工作其實都是個偶然，因為她從未想過要走政治工作這條路，當時的她也在努力尋找著其他工作並等待可能的面試機會。但就在等待就業的同時，小嘉的大學學姐突然找上她，因為 1996 年民進黨有公開徵才、釋放職缺，小嘉受了學姐的影響，兩人決定一同進入民進黨工作，於是她就

⁵³為了保護受訪者，在其工作部門的名稱中，我以○○○表示該單位的名稱。往後遇到工作部門或相關人名時，也都用同樣的方式表示之。

這樣意外地一腳踏進政治工作。而她對進來民進黨工作的看法是：

當時進來中央黨部，對政黨還沒有太多想法，沒有像原本就已經在中央黨部工作的人（指 1996 年前就入黨的黨工）這麼有理想及認同，不過還是對民進黨有好感才會進來，也想這就是一份工作，歷練一下也好。

小嘉這段談話有兩個重點，第一她進來民進黨工作時，對於政黨並沒有太多想法；第二她認為，自己在民進黨中，並沒有像她在進入黨部工作前，就已經在民進黨工作的黨工那般的有政治理想與認同。小嘉會有這樣的想法，某種程度與她並不是有意識的想要參與政治（或對政治沒有太多熱情）有關，或許一開始只是出自於人情與就業壓力的促使，才讓她接觸了這樣的工作場域。但，不可否認的是，她仍然是對民進黨存有一絲好感才會進來黨部工作。

第三個例子是小珍，她與小嘉和小雯三人都是前後期差不多時間一起進入民進黨工作，這份工作是小珍第一份正職工作，她的看法與小嘉也頗為相似：

其實我一開始對政治沒有那麼高度的興趣，那會念政治系其實有一點陰錯陽差，那只是剛好念了這樣的科系，當初畢業也沒有真正想要踏入這個行業，那可能是個性使然吧！有去應徵，其實我覺得那不算工作，我剛剛為什麼會說民進黨是第一個工作，是因為之前去的那一些我不認為是工作，比如說去應徵儲備幹部，因為我覺得自己的定位可能比較清楚，我不想要當一般的行政秘書，可是業務可能也沒有那麼高的企圖心，去應徵了幾次所謂的儲備幹部的工作之後，然後可能都去了一兩天，就會發現那種其實是騙人的，根本就是只要找業務，那有受過一些挫折。然後剛好父親這樣的安排之後，我就覺得可以來試試看，所以一開始對這個東西（指政治）也不是真的那麼熱衷。

「意外的」踏入政治工作似乎成了年輕黨工的另一個特色。與其說是意外，或者更恰當的說法可能是，她們對於政治工作的態度與熱情，似乎與年長的黨工有些不同。對於這種政治熱情逐漸「退燒」的情況，其實不只是出現在上述幾位受訪者身上，訪談過的還有幾位年輕黨工也幾乎都有類似看法（但仍有例外）。

這個結果說明了年輕世代的黨工對於黨務工作的看法，普遍與過去政治理念重於一切的黨工認知已經悄悄產生變化。但這個變化除了反映在對政治的熱情消滅之外，還出現在黨工對於工作薪資、福利的重視程度。

工作穩不穩定關乎薪資與工時

在九〇前黨工世代中，她們對於這份工作的認知，幾乎且毫無例外反映出她們對於政治是有所熱情，所以才有「這是一個政治使命」或者「這是為台灣人服務的工作」；甚至秀英曾提到的「好像會覺得去賺比較多的薪水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不是挺重要的。」以及君梅所說「很少有人把它當成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因為它待遇並不是很好。」等等說法出現。但對於九〇後的黨工世代來說，這樣的說法似乎又太過沉重。

再次舉小雯的例子來說，她當初從娛樂圈轉進政治圈工作，其實並不是因為對於政治有多麼崇高的念頭，而純粹只是因為工作類型是符合她理想的「穩定」工作。在整個訪談過程中，小雯對於黨務工作具有穩定性的工作特質，不只提過一次，那究竟什麼是「穩定」？小雯回答是：工作時間穩定，也不會像一般企業會隨意資遣員工，薪水也算不錯。

儘管資遣的說法，在民進黨還是有前例可循，「民進黨總共有裁員兩波，好像是 2006 年有一波，然後在 2006 之前或之後我不太記得，反正那時候我知道總共資遣了兩批人。」小雯如此說道。但由於小雯都不是被裁員的黨工之一，同時她的說法是與一般企業作比較，因此民進黨的工作自然是相對穩定許多。

除了小雯肯定這份工作是一份穩定的工作之外，一位在我研究期間仍然在民進黨工作的年輕世代黨工小雅，對於如何看待這份工作也提到，自己相當滿意黨部提供的薪資與福利：

除了薪水這個好處之外，剛剛有提到，因為是進步黨嘛，對於黨工的福利都有一定的重視，也不太擔心說會有什麼積欠工資或者是過勞啊，而

認識的人脈，其實○○○還算是最小，如果是○○部門的話就會認識更多的。

此外，小雅還說：

我覺得把它當作工作這個角度來看，其實我覺得就還不錯，因為也做的很久然後可能主管們也還蠻肯定我，也隨著資歷或者是考績等等的薪水增加，我是覺得穩定而有符合我的期待，當然要往上看或是往更高的方向，自己可能沒那麼多，但是比起我的同學，我的成就跟薪水都是讓我滿意的。

從小雅的回答中不難發現，她同樣對這份工作的看法也偏向肯定這是份穩定工作。在她的看法中，仍然多停留在實質的薪資或福利的考量。或許這樣的看法也可能來自她所任職的部門特色，因為在她平常負責的工作內容中有關政治性的意涵並沒有像黨內其他部門來的顯著。

不過，根據訪談結果得知，民進黨舉凡只要在選舉或大型活動如黨慶、遊行活動等等，無論是做行政事務還是研究工作，黨職人員幾乎都會做一次重新的工作編組，互相支援活動內容。因此，除了原來部門的工作外，黨工在黨內仍然會有其他機會去接觸不同的工作內容，或甚至在不同時機裡，做職務或部門上的調整。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小雅看待這份工作的認知，仍然可以說是以整體性的觀點，做出「傾向」重視工作實質收穫的認知論述。

對於工作薪資多寡的重視，1977年出生具有外省籍背景年輕黨工小靜，同樣有著類似的看法，但小靜卻不太認為民進黨是一份穩定的工作。而且，弔詭之處在於，同樣是重視薪資多寡的她，為什麼卻不認為黨部工作是一份穩定的工作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或許要先從小靜轉換工作跑道談起。

小靜是一個三個小孩的媽，小孩年齡都不大，黨部工作並非是她第一份的正職工作。不過，她和小雯之前從事的娛樂圈工作最大不同是，小靜之前的工作類型也與政治有關，她曾經在立法委員辦公室服務過。後來因為長官的引薦，她在

2007 年進入黨部工作，不過這一待並不久，幾個月的時間就讓小靜萌生退意，並且在同一年就離開民進黨中央黨部。到底是什麼因素，讓小靜在民進黨相對資源較多的執政時期待不下去？

小靜一開始給我的說法是，她覺得進來民進黨工作是有使命感的，但是「真的操作的時候發現，我一直流於行政工作，我覺得很煩。」不過，在訪談過程中，我覺得小靜其實更強調的是薪水問題，因為她就曾經跟我說，黨部的薪水其實不比她在立委辦公室來的高，她語氣中略帶不滿地說：「就是很制式化的薪水結構，大學就多少錢，專科的多少錢啊！」

她會有這樣的反應，某種程度跟小靜的教育程度有關，原來小靜只有高職學歷，若按照「中央黨部黨務工作人員服務辦法」的規定，她一進入黨部的職級就是幹事一級，薪資條件當然不比受過大學教育程度以上的黨工來的優渥（大學畢業者無經驗直接初任職級便是幹事八級或副研究員一級）。她覺得這樣對她並不公平，同時在訪談過程中，她不只一次提到類似的想法，當我詢問她在黨部遇到工作不平等的問題會怎麼處理時，她便又舉薪資的例子說：

譬如說對薪水我就會主動講，為什麼他可以領這樣的薪水，不過他可以領這樣子我覺得沒有不合理，但是我覺得我領的薪水不合理，然後我會主動跳出來。

順此脈絡，當我再詢問她是否覺得這是一份穩定的工作？小靜的回答很直接：「政治的工作不能當飯吃啊！」所以，當小靜在 2007 年離開黨部後，她曾經有三年的時間經營了飲料店，直到 2012 年才又回到立法委員辦公室服務。從她這句「政治工作不能當飯吃」的說法中，可知小靜確實對當時黨部的薪資結構有所不滿，她認為在中央黨部工作是無法支應家庭開銷，況且在結婚生子後，家庭經濟壓力接踵而來。薪水便成了她考慮這是不是一份穩定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

聽完她對於薪資的看法後，我還是想再次確認她對工作是否還有別的看法，因此又進一步從不同角度詢問她，對於黨務工作的看法，是偏向一般類型的工作，

還是認為這是一份有政治參與意涵的工作類型呢？她的回答是：

小靜：我覺得沒什麼差別，就是工作而已。

我：妳把它視為比較是各行各業的工作的其中之一嗎？

小靜：對啊，因為做行政的做行政，做會計的做會計，做總務的做總務，那外面的公司也是做這些工作啊。

總之，小靜對這份工作，雖然一開始也覺得這是有政治使命，但同時卻又覺得自己平時的工作內容還是偏向行政工作，因此她在兩相權衡的認知中，仍然較傾向一般的工作認知。不過，這種把政黨工作認為是「行政的歸行政」、「會計的做會計」，這種說法也透露出，她是把這份工作用高度的功能性與分工化的角度看待，相對的，也就失去政治工作中的「政治性」看法。

此外，小靜與前面提到小雅的例子，有點類似但卻又不能說是完全相同。因為在小雅的例子中，雖然她也覺得自己的工作內容與直接的政治參與接觸不大，但在民進黨工作時常會遇到各種活動的支援，因此對小雅而言，這份工作的認知是結合了不同的工作內容與經驗所得出的想法。但由於小靜在黨部待的時間不久，僅短短數月，因此在工作內容上，或許無法像小雅參與政黨中的其他工作來的多元。所以，兩者雖然認知相似但卻也有本質上的不同。

另外，相對之前提到的小雯，兩位的教育程度都是高中職，但小雯認為民進黨的薪資方面對於社會新鮮人在起薪上已經相對不錯，⁵⁴因此她並沒有特別強調薪資問題，反而覺得工作時間穩定才是她主要追求的。雖然小靜的看法與小雯不同，她不認為黨部工作是穩定的工作，但至少可以確定一點的是，所謂「穩定的」工作對小靜而言，同樣是立基於薪資不錯的條件下才會成立。

也就是說，小雯和小雅兩個新世代的黨工之所以認為黨務工作是穩定的，是因為她們對於工作上的薪資或工作時間期待是符合自己的要求（或至少沒有太不滿意），而小靜則是因為黨部的薪資條件不符合自己期待，所以她才在離開黨部

⁵⁴關於薪資規定，請參閱附錄三有關民進黨中央黨部服務辦法的新進人員起薪敘職表。

之後，自行開業當老闆。簡單來說，薪資福利仍是小靜認知穩定工作的基礎之一。

從上述所談的脈絡中可知，光是這份工作是穩定或不穩定的概念，其實就已經呈現出兩個世代黨工對工作的認知差異。換言之，年輕世代所認定「穩定工作」中的幾個構成條件，似乎較不存在於年長的前九 0 世代黨工的想法之中。在年長的黨工世代中，常常可以聽到她們對於工作金錢的報酬似乎不是這麼在乎，因為在那什麼資源（金錢、人力）都匱乏的年代中，很多黨工都說，她們人手不足，常常需要一個人做所有的事，所以當時實在很難有「準時」下班這件事。已經離職的前民進黨的資深黨工春華對我說：

我們那個年代進來的，大家是在稀少的資源下去做一件事情，也就是說，你必須要自己去承擔一個活動中的海報的製作、文案的撰寫，還包括整個活動規劃執行，這些都是你一個人要去做，……。

但是這樣的「什麼都做」，卻往往因為黨部的財務資源匱乏，沒有得到相對應的金錢報酬，更別提所謂的加班費。對當時的她們來說，支撐這些黨工繼續做下去的動力，大概就只有對於政治的熱情或對政黨的感情。如此一來，對於年長的黨工世代而言，薪資待遇好不好這件事，就足以讓政黨工作稱不上所謂的「穩定工作」。因此，秀英說道：

其實我們那個年代的人應該是因為理念才會集中在那裡，因為薪資確實是不高，真的不高。但是我們在那裡，我覺得是有一大群志同道合的好友，真的就叫同志，我們到現在都還會一起聚會，那我覺得那份情誼，就不像一般你在公司裡頭，為了工作、養家餬口，即使再難過我也只能忍耐……

討論至此，年輕世代黨工對於黨務工作的看法似乎有了雛型出來。對於看待這個工作的特質，她們普遍更加往經濟務實的方向看待工作，也就是一個薪資不錯與工時穩定的工作類型，相對的她們對於政治意涵的連結度也就相較為低。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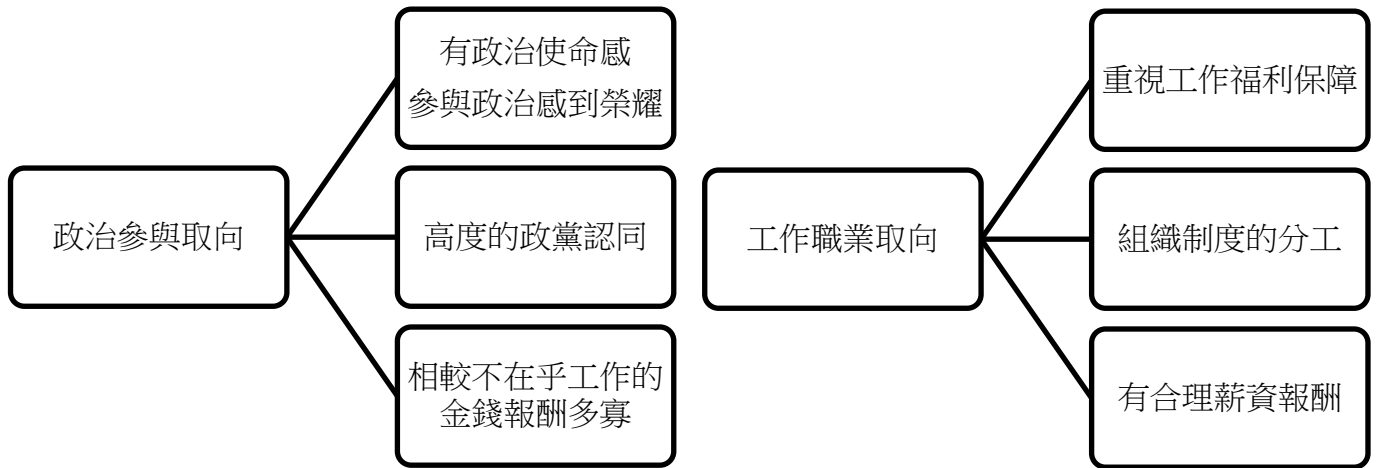
即這個世代相較九 0 前黨工，政治熱情普遍較為削減（但也並非都是毫無政治理念）。若回到本文在理論架構提到，黨工可能存在的兩種工作認知取向或許可以做一個小結。下表十六整理受訪者進入民進黨原因以及如何看待黨務工作，從上述討論似乎可以理解，民進黨中的黨工看待黨務工作，是存在以世代為單位的集體差異。對年長黨工而言，她們認知黨務工作似乎較偏向「政治參與取向」，而九 0 後的世代黨工則較傾向「工作職業取向」的認知。

表十六、兩個世代黨工進入民進黨原因與看待工作認知整理

九 0 前世代	入黨原因	九 0 後世代	入黨原因
美香	不滿國民黨、同情政治犯	小雯	家人希望找朝九晚五工作
文琪	想改革政治、想從政	小嘉	學姊影響、沒想過政治工作
秀英	學運連結、重視理念連結	小珍	找一般工作受挫、父親介紹
春華	對民進黨期待、認同台灣意識	小雅	老師引薦、薪資福利保障
君梅	對民進黨價值認同	小靜	長官引薦、就是一份工作
工作認知	政治參與取向	工作認知	工作職業取向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訪談內容

不過，兩種工作認知的內涵究竟存在何種實質的概念化差異？即何謂工作職業的認知？何謂這就是一份工作？實際上指的就是，這份工作是有清楚的制度規章、合理的薪資待遇規範、有制度化的升遷管道，亦有組織的專業分工等標準來做判斷。而「做政治」工作這種認知傾向則與前者有不同的實質意涵，並且往往有以下幾點特色：使命感、高度政黨認同、即使工作不一定有清楚的職務或功能分工、制度也尚未完整健全，仍然對工作存有一種期待感，而期待感是一種出自對政治改革的想法與憧憬。圖五為兩種工作認知取向的條件指標。



圖五、兩種工作認知取向的條件指標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雖然不同世代黨工看待黨務工作有政治參與及工作職業兩大認知看法，但在這兩種黨務工作的認知底下，仍存在更細微的認知差異。比方說，同樣是把政黨工作看成是政治參與的一環，但文琪比起其他九〇前世代則更有強烈的「從政」想像。又如九〇後世代的黨工強調的是工作職業的認知取向，但有些人看待政黨「工作」是偏重工作時間穩定，有些人則是以工作中的薪資報酬為工作認知的考量。這樣的結果表示，黨務工作的認知差異是一種大方向的現象趨勢，但事實上黨工仍存在對工作更細微的看法差異。

然而，這樣的世代特徵差異，仍有所例外。而這個例外，就是前文曾經提及的小佩。小佩的教育程度是大學，目前尚未結婚，2004年進入民進黨工作。不過，黨部工作並非是她第一份工作，她曾短暫到私人貿易公司工作幾個月，後來又到某個非政府組織（NGO）工作，最後才透過朋友的介紹進來民進黨。她對於黨務工作的看法，其實就與上述幾位的年輕世代黨工有明顯差異。她認為這份工作對她而言，並無法把工作與理念切割，來民進黨工作是懷抱著改變的希望：

我覺得對這個政黨，跟這個政黨的一些理念你是認同，你沒有辦法割捨，

就是你可能覺得，都過了十年，你的同儕都賺很多錢，那你可能相較沒有那麼多，可是你還是會懷抱著一些希望。

接著，她還補充說：

我覺得來這裡工作的女性，我相信男性也是一樣，不然他們不會願意當畜牲，他們對於這個黨的一些基本價值跟理念，跟現在整個台灣的情勢，他們是有一些期待的，那我覺得是因為這個期待，他們能夠在這裡工作，很多人其實來了不一定留得住，那能夠留下來的人，我覺得他們是願意付出更多的。

簡單來說，小佩認為，選擇這份工作，雖然十年後賺的錢會比同儕還少，但既然選擇這份工作，就代表理念與認同的價值是大於這些金錢的物質報酬。從這個例子可以知道，年輕世代黨工也並非都是比較沒有政治熱情，又或者對於政治理念就一定比起年長世代黨工來的低。

世代的趨勢差異，不代表世代間的個體就不存在異質化。前面將黨工世代看待黨務工作的特徵作出區分，目的是突顯世代的趨勢差異，而非透過政治理念或工作取向的二分，將民進黨黨工看待黨務工作做出截然的分類。關於兩個世代黨工為什麼會呈現上述所談的工作認知差異？以及為什麼年輕世代的小佩，會有異於其他九〇後的黨工特徵？這些問題都將在下一章做進一步的探討。

第五章 新與舊之間的價值轉變

延續上一章討論，本章將檢視為什麼民進黨女性黨工看待黨務工作會呈現世代差異？為了討論這個主題，我將試圖從下列幾個問題來回答：女黨工們的生命歷程有什麼差異？當她們面對工作、政治與家庭生活時會如何取捨，進而找到自己心中的平衡點？除了政治、工作與家庭的三角關係外，時空背景的集體經驗又如何從性別及民主化的角度，同時對女黨工的生命經驗產生影響？基此，本章將結合宏觀的時代視角與微觀的個人生命經驗嘗試回答以上問題。

第一節 兩個世代的生命經驗差異

政治理念重過一切的前九 0 世代與重視薪資的新世代對於政黨工作的認知有著迥異的看法，要有效回應這個問題，勢必需要檢視兩個世代黨工的生命經驗究竟有何差異？也就是她們在進入民進黨之前，無論是家庭教育或者求學階段，兩個世代的生命經驗差異將是不可忽略的重點之一。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我都將從這些黨工們的家庭背景開始談起，因為家庭背景的不同，她們各別家庭的互動模式也將產生差異，而且對於每個人來說，家庭教育幾乎多是養成自己的態度與價值觀最初步的社會化起點。

一、年長世代中的社會化過程

故事同樣從黨齡至今已餘二十五年的美香開始，身為資深前黨工的她，看待黨務工作的視角，主要強調政治理念的重要性，因為先前美香曾說，自己選擇進入民進黨工作是對解嚴前的政治犯遭遇感到同情與不捨，同時對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感到憤怒。就美香個人例子而言，這一段對政治犯遭遇的不捨，其實已經點出一部分為什麼美香會有這樣認知傾向。

也就是「同情政治犯的遭遇」為什麼對她會產生影響？某種程度這件事與她

的家庭背景脫不了關係。美香表示：

我一個叔公祖是那個蔣○○，就是在台中清水那邊比較早期的政治運動者，在日本時代、日治時代就開始。然後，我舅舅他也是政大政治，然後之後去日本留學，然後博士班，然後因為那個就是居留權的關係，然後就沒辦法，就去美國，就去做生意。然後因為國民黨的檢舉，因為他一邊打工，被檢舉，在那邊做生意，然後後來因為我舅舅回來台灣奔喪，就我外婆過世，他回來奔喪，那時候在台灣，因為他在海外都是資助這些海外的（指海外的政治犯），像許信良帶他出國去，算是生意做得還比較好，就是很多台灣民主運動、黑名單他們長期都在資助，那個許信良中正機場事件的時候，是他跟許信良一起回來的，然後後來在民進黨徵召之下，然後參選○○縣縣長，然後他總共參選兩次，第一次沒有上，後來就當選了，後來也去選國代代表，就當選。

這段論述重點在於，美香的家庭背景跟政治一直都有著深厚關係，而我們可以想見，有了這層關係可能讓她日後對於政治犯的同情，比起不同世代或甚至是同一個世代的黨工更有深刻的體會。對於自己的政治態度養成，她坦言「開始會接觸到政治而且對政治有興趣，其實是我舅舅家那邊的影響更大。」而也因為這樣的關係，美香覺得自己算是蠻早就對政治有想法的人。

除此之外，作為一個女兒，在家裡父母親又是如何教育美香？她告訴我，自己的家人其實都是對政治有熱情的，並且多少會想參與政治改革，但老一輩的父母親始終因為長期生活於過去威權時代的背景關係，在教育小孩方面，還是不會鼓勵小孩參與政治，「她（母親）去幫忙我舅舅助選，可是她就不希望你去參與這樣的事情啊，他們（父母）覺得保護小孩的心態，那只能說我是老么了，然後從小就管不住我，因為我要做什麼他們就比較放任。」美香如此說道。

從這段回應中可以明白，美香父母親雖也熱衷政治，但基於保護孩子的立場仍不希望他們兄弟姊妹參與政治。但這種不希望子女參與政治不代表美香的父母親不希望她關心政治，反而是出自為人父母的一種擔心與關心之詞。

那些年，黨外雜誌與學生運動告訴老黨工的事

同樣屬於九〇前世代的文琪，她的家庭生活經驗又有些差異。來自高雄的文琪在黨部從基層事務性黨工開始做起，在我研究期間已是民進黨中央黨部的政務性主管。文琪說，父母都是「偏綠」的支持者，所以當初她選擇來黨部工作，來自家庭的反對聲音自然不大。不過，有別於美香的父母不太鼓勵小孩參與政治或對小孩的政治教育仍然較為敏感，文琪的情況剛好相反，甚至在解嚴前她的父親還會買黨外雜誌回家給她（或家人）閱讀。文琪說：

解嚴前我爸還會買黨外雜誌給我們看，我自己也會去買，他們不會特別叫我不碰政治，有的話也只是說說關心的話。我以前大學參與學運的時候，我爸媽也是會叫我不碰，但是那種就只是說說，也沒有強烈反對什麼的，所以是那種關心的話。我以前搞學運也沒聽過老家的管區有跑來關切，但我知道有些朋友確實都有被關切，你看這就是國民黨一貫的伎倆，到現在都是這樣。

在解嚴前的台灣社會，言論尚不自由，民眾若要取得有別於政府官方對於政治或社會事件的看法，黨外雜誌成為一個獲取多元想法的重要管道之一。所以，閱讀黨外雜誌對當時還在就讀國、高中時期的文琪來講，可以說有著非常重要的政治影響。「黨外雜誌對我而言，也產生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黨外雜誌當時都會提供對於社會有別於國民黨的看法的言論，讓我有更多不同的角度來看待政治，發現其實我們都成長於謊言之中，但沒有人敢講出不一樣的聲音。」她說。

從小家庭對政治教育相較開放，使得高中畢業的文琪，進入大學後同樣延續著對政治充滿熱情與理想。不過，在大學生活又要如何實踐自己心中的政治理念？文琪這樣表示：

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就有從事學生運動（指參與野百合學運），當時加入的學生社團，那時候我們叫異議性社團，那在大學的時候，的確是

有考慮過政治是一條志業的選項，那後來我到國外念書，我選擇念政治學，也是專攻民主化理論。

在大學，參與異議性社團(或稱倡議性社團)成為她當時繼閱讀黨外雜誌後，得以實際且持續關心政治與社會議題的管道之一。而這樣的社團參與經驗，也讓她結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 1990 年的 3 月發生的野百合學運，文琪就與她當時的社團同學參與其中。參與野百合學運無疑成為文琪在學生生涯中重要的生命經驗，而這種經驗多少也影響她當時進入民進黨的心理感受：

我當時是覺得 1996 年來到民進黨時，在頭一兩年時，有點像是我學生生涯的延續，因為當時很多同事都跟我一樣還沒結婚，甚至單身的也很多，大家就可以像學生時代一樣為了理念把時間全力的放在黨部工作。

然而，離開大學校園後，文琪並沒有馬上進入民進黨，而是選擇先到英國就讀碩士學位，因為文琪除了有想從政的念頭，她也坦言，從政並非唯一目標，會出國念書，一方面是因為自己也想走學術研究、當老師。不過，正當她取得碩士學位那一年，台灣發生了台海危機，⁵⁵這件事的發生對文琪進入民進黨工作也是個關鍵性的因素，文琪是這樣說的：

當時 96 年嘛，剛好有台海危機，台海危機也是有點影響，但在那之前我是覺得說也許外交是一個，我可以努力的，可以幫台灣做點事的，那一年也碰到民進黨有大舉徵才，我其實是在海外版的中央日報看到民進黨的徵才啟示，然後就寄履歷之後面試這樣。

綜觀文琪加入民進黨前的生命歷程來看，文琪從小受到父母親的政治薰陶，上了大學除積極參與倡議性社團，還參與了二十幾年前盛大的學生運動，取得碩士學位後，又恰好碰上台海危機，這一連串無論是家庭或是學校非正規教育（指

⁵⁵1995-1996 年間是 20 世紀第三次台海危機，該事件對台灣的意義在於，它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對外所展現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Fravel (2007) 提到，就目的而言，中國是想透過軍事演習與飛彈外交，影響台灣的立委與總統選舉，終極目標是為了預防台灣獨立(轉引自徐子軒，2009)。

參與學生社團經驗)的社會化過程以及重大政治事件的經歷一再發生，似乎都讓藏在文琪心中已久的政治火苗，越燒越烈。

另一位例子秀英，同樣與文琪、美香一樣有著高度的政治效能感。她雖然比文琪早三年進去黨部工作，但實際上文琪的年齡又比秀英年長一歲。上一章我曾提過，秀英會進入民進黨工作是因為她在參與野百合學運後，覺得民進黨和自己的意識形態較為接近，因此選擇這份工作主要是一種理念上的結合。所以，很明顯的秀英和文琪在大學階段都有參與過盛大的野百合學生運動。但這場學生運動帶給秀英什麼影響呢？以及是什麼成長背景會讓秀英在大學時期就參與學運呢？其實，自己主動參與學運的秀英仍然是深受父親潛移默化的政治價值觀影響：

就是三月學運，但是不能說它(指學運)開啟我，應該是說，我之所以主動去參加學運，應該是父親從小被他的一些理念、概念的薰陶。所以你會覺得你應當去參與社會的活動，畢竟這就是政治跟你息息相關，跟生活息息相關，我們是自己主動去學運的不是被動員的，那當然參與之後，你可能被開啟另一扇窗吧，那當然也會意識到自己某些部份的不足，那當然也自己去找一些跟自己所學不相關的資料來閱讀，所以最後自己覺得有興趣的部分在環保，才會去選擇那一塊去投入。

從秀英這段話中可以得知，在參與三月學運之前，她早已受到父親的教導對政治產生興趣與關心。三月學運對她的意義或許可以看成是強化自身政治理念的一種政治事件的媒介。那麼，父親在家庭生活中，如何傳遞自己的理念給她？是否也有從政的經驗？我接著問。秀英急忙對我說，「沒有沒有，我父親是國營事業的員工，一點都不是(指不是從政的政治人物)。」她說：

他就是從小看電視、報紙，你要知道我們所有報紙就是只有中國時報、聯合報，那基本上就算是黨報，他會引導我們從國際新聞切入，然後不管是看新聞的報導，只有三台嘛，他會做一些新聞時事的評論或批判，那我想那些東西就小小在自己的心裡頭。

在解嚴前時期，文琪依靠黨外雜誌給予自己與當時的青年們一股不一樣的思維，但如果沒有黨外雜誌，父母親的家庭教育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似乎顯得格外重要。在訪談過程中，秀英還跟我說，就是因為小時候父親會一直跟她討論新聞時事，所以從小她就對政府的組織架構以及誰擔任什麼職務都非常清楚。她興奮地向我舉個例子：

我們曾經在高中的時候公民活動，我們以前不能叫畢業旅行，叫公民活動，是戒嚴時期，我記得他們就問了一個問題吧，恩…知不知道現在的教育部長是誰？就是現場我們所有學生很多人，沒有人知道現在的教育部長和教育廳長是誰，這兩題只有我回答出來，我的同學印象很深刻，因為大部份的同學覺得政治跟自己生活無關。

秀英的父親除了時常從新聞時事切入讓她從小關心政治與社會議題，她的父母親也會透過過去自身的生活經驗，把秀英無法經歷與體會的事件告訴她。舉例來說，由於秀英父母親都曾經歷過 228 事件，她父母感受是強烈的，雖然小時候父母親不會跟她談 228 事件（因為在當時 228 是禁忌），但當秀英長大一點時，父親就有將這段經歷描述給她聽：

我爸爸媽媽兩個人都是嘉義人，嘉義人在 228 事件的時候是死傷慘重，他們親眼看過這些躲避國民黨追殺的青年學子，或者是知識份子，躲到山上去，我媽家他們有個大果園在山上，他們（指母親家裡）曾經就是有這些人到他們家來，他（指當時被追殺的青年學子）請求庇護。

從這個例子知道，高中時期的秀英，其實已經比其他同年齡的同學更加關心政治，或者更確切來說是「政治知識」普遍高於其他人，因為家庭教育使她認為政治是跟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從這樣的生命歷程來看，似乎也不難想像在大學時期的秀英，為什麼會自己主動去參與三月學運。

回到黨外雜誌，秀英也向我強調，自己不像一些黨外的家庭，從小就有看黨外雜誌的情況，她自己開始接觸所謂「黨外雜誌」，已經是在鄭南榕事件發生時，

才開始去閱讀這些資訊。而透過從小父親對秀英的教育、閱讀黨外雜誌以及求學階段開始接觸的學生運動，⁵⁶這些經歷似乎都更加強化了秀英想對抗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所有不公不義的心態。從上述兩位資深黨工的例子可以知道，曾經閱讀黨外雜誌這件事以及參與社會運動，對於九〇前世代黨工與民進黨的連結，似乎扮演了一個重要的關鍵角色，而這樣的說法從春華的例子可以再次獲得應證。

成長於父母親都是民進黨高度支持者的家庭，當我詢問春華是什麼時候開始對政治產生興趣？春華的回覆是：大概是國、高中時期就對政治產生自己的想法了。為什麼這麼早就對政治有想法？她也歸因於家庭背景的關係：

我覺得這跟我從小成長背景有關吧，因為我從小就看黨外雜誌，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跟其他人有一點不太一樣。我從小大概國中一年級就接觸黨外雜誌的，所以我的政治傾向是蠻早就形成的。因為我家裡有，我自己就去翻閱，接觸之後就會發現這跟我小學時候接觸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那時候對政治就開始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後那時候也在學校跟同學聊天，談一些問題，當然那個時期還是戒嚴時代，所以大家在聊的時候，就會比較小心一點。

因為父母親是泛綠支持者，家裡又有黨外雜誌，所以她從國一開始閱讀黨外雜誌。閱讀黨外雜誌對春華最直接的影響莫過於，她在學生時代就常和一般同學對政治事件有不同的見解，例如美麗島事件以及林家血案等，甚至「包括之後整個黨外的政治運動發展，然後包括…，因為其實黨外雜誌裡面內容不只是包含政治領域，它介紹還包括社會運動那一塊的，所以我對於社會運動會有一些概念，甚至會有自己的意見在。」她說。

從上述幾個例子可以發現，黨外雜誌提供的資訊不只深刻影響著春華，更影響了在那個資訊不透明、言論不自由的時代中，所有曾經閱讀過黨外雜誌的民眾。此外，上述這段回應，也提醒我們無論是閱讀黨外雜誌還是參與反對運動，背後隱藏的訊息也不能忽略，因為這些事件都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著密切關係。

⁵⁶不只參加學運，秀英在當年也積極參與反核活動，417 的制憲等社會活動。

在受高等教育的階段中，來自台南的春華也熱衷參與學校社團，但有別於一些學生主要參與聯誼性或娛樂性質的社團，她在校期間因為對於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化感到興趣，因此她選擇了台灣文化研究社（簡稱台文社）加入。而除了自身的成長背景外，選擇參與台文社一定程度也說明了，她在大學時期就對於台灣的主體意識有著高度認同，這或許是她後來選擇進入民進黨工作的一個影響關鍵：

因為我是看著黨外政治運動上來，我小時候的歷程是跟著她成長的，所以我碰到民進黨的時候，我對於整個台灣的民主運動，跟黨外的那些人物的情感，我就是直接進到這個領域，直接看到這些人，對我來說，當然是很開心的。當然我始終認為說，民進黨是比起當初執政的國民黨，民進黨是值得被我們期待的，它不管是在政治的推動上面，還是在社會改革推動上面，它的確是從台灣本土長出來的東西，他看到的東西都是以台灣為主的，所以對我們這種對台灣有非常強烈感情的人，它是一個可以實現我們期待與想像的那個政黨。

在大學校園期間參與倡議性社團的例子，似乎和閱讀過黨外雜誌一樣在年長世代的黨工中有著共通的特徵趨勢。因為另一個例子是，在我研究訪問的期間就已經離職的資深黨工君梅也是如此。君梅大學就讀法律系，畢業之後雖也有念頭想報考律師，但因緣際會之下得知當時民進黨正在徵才，因而君梅就選擇先進入民進黨從事相關的政策研究工作，而之所以會選擇民進黨參與的原因，我們可以從她的論述中得知，這與她在校園中參與過倡議性社團有極大關係。君梅說：

我大學的時候就是在異議性社團，我可以算是學運世代那個算是比較年輕的族群拉，如果以學運世代來分，如果用 1960 到 1970 我算是末段，所以我算學運世代裡面那個比較後面的部分，在那段的背景之下，再加上社團的互動跟串連，那事實上很早就對社會運動或反對運動，或民主化運動，有蠻大的關切。所以自然你的朋友，你所從事的事情，你所認識的人，就多多少少會跟反對運動這塊有關係…

從這段話得知，君梅認為，參與異議性社團，讓她對於社會運動或反對運動

有了比一般人更深刻了解，因為這種屬性的社團時常會與社會運動互相串連與互動。而這段校園經驗，如同文琪一樣，也成為她參與後來的三月學運一個重要關鍵，縱使君梅參與學運的程度不像文琪與秀英這麼深入，但看的出來，君梅仍然對那段學運經驗是相當肯定的。

二、政治熱情消退的新世代

不過，在野百合之後，那一切便是不一樣的故事了。野百合學運的落幕，直接或間接促成台灣民主政治在 1990 年代以後的一連串改革。成長於轉型後的民主台灣，接受訪問的幾位新一代女黨工們，相較而言，顯然沒有像九 0 前的黨工世代一樣傳承著過去時代背景所遺留下的政治態度或價值觀。而為什麼九 0 後的黨工世代對民進黨理念連結程度不若年長黨工來的強，或者政治熱情有減退的現象？面對這樣的現象或發展脈絡，我們仍然可以用上述的邏輯檢視九 0 後的黨工世代在進入民進黨前的生命歷程究竟有何特徵？

家人的政黨認同與民進黨政治理念間的衝突

「對我來講，它就是一個工作。」小雯坦言，為了想要有朝九晚五的工作時間，她決定從最想從事的娛樂圈跳到政治圈工作。不過，娛樂圈與政治圈的工作類型差異甚遠，轉職到政治工作，小雯將無可避免地需要讓自己的政治理念與民進黨有所連結。然而，這樣的連結透過檢視小雯的家庭背景，似乎可以預見為什麼小雯對於民進黨的政治認同程度，或者對於政治熱情是相較低於其他年長世代的黨工。我曾這樣詢問她：

我：家裡都是比較偏向民進黨的支持者嗎？

小雯：沒有，我家的人都是國民黨的。

那麼，對於從小成長於國民黨支持者的家庭中，小雯在進入民進黨前，又是

如何看待民進黨？她是這麼說的：

以前我是很討厭民進黨的，就是以前在我們念書時期，還沒有真的接觸過民進黨的時候，從媒體方面、報章雜誌上，看到的一些負面的消息都是我們吸收到的，跟我們在民進黨裡所理解到的，我覺得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我到民進黨工作之後，我了解了很多事情的真相原來是這樣子。所以，我看他們以前發生過的那些抗爭，所謂讓社會他們看來不合理的運動，我都反而覺得那是一種可以做的回應，都可以去理解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事件發生。以前我們對這樣的事件可能是以前在立法院搶麥克風，我們都會覺得沒有辦法去理解為什麼，會覺得民進黨是因為反對而反對，但是我們在民進黨工作後知道了解到事實的真相，就知道說我們當初會有這樣子的暴力行為出現。

就小雯的個案來說，由於父母都是偏向國民黨的支持者，所以一個很容易理解的現象就是，在小雯家中自然不可能像前面幾位如文琪或春華家中會有黨外雜誌的出現。除此之外，小雯在尚未加入民進黨之前，甚至是有「討厭」民進黨的態度，這種討厭民進黨的態度與想法，主要源自當時的社會氛圍或媒體對民進黨仍然多形塑成具有衝撞體制的抗爭形象，導致小雯看待民進黨是有負面的觀感。

此外，小雯的教育程度只有高職畢業，她也沒有像前文提到的九〇前世代黨工們都有上大學的經驗。相較於大學教育的學術自由，在 1990 年代初、中期才正值高中時期的小雯所處的時代背景雖已解嚴，但中等教育以下所接受的教育方式，仍然還是以過去黨國一體的思想為主。因此，她才會說，對民進黨的負面觀感來自於「以前在我們念書時期，還沒有真的接觸過民進黨的時候，從媒體方面、報章雜誌上，看到的一些負面的消息都是我們吸收到的」。從而可以想見，她的政治態度養成應該是較為保守，何況在高中階段的社團活動，也鮮少能像大學的倡議性社團能有積極涉入政治或社會的活動與組織能力。

基本上，對小雯來說，除家庭教育無法傳遞「黨外的」政治思想外，學校中的非正規教育對她的衝擊影響也相較不大。因此，當小雯進入民進黨工作的第一個念頭是因為想要有穩定的工作時間，才進入民進黨中央黨部從事行政工作時，

她就會面臨到自己的政治理念與民進黨的意識形態落差的問題。

在訪談過程中，小雯也一再向我強調，雖然過去對民進黨有不好的觀感，但她「現在」對民進黨是有認同的，只是「我只能覺得說，我以前在書上看到的，聽別人講的，跟我在民進黨上班之後所知道的事實，我覺得差距很大。包括我們以前念的歷史，跟我到民進黨之後念到的台灣歷史，我也覺得這個出入很大，很多事情都是在民進黨工作之後，才發現以前念的歷史，可能並不是那麼的真實。」

也就是說，在她進入民進黨工作後，她的心態以及對於民進黨的認同與認識是有逐漸增加的情況，這一部分也暗示我們，小雯對民進黨的態度改觀，一定程度地表示，黨工們看待黨務工作的認知是一種具有可變動性的特質，因為對政黨印象改觀可能對看待黨務工作的態度影響是：觀感越佳表示對於民進黨的政治理念也就越認同，而認同越高，或許就越能把這份工作看成是一份政治志業。

透過工作環境的組織文化影響，黨工在工作場域中依然有機會使自己的政治價值觀有所轉變，雖然對民進黨的理念認識或認同程度不若年長黨工來的強，但年輕黨工最後也都對這份工作產生政治理念上的認同，這就是一種工作環境對黨工看待黨務工作的一種認知影響，而且是一種強化黨務工作政治特質面的影響。

回到小雯的家庭角色，身為父母親的女兒，當小雯進入與父母親政治理念有所差異的政黨工作時，家庭互動是否有發生衝突？而一開始她又是如何調整自己及父母親的心態？關於這個問題，她的回應與她看待黨務工作的角度一樣，「這就是一份工作」。

他們（指父母親）看待我就是單純的一份工作，那我也會跟他們講說，我給他們傳達的觀念是，其實到任何一個地方工作這就是一份工作，不管到哪裡，比如說有人卻選擇八大行業，它也是屬於一份工作，那為什麼因為政治理念不同就不能在它的圈子工作，這應該是沒道理的，所以他們看待我就是一份工作。

小雯向父母的解釋曾說過，「八大行業也是一份工作，為什麼政治理念不同

就不能在它的圈子工作？」這種將政治工作和八大行業一起做類比的說法，可見在她的認知中，政黨工作的「形式」是重於這份工作本身的「內容」意涵，亦即這種「去（政治）價值化」的工作認知，再次說明了小雯看待工作的視角是一種以工作務實取向的認知方式。然而，這種有意識的把工作「去價值化」的另一種目的，或許也是為了減緩自己的工作選擇與原生家庭政治態度的衝突。

除了小雯家庭的狀況是如此，父親是外省籍的小靜，家中也同樣都是國民黨的支持者。不過，比起小雯，小靜的家人更有著從政的政治經驗，「我外公是本省人，而且我外公是國民黨也是議員。」而當時我和她的談話脈絡是這樣的：

我：那妳的家人都是比較傾向民進黨嗎？

小靜：沒有，全部都是國民黨的，沒有一個是民進黨。

小靜跟小雯其實有著高度的相似性，她們的家庭背景一樣都是國民黨的認同者，同時兩位也都只有高職畢業的學歷。而當自己進入與家人政黨理念不同的工作環境時，小靜的家人又是如何反應的？我接著問。

我：所以，當初他們其實是有反對妳進民進黨的嗎？

小靜：沒有，因為我爸爸這邊是外省籍的，然後那時候在民進黨工作的時候（指高中時期就曾在立法院擔任立法委員助理），我也不知道是民進黨啊，因為那時候也高中而已，也搞不清楚差別到底是什麼，只有被爸爸告誡說不要台灣獨立，其他隨便我也不管我，我也通通都不知道台灣獨立或什麼的，而那時候對政治是無感無知的，但是在這個環境總是潛移默化，漸漸就會覺得說，政黨的一些理念，包括老闆傳達給我的一些訊息，我覺得是值得我去認同的，並且去支持的，所以我漸漸的會跟弟弟妹妹分享我的事情，因為我弟弟妹妹沒有很明顯的政治性向，譬如說我就是國民黨的，沒有這樣，他們只會問我說，這些人誰誰誰比較好，但是我爸爸很明顯就是國民黨就對了…

透過上述這段話，除了知道小靜一開始也像小雯一樣，對於政治或對民進黨的政黨理念是較為不清楚的，一直到後來在民進黨工作久了之後才潛移默化黨內

的政治理念。這也呼應小雯的例子，長期處於在政黨組織工作的環境下，政治工作中的「政治性」是有可能對於一個人的政治態度形成改觀。

不過，另一個重點則在於，她提到父親當時有告誡她可以去民進黨工作，但不可以搞台獨。其實，父親的這句「不要台灣獨立」的告誡，已經傳遞給小靜一些自己的政治價值觀。然而，面對擁有不同政治價值觀的父母親，小靜坦言，在民進黨工作時還是感受到一些壓力，⁵⁷「我那時候一開始不敢去跟我爸討論這些事情，因為我怕他會限制我，所以我做什麼事情我都暗著來」她說。

雖然如此，這裡也必須補充的是，在她就讀高職夜間部時（小靜年齡小於小雯），既對民進黨的政治理念沒什麼概念，同時在那段時間，她進入民進黨立法委員辦公室工作的機緣，也可謂是非常的「陰錯陽差」，但也因為當時意外的機緣，才有後來她在 2007 年短暫進入中央黨部工作的經歷。所以，她與民進黨的第一次接觸也有必要在此交代。

為何小靜與民進黨第一次接觸是意外無比？其實，當時她在立法院擔任民進黨立法委員助理前，一開始也並非在民進黨委員辦公室工作，而是先在國民黨立委辦公室擔任工讀生，只不過在國民黨立委辦公室的工作時間不長，她沒待多久就轉到民進黨委員辦公室，而從國民黨轉到民進黨的原因，也非政治理念促成：

我去做沒幾個月(指去國民黨立委辦公室工作沒做幾個月)，然後我覺得那個行政助理對我很兇，然後剛好因為我們都在立法院跑來跑去，我們是工讀生而已，所以穿著制服跑銀行等等的，然後另外一個人就跟我說，我們辦公室缺一個工讀生，妳可不可以幫我找一個，我就說好，結果後來我找了我同學去，結果我同學做了兩天還三天，她就說她不要做了，然後那個人就跟我說，妳看妳介紹來的那個人跑掉了，怎麼辦？我就說那我來，然後我就換到那邊去了，所以原本我在國民黨那裡沒有做很久，然後，那個國民黨的立委是不分區的，之後我就一直在民進黨這工作。

從這段與民進黨的意外接觸，透露出小靜從小到她念高職的那段時間，對於

⁵⁷這裡指的工作是包含小靜在進中央黨部之前，也曾在民進黨立法委員辦公室任職的經驗。

政治的態度，似乎是可能清楚的將工作與理念二分。或者應該這麼說，由於當時她對民進黨的認識程度不夠，因而她對民進黨也沒有太多的負面觀感。甚至可以說因為她對於政治的「無感無知」，因此當她一開始進入民進黨工作時，是可以把政治與工作分開來談。所以，她才會從國民黨立委的工作又跳到民進黨來工作。不過，當然就像小雯一樣，在民進黨的工作環境待久了，透過與同事共事或組織所形成的文化氛圍，小靜也就逐漸對民進黨的理念價值產生認同，後來更因為民進黨的長官引薦短暫進入中央黨部工作。

除了小靜與小雯的故事，還有幾位是受大學教育程度的年輕黨工，她們的生命歷程又與前面兩位有何相似及相異之處？小雅是大學畢業，雖然大學就讀政治系，但進入民進黨工作同樣並非是她曾預想過的，因為她對政治並非有著深厚的興趣。小雅表示：

雖然我唸政治系，可是其實我很少去參加造勢晚會的一些活動，我就是參加一些社團的活動，陳水扁選市長那時候，我有跟學長姐一起去發傳單，可是那純粹是為了打工賺錢而已，所以對政治其實沒有很多的了解或是參與。所以，那時候老師介紹進來民進黨的時候，其實我對國民黨或對民進黨沒有特別的偏好或者是支持這樣…

曾參與選舉活動，但「純粹是為了打工賺錢而已」，對政黨並無特別偏好或對政治沒有深入的了解與參與，這是當時小雅就讀政治系的感想。然而，問題是為什麼當時就讀政治系的小雅，會對政治沒有特別的想法？一部分的答案或許是「政治」並非是她最有興趣的科系。另一部分則是，其實當時小雅最想從事的職業，不是政治工作，而是中等教育的教師工作，考上政治系只是個偶然。她說：

本來是想要當老師，可是沒有積極的去修教育學程的課程，因為以前的教育學程的課程好像沒有那麼普遍，（現在）沒有一定是說走師範、師院那一條路才比較可能去當老師。但我不是，就考上○○政治嘛，除非說積極的尋找那管道怎麼樣去當老師，不像現在唸大學的時候有一些教育學程可以修，這在我那時候是沒有那麼普遍。

小雅強調，當時進來民進黨是覺得工作內容是有趣的，「不是說因為是想要從事跟政治有關而進到民進黨的這個職場」。很明顯的，就算是小雅和其他年長黨工一樣受過大學的高等教育，也比起相同世代中的小靜與小雯的教育程度還高，但小雅對政治的了解，或對於民進黨的政黨理念也不一定會比較深入或更有動機的去了解。這代表教育程度高低並非影響一個人政治化高低的絕對因素，為何如此？讓我們把焦點拉回小雅的家庭背景來看。

她提到雖然家中父親並非是民進黨的支持者，但她對於民進黨的看法，並沒有受到太多父親的政治價值影響，「甚至我以前家裡是受到很多的教育，而我記得我爸爸看到民進黨的一些衝撞是會指責民進黨，雖然家裡的長輩是這樣子，但是我並沒有特別的喜歡或是因此就討厭民進黨，或者喜歡國民黨的，那時後對於政治是沒有太明顯的好惡。」她說。

從小雅的例子告訴我們，家中長輩的政治認同即使不是民進黨的支持者，也不一定就會發展像小雯那樣，一開始會對民進黨存有負面觀感甚至是討厭民進黨的情況。不過，雖然她沒有特別對民進黨有負面觀感，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也不至於會對民進黨產生高度的支持偏好。

類似的例子還有小嘉，她因為學姊的邀請，一起進入民進黨工作。小嘉的父母也是偏向國民黨的支持者，身為女兒的她同樣要先面對父母親對這份工作的「不諒解」。因為在她父母親的看法中，民進黨的工作既不是穩定工作，同時因為民進黨的衝撞形象，父母也擔心小嘉是否可能在民進黨的工作中發生危險。小嘉向我解釋父母親的看法：

因為以前民進黨本來就是走街頭，那他們（指父母親）對民進黨就是比較有負面的印象，他們覺得這是一個暴力的政黨，就會說為什麼妳要去這個政黨工作？

同樣是政治系出身，她的看法與小雅類似。小嘉坦言，「一開始當時進來中

央黨部，對政黨還沒有太多想法，更沒有像原本就已經在中央黨部工作的人這麼有理想及認同。」因此，對於這意外的政治工作，小嘉不斷強調這並非是她原先畢業後所能預期到的發展。

談了幾位年輕世代黨工的家庭背景意外發現，這些黨工的父母親比起年長世代黨工家中「偏綠」的政黨認同傾向，在家庭生活與互動中，已然對兩個世代黨工看待民進黨的看法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不過，必須說明的是，雖然目前談的年輕世代黨工，家庭背景剛好都是國民黨的支持者，然而，這樣的現象當然也有例外，接下來要談到的小珍，父母親便是民進黨的支持者，而她的故事又告訴我們什麼？

前文我曾引述小珍對於黨務工作的看法，她一開頭就從自己對政治的興趣開始說起，「一開始對政治沒有那麼高度的興趣，那會念政治系其實有一點陰錯陽差，那只是剛好念了這樣的科系。」小珍如同小雅對政治本來都沒有興趣，但又為何會進入民進黨工作？其實，這與小珍的父親有極大關係，因為小珍一開始與民進黨的連結，就是透過父親與民進黨的友人接觸、引薦，她才會在畢業後沒多久進入政治的工作場域。

比起前面幾位受訪的黨工，她們的父母親起初不是擔心女兒在民進黨工作會不穩定，就是在理念上，對民進黨有負面印象，因此不太支持自己的女兒在民進黨工作。小珍的例子則剛好相反，她會進入民進黨靠的是父親的安排與引薦。而這一切的安排與她家裡的政黨認同是有高度相關的。小珍說，「因為家裡的政黨傾向，本來就是支持…一直從黨外，父親就一直很支持，對。」雖然父親從解嚴前就一直支持黨外活動，直到民進黨成立後，與民進黨的關係仍然相當密切，但小珍也強調，父親只是單純支持，並沒有涉入或從政的經驗。

我：就是爸爸也從政？

小珍：沒有，沒有從政。就是對政治比較熱衷，然後剛好有認識，有跟黨務比較有接觸的人有認識，介紹進去的這樣。

「因為我真的不夠老」加上父親在家裡也不曾和子女談論戒嚴時期的那些政治事件，縱使父親對政治非常熱衷，然而小珍覺得自己對於政治的熱情或價值理念並沒有受到父親太多影響，這樣的說法與小雅的例子相似，只不過小雅的家人支持的是國民黨而小珍則有個熱衷民進黨理念的父母親。她說：

我們那個家庭不是大家庭，可能如果在家裡的話，所謂的大人就只有我爸媽，那他們不會單獨來討論所謂的政治事務這一塊，那所以其實我從小接觸的並不多，感受的也沒有那麼深刻。

另外，小珍補充說道，「因為我爸爸跟媽媽的教育程度都不高，國小畢業而已，那他們討論也許是在外面跟別的父執輩啊，或是什麼人討論，在家裡比較少。」這段話說明，為什麼縱使同樣成長於民進黨支持者的家庭背景，小珍與九0前世代的黨工對民進黨的價值認同或對政治的熱情相差懸殊？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她的家庭政治化過程中，父親鮮少會在家庭中與小珍聊到政治事務，因此小珍對於民進黨理念價值的理解，並非從小、從家培養，或至少並無顯著的價值理念傳承。

爸爸比較不會把他自己的政治理念灌輸在小孩身上，而是我是從在旁邊聽到的，但是畢竟那種東西就會很片段，就不完整。

對於民進黨政治理念，小珍還提到，除了小時候會很片斷的從父親口中聽到一些政治理念外，影響自己的政治價值觀最主要是到了大學就讀政治系之後，開始閱讀有關台灣的史料時，才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她笑著對我說，「其實是在上大學之後，因為高中的老師都還是國民黨黨部的黨工，我甚至於還被導師帶去國民黨黨部去做摺文宣的工作。」可見對小珍來說，大學時代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似乎有稍微彌補或加強過去家庭社會化過程中的不足。

上述的討論脈絡，從年長世代談到年輕世代，這兩個世代女黨工在進入民進黨工作之前的生活經驗，無論是家庭生活或是校園的學習經驗，似乎都存在著明

顯的差異化特質。而這些差異化的成長特質，如何對兩個世代黨工看待黨務工作的認知養成產生具體而微的差異？以及除了家庭與校園之外，前面曾提及的進入黨部工作後，隨著組織文化氛圍的影響，黨工的政治態度與理念認同隨之提升，然而，一個組織團體的制度變革，又可能對黨工產生何種影響？最後，當女性黨工面臨結婚生子的家庭壓力時，又會對工作產生何種認知與行為反應？這些問題都將於下一節繼續深入討論。



第二節 世代認知差異的解釋

本節將接續上文的個人生命故事出發，並結合時代背景的宏觀視角，試圖對兩世代的女黨工做一工作認知差異的探討，以下分析分成三個層次。首先，仍然從黨工們進入民進黨工作之前的生命經驗談起，亦即家庭與校園經驗對黨工造成的影響究竟為何？其次，從時代與組織變革對黨工的影響進行論述。最後，則要從性別視角來理解女黨工在政黨工作中產生的問題，以及這問題將如何影響女黨工們看待黨務工作的態度？

一、家庭與學校的經驗啟發

整體而言，從上述幾位生命故事，大致可整理出為什麼九〇前世代的女黨工看待黨務工作較有政治熱情，或她們與民進黨的理念結合程度會比年輕世代黨工更為緊密？若先從黨工進入民進黨之前的經驗來看，這些原因不外乎是家庭與學校的生活經驗不同所致，而生活經驗不同也與兩代所處的時空背景不同有關。

家庭社會化的兩種面向：黨外的啟蒙與政治的冷漠

家庭社會化對黨工來說，究竟如何產生影響？一般來說，過去研究家庭政治社會化的影響時，許多研究都提到，父母對子女日後的政治態度養成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且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陳文俊，1997:171；Westholm,1999:547；陳陸輝，2010）。不過，從上一節的黨工生命歷程來看，兩個世代黨工在家庭互動的政治社會化方面，似乎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發展影響。

首先，對年長黨工來說，這些人的家庭背景雖不能說多數都有「從政」的政治經驗，但至少她們的父母親幾乎全數都是比較傾向支持民進黨或她們口中「泛綠」的支持者。她們的父母生活在過去戒嚴時期，體會了無論是 228 事件、政治犯被濫捕入獄或黨外活動等事件，這些經驗透過家庭教育或家庭社會化的過程（如一起討論政治事件、閱讀黨外雜誌等），都將有意無意地讓這一代的女黨工

們認知與傳承自其父母對於當時的政治或一些社會事件的看法與價值觀。

也就是說，年長女黨工的政治態度，首先便透過這樣的家庭互動有了世代傳承。該結果就如同陳文俊（1997）指出，雖然有些大學生會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形成與自己父母親不同的政治態度，但如果父母對政治事務的興趣是高的，且經常與子女討論政治時，那麼父母對子女的政治態度將維持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不過，即使家庭政治社會化對子女的政治價值有一定程度的傳承功用，然而，家庭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通常還是因人而異、因家庭互動方式不同而有種種差異。

就以這些年輕一代黨工來說，她們家庭父母親的政黨傾向，許多都是國民黨的支持者。因此，在這些「偏藍」的家庭中，自然不像具有「偏綠」色彩濃厚的九〇前的黨工世代家庭會出現黨外雜誌，或者在這些人的家中也不太可能出現，父母親與子女談論政治時有意或無意的傳遞出當時的黨外思維，或傳遞民進黨的政治理念，而這正是因為政治立場不同所致。

另一方面，也並非年輕世代黨工家庭背景都是泛藍支持者，個案中小珍父親就是民進黨的死忠支持者。不過，為什麼同樣成長於民進黨家庭中，小珍的認知卻鮮少像年長黨工一樣傳承自父親的政治價值觀？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就是年輕黨工們不斷強調，家中不太談論政治議題所出現的現象。從上文的描述亦發現，年輕世代黨工家中這種不談政治的現象並非源自家庭中的藍綠政黨傾向之別。

對此現象來說，一個簡單且明顯的比較就是，比起這些年輕世代的黨工而言，前文討論的年長世代的黨工家庭，她們的長輩似乎更容易與她們談論政治，無論是談到戒嚴前的生活故事，還是政治犯的遭遇或者是討論當時的新聞時事等。透過越經常性的討論政治議題，父母親的政治價值觀也就越能影響自己的下一代，顯然對於九〇後的這一世代，政治熱情的下降，似乎有一部份的原因也來自於家庭社會化過程的差異。

換句話說，九〇前的黨工世代之所以普遍看待黨務工作有較高的理想與政治熱情，一部分是與家庭中父母親的政治理念高昂有相當程度的關係，她們的政治熱情或想法部分傳承自長輩的政治態度；相對的，九〇後的黨工世代之所以較把

黨務工作視為一般工作，一部分的原因或許是因為，她們從小在家庭中所受到的「政治刺激」不像年長世代來的強烈所致，這裡所謂「政治刺激」不夠的意涵，更是指包含她們的長輩對於民進黨的政黨意識或理念，並沒有對這些年輕一代的黨工進行有效的傳遞，或者說她們受到父執輩的政治理念影響非常微弱。

因此，或許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理解，兩個世代黨工在家庭的政治社會化方面，似乎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發展影響，其中一條發展軌跡是開啟年長黨工們的政治意識或甚至對黨外政治的啟蒙；另一條家庭社會化的發展脈絡是使年輕世代黨工的政治意識啟發較晚，或相較對政治冷漠的情況。

如果家庭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是將名為政治的種子埋在每個人心中，而政治種子如何發芽甚至茁壯，則還要仰賴個人在不同的生命階段，不同的生命經驗持續施以養分，而對政治熱情的養分，或許學校的求學經驗就是其中一個重要關鍵。

教育的影響：強化連結與工作篩選

過去談論一般女性的政治參與時，教育程度的高低成了一個不能被忽略的結構性因素。然而，所謂結構性因素的影響指涉的是，教育程度高低反映出個人的政治資本或社會資本累積的多寡，而並非指受過越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學校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就越可能對政治感到興趣，或是說教育程度越高者，就越有高度政治化的情況出現。

換句話說，教育程度對女黨工的政治意識強弱，並無絕對直接的影響。因為就個案情況來看，既使年輕世代有許多人受到高等教育程度，但也有產生許多低度政治化的情況（即對政治不關心、對政治較冷漠），甚至是更徹底的受到過去黨國教育的涵化影響。⁵⁸因此，對女黨工認知黨務工作來說，教育程度對黨工所體現的影響主要有兩個部分，一是大學校園提供的集體行動的社團經驗，第二則是日後面對工作性質的篩選。

⁵⁸當然，這樣的例子，一方面也與受訪者家中的政黨傾向有關。也就是從小成長於國民黨背景的家庭中，比起支持當時黨外活動的家庭而言，她們在日後接受學校教育時，更可能與更容易接受過去黨國一體的教育思維。

進入校園後，特別是在大學時期，多數年長女黨工們在不同學校間都加入各校的倡議性社團。加入此種屬性的社團，在政治參與的意義上，將提供這些女黨工們除了正規教育外，還有額外的政治學習機會。而什麼是額外的政治學習機會？就如君梅所說，在大學參與倡議性社團容易與當時的社會運動產生結合或有所互動。也就是說，參與校園社團的經驗正好促成這些還沒步入現實社會的學生，有機會與實際的社會運動接觸，而這就是一種額外的政治學習機會。

在年長黨工成長與就學階段，台灣仍然尚未處於民主化(或正值轉型)階段，當時的反對運動或社會運動，無論是訴求環保議題(如反核四)或是為了反抗當時仍然不夠民主的台灣政權，所引發日後具有重要歷史定位的學生運動—野百合學運，對於老一代的黨工都有著不可抹滅的重要影響。特別是野百合學運這場「額外的政治學習機會」影響尤其為大。

記得好幾次的訪談中，幾位年長世代黨工總會不斷在不同的論述脈絡中向我提起「學運世代」這四個字。「學運世代」、「學運世代」從年長黨工口中不斷說出，其實透露出兩個重要的訊息意涵。第一、我曾參與過學運，並且對我來說，那是重要的經歷。從這一點立場來看，這四個字所強調的就是前面「學運」兩字，也就是參與學運的經驗。這樣的經驗使得這群人與民進黨的連結更加緊密，秀英特別向我強調，「坦白講，我們那時候大概就是學運世代，那就是這樣結合在一起(指參與運動和進入民進黨有密切相關)。」而有這樣看法的年長世代黨工，還不在少數。⁵⁹

簡言之，從前九 0 世代女黨工們的生命經驗可以發現，在她們大學的求學過程中，這幾位年長世代女黨工已透過參與運動性社團的經驗，累積了相當程度的個人政治資本或政治資源，使得她們在結束學生生涯後，比起其他人有更多參與

⁵⁹這樣的結果與看法和范雲(2003b)研究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社會運動參與者的生命傳記結果相似。她的研究指出，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學生運動是創造了一整個年輕世代的效能感，在學運改變世界觀的年輕人，認為他們是可能改變這個社會的，而社會運動正是改變社會的支點、認同與策略。同時，范雲也提到，這些在威權時期參與社會運動的運動者，從社運部門轉到政治部門的重要原因主要有兩種，一是生涯理性、二是意識形態理性。意識形態指涉的是當政治機會開放後，運動者會依照自己的意識形態「回到」政治領域，而根據她的研究對象的訪談結果也發現，當時很多人是存在反國民黨，或有 DPP 情結者。

或接觸民進黨的機會或動機。這也是過去研究中提到，透過參與學校中非正式的課程、課外活動（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將對於這些學生日後的政治參與或公民參與（civic involvement）有一定程度的影響（Smith,1999）。

回到學運世代中的第二個意涵，應該著重於學運世代的後面兩個字——「世代」，也就是屬於「那個時代」的學生運動。這就意味著在分析層次上，我們必須從個人的生命經驗提高至台灣政治民主化的歷程審視，因為個人之所以參加 1990 年以野百合為精神象徵的三月學運，其背後仍有歷史與政治上的時代意義。而所謂運動的時代意義就在於，自從 1950 年代開始到解嚴前，政治的反對運動與社會運動共同的目標，就是想在國民黨無所不包、全面滲透的控制底下，爭取基本的公民權與政治權（吳泉源，1997）。

因此，順此脈絡可以理解，成長於威權政治結構下的女性黨工，在進入民進黨工作之前，所經歷的無論是家庭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出現的黨外雜誌，或是參與反對運動或社會運動的經驗，這些都可說是源自當時的政治社會結構現況所致。即 1980 年代無論民主政治還是性別意識，都是一個處於亟須發展的年代，在威權統治及性別保守的社會結構底下，這些女黨工的個人生活經驗與時代中所欲對抗威權統治的集體記憶，都使她們更容易產生勇於打破現狀、突破體制的心態。

亦即為了爭取民主自由，縱使當時社會上的性別氛圍仍然相較強調女性就該保守，政治並非女人之事等，但她們仍透過父執輩的政治意識傳承與接觸黨外雜誌，初步養成自己的政治價值觀，並且在校期間參與運動性社團或者主動參與當時風起雲湧的反對運動。

反觀九 0 後的黨工世代，一方面因為她們對政治原本就是比較不感興趣的那群（與家庭背景有關），因此在校園生活中，她們自然沒有強烈的動機想參與倡議性社團或其他社會運動。甚至曾參與過民進黨選舉活動的小雅，也只是把那次的政治參與經驗單純視為打工性質。同時，由於新世代女黨工主要成長在 1990 年代後，此時的台灣社會無論是性別意識或者民主發展在 90 年代都有了重要的變革。雖然並非民主化後的台灣就不會面臨到前世代中的各種議題上的不平等，

然而，90年代後的台灣已是相較進步的民主社會，或許九0後的黨工也就因此相較不像前世代黨工在學校生涯中，會積極參與這些對抗社會不公義的倡議性社團，甚至也就不至於有更強的動力走上街頭。這是提供世代影響群眾政治行為差異的一種解釋觀點，並非弱化前述提及家庭政治社會化的影響程度。

以上論述是從大學校園提供集體行動的社團組織經驗對黨工產生的重要影響。然而，教育對於黨工認知工作的態度還存在第二種層面的影響。這種影響與前述「向社團、學運學習」的影響方式並不相同。如果說第一種影響主要的作用是發生於黨工進入民進黨工作前，那麼第二種層面的影響則會出現在進入政治工作場域後。

大學教育雖然可以比中等教育的校園中，提供更多元且更有自主性的社團活動讓學生參與其中，進而使她們與當時社會運動有所連結。然而，大學教育相較高中職的教育程度對黨工看待黨務工作的態度認知，還可能產生的影響在於，教育程度越高，女黨工們就越能憑藉大學的專業教育能力，從事非行政事務的工作，例如政策研究工作（即較具政治意涵的工作內容）等。而一旦她們有能力從事這種政治性較高的工作內容，那麼自然也就會對黨務工作的認知更加偏向政治層面的看法，反之則相反。⁶⁰

這樣的例子，可以從上文提過的小靜與小雯兩位對黨務工作的態度看出端倪。尤其是小靜，她認為黨部的職務層級設計非常仰賴教育程度高低，她只有高職畢業，同樣的年資，起薪就是比有大學學歷者來的低。⁶¹因此，她在中央黨部工作短短半年左右就選擇離職。雖然她離職的原因是從薪資高低出發，但薪資高低源自於她的教育程度。因此，教育程度高低一方面代表黨工的社會資本與政治資本累積的程度不同，但另一方面黨工進入黨部工作後，所從事的工作部門與工作性質，也需要透過教育程度進行篩選，因此黨工在黨內的社會化過程中，教育程度仍將扮演著一個中介與潛在的影響因素。

⁶⁰這裡提到的是教育對工作內容的篩選，而非意指教育和個人政治興趣有密切相關，亦即如前述教育程度高不代表政治化的程度就會越高。

⁶¹詳請參見附錄三，有對民進黨新進黨工出任職級表作一說明。

對兩個世代黨工來說，她們在進入中央黨部之前看待政黨工作的認知，是一種結合宏觀的時代背景和個人的生命經驗，兩者不斷的互相牽動，而產生出彼此牽連的複雜關係。因此，無論是家庭社會化或學校社團經驗，還是參與倡議型社團之後與社會運動連結，年輕與年長世代便有著兩條完全不同的經驗軌跡發展。

二、從抗爭性的黨到常規化的政黨

前文主要從個人經驗並結合時代背景的角度說明，家庭與教育對黨工在進入民進黨之前對黨務工作認知可能產生的影響。然而，從大環境的時代變革，到小環境的黨內組織、制度革新，當所有影響因素都在變動的同時，個人的態度與價值觀同樣悄悄地在新世代的黨工心中產生改變。對不少年長黨工來說，新世代黨工的價值轉變，或對黨的理念價值不甚了解，也並非都是她們自身的問題，而是因為她們「壓根」沒有經歷過那段日子所致。

君梅觀察從以前到現在的民進黨黨工看待這份工作的差異。她說，「我最近是有聽到一些 case 是說，政策的部門那有找了一些新的人來，那些新進來的那些人是一些剛畢業的研究生，那他聽起來似乎來這邊不是因為認同這個政黨。」雖然如此，她還是幫這些新進同仁做了些解釋：

但是我覺得畢竟，在 2000 年，或者是在我們之後才來的，她們第一個畢竟她們年紀比較小，再來是她參與這個黨的相關事務，她其實是有很大一部份是沒有參與過的，那當然是因為她年輕的關係，有些歷史他沒有參與到，所以我覺得這在看待事情或認同上，跟我們比較起來當然會比較不一樣。...

君梅的看法是從集體化的時代背景角度去理解，為什麼年輕黨工對於民進黨的認同程度並沒有像九 0 前世代來的高？因為「參與或不參與」是與「能不能參與」或「來不來的及參與」有關。除了君梅，春華基本上也是採取相似的立場，不過有別於君梅的說法，春華聚焦的重點在於組織氛圍的變革，自然會對黨工看

待黨務工作的認知產生差異，這並非單純全是九 0 後黨工個人認同的質變問題。

春華在民進黨工作超過十年，雖期間也曾短暫離職，但她與民進黨這份工作的情感，有著比其他人還深刻的感受。她在黨內的經歷相當多元，從最低層的黨工開始做起，然後透過黨內職位的調動升遷，春華比起前面幾位受訪者在民進黨擔任的工作職務更加豐富與多元。因此，她對於新世代黨工的認知，是從一個執政前到執政後，以及跨部門間的觀察結果。春華這樣表示：

我們那個時期是大家都運動出身的，大家對運動是有概念的，大家對於政治還是屬於一種革命的思維、那種情感。那跟 2000 年之後，的確有不一樣了，2000 年之後，相對的有些是以做為工作，一個工作進來，那對我們來說，它（黨務工作）就是一個志業，可是對 2000 年以後的人，他或許有情感，他對政治或許有情感，可是就不像是我們過去有種革命的氛圍。

除了因為年輕黨工沒有像過去黨工有著革命情感外，春華的觀察還提到，年輕世代的新進黨工，對於工作福利要求也比較多，「在我們那個時期，加班就是你就是要加班阿，你就是要為了你的工作付出一切阿，大家比較不會太強烈一定要所謂的同等回饋」。雖然提到有這種現象出現，但她認為「這沒有對錯的問題，就大概就是比較觀念的問題。」而且這種現象無關性別，男女普遍都是。春華進一步解釋為什麼這是個無關對錯而是一種觀念問題？她說：

我覺得是普遍都是，當然也有少數人跟我們一樣的拉，就是後期、2000 年以後進來的，她也是我願意為了我的工作犧牲掉我的一些時間，但是也越來越多人…就是說這個團體或這個組織有越來越多人堅持說，我的付出要得到同等回饋的時候，我覺得當然會去影響同儕的看法，當然這個氛圍就會慢慢形成，那形成到最後，這個制度就會越來越分明，責任越來越分明的一個制度。

春華的意思是，年輕一輩的黨工之所以比較重視工作福利、工作的實質回饋，其實與組織氛圍的轉變有密切關係。她舉加班費為例說明，當一個工作環境中有

同事認為，加班就要拿到同等的回饋時，那麼這種想法就會慢慢影響到同一個工作場域中的每一個人，當然就會使所有黨工越來越重視工作中的實質報酬。而為什麼這樣的態度或想法並沒有特別對年長黨工產生影響？答案也很簡單，因為「我們（九〇前世代）過去有種革命的氛圍。」春華所提的革命氛圍，就隱含著革命情感是絕對重於理念以外的物質報酬。

一群人有著革命情感，可能受到類似的成長經驗與時代賦予共同的集體記憶形塑有關。不過，進一步要問的是，為什麼民進黨中的九〇前世代黨工比起九〇後黨工會更有這種革命情感？這個問題暗示出，除了集體經驗或集體記憶外，影響黨工特質的世代差異，還有其他因素。而要有效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將分析層次從個人拉到黨的層面來看。因為時代不只影響個人，時代變遷也影響了民進黨的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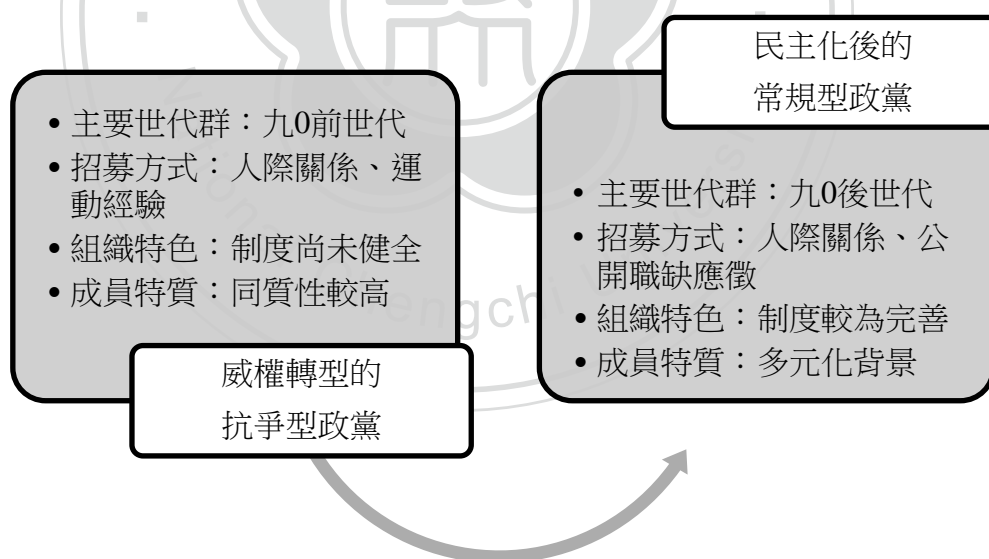
在過去民主化初期，民進黨仍須對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政權，進行體制內的政治參與或體制外的街頭抗爭。在「革命／抗爭」時期，民進黨相對需要有高度忠誠與認同者進入黨的體制，這時的民進黨或許為確保成員的同質性，以利集體行動的政治目標達成結果，因此招募黨工經常是透過非公開的方式，以人際關係或曾參與運動社團、社運經驗等為招募人員的標準。

而進入到政黨政治的常態化時期，尤其是在 1996 年全面的政黨轉型中，民進黨已經告別革命，走出暴力黨的刻板印象（郭正亮，1998）。此時期的民進黨比起創黨初期勢必有著不同的發展策略，特別是在黨的用人方面，開始開放更多元立場與意見進入政治工作場域中。雖然民進黨的工作職缺並非全面都公開讓大眾應徵，然而在相較政治不這麼敏感的民主社會下，確實有部分年輕世代黨工是透過公開的招募方式進入政黨的工作場域。小雯、小嘉等人便都是這樣的例子，小雯陳述當時入黨工作的經驗說：

因為我那一屆是屬於對外開放的，是第一次對外徵招，以前是沒有，以前是我的朋友和我的親人在那邊工作，我才有可能進來，或者是教授的

關係，才有辦法進來政黨工作。那我比較特別的是都沒有這樣的關係，就是很單純的那一屆是民進黨第一屆對外公佈來招募，我記得那時候是說，希望招募一些比較年輕的同學，然後一起加入民進黨，在大家不同的世代交替的時候，會有一些觀念和想法帶進來，所以，很幸運我剛好遇上那一屆有對外公開應徵，所以我就進來了。

因此，不同時期政黨的用人策略，或許已對部分黨工看待黨務工作的認知作了初步的篩選。新世代黨工面對組織文化與制度的改變，強調工作專業的功能分工，再加上組織用人的多元化策略，將使年輕世代黨工存在著專業功能取代理念價值的特色。簡言之，時代給予不同世代黨工有不同的集體記憶，相對的政黨在人才招募上，在不同時代也有不同的轉變，在這兩種因素的結合互動下，民進黨內黨工存在異質性或多樣性便無法避免，而這也是一種時代影響政黨變革的一種結構性因素。關於黨組織與黨工特質的世代差異，請參考圖六整理。



圖六、政黨變革與黨工特質差異的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組織變革中的工作認知：薪資提升與福利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民進黨的組織氛圍產生關鍵轉變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關於這個問題，不同黨工的回應有著不太相似的看法。有些受訪者認為，1996年是民進黨關鍵的一年，除了當年有大舉向外徵才，民進黨在內規與制度上的建立也已頗為完善。而這種說法與郭正亮（1998）書中談到的民進黨在1996年以後黨內全面啟動改革與轉型在時間上不謀而合。不過，除了1996年，上文中亦有黨工隱約都有提到的時間點是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民進黨組織文化才是真的出現明顯差異，⁶²因為這之間的轉變關乎到民進黨是執政還是在野的兩種政黨角色。執政與在野的角色轉變對黨工最大且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黨的資源變多了，制度與組織的分工也越來越細緻。而這樣的變革，對於黨工看待黨務工作又有何影響？

民進黨成為執政黨後，所謂「資源」變多有兩種看法。首先，資源指的就是財源相較寬裕，當政黨財源相較充足後，黨工薪資自然會被提高。秀英認為，制度建立完備將給予後期黨工有更完善的工作保障與更優渥的薪資報酬，她說：

它（指薪水）後來有調，我們執政過你要知道，所以部門主管的薪資他有調整，但你不可能只調部門主管，你一定是連黨工職都一起調整，然後甚至當年我的主管，我的部門主管○○○，他其實在內規裡頭有幫基層黨工有爭取一些，因為他早期的背景應該是工運，他很注重勞工的福利。

其次，有別於金錢或物質上的額外報酬。另外一種資源指的是黨內有更多元的工作發展機會。在執政時，有許多黨工有機會因此到中央部門擔任機要等職位，但這樣的機會也並非人人有，仍要透過一定程度的人脈牽引或工作能力表現突出才有機會。在我受訪的對象中，秀英與君梅的情況就是這種例子，她們都曾離開黨部到政府中央部門任職的經驗。秀英分享當時的經驗：

⁶²然而，必須提到的是，不論哪個時間點，黨內改革的發展應該是一種不斷累積的過程。

這些都是機要的任用，因為首長可以有五個機要的職缺嘛。那他當然一個人去到部會需要一個秘書協助，都是首長找的。當然○○署是被安排的拉，因為我原來在陳水扁團隊，他們安插我的那個部份我不想去。

簡單來說，民進黨自 1986 年成立到 1990 年代中期，在組織的制度規範中，仍較屬於一個正值發展時期的政黨組織，例如前文美香曾經提到與黨工最直接相關的「中央黨部黨務工作人員服務辦法」便是於 1993 年初步制定完成（在美香入黨工作後的兩年完成，據她說法這是她們那個時期進入的黨工協助制定完成的規章）。⁶³而在 1990 年代後期，民進黨的內規有了很大的改變與建立，特別是黨工的服務辦法在 1995 年及 1999 年之後都有了些許修訂。甚至黨工的「考績作業注意事項」（關於黨工考績的詳細規定與執行事項）更於 2002 年 4 月 1 日的第 9 屆第 83 次的主管會報中才完成制定。⁶⁴

至於性別方面的法規，除前文提到的民進黨於 1997 年 9 月 27 日的第 7 屆第 2 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中，以鼓掌方式通過「單一性別在總數中每滿四人應有一人」之規定外，在隔年也就是 1998 年 6 月 17 日的中常會更制定了「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性騷擾申訴處理辦法」，內容詳細說明如何處理與保障黨工在黨部工作時遇到的性騷擾事件。總之，在 90 年代中、後期以後，黨工相關的福利政策與工作保障，如育嬰留職停薪、哺乳時間、工作時間減少與調整、家庭照顧假、生理假以及升遷的標準和加班規定等也都相對過去有了更為妥善的規定。

任何一個組織變革、成長與轉變，都是一種累積的過程。有了 1990 年代中後期的制度建立與修正，民進黨也就越符合年輕世代黨工所認知的「穩定工作」的條件。舉薪資為例，當制度建立後，民進黨黨工的薪資與福利有了統一的標準。基本上，在薪資方面的安排，民進黨會先把新進黨工按照工作性質的分配，分為

⁶³該辦法內容包含了民進黨黨工在中央黨部的任用與解聘、薪資晉級與升遷、工作時間、考績、獎懲與退休等規定。

⁶⁴詳細內容請參閱民進黨官方網站中本黨法規：<http://www.dpp.org.tw/history.php>（查詢日期：2014 年 1 月 21 日）。

行政人員及研究人員，之後再依初任職級表起敘薪級。同時，民進黨在 2000 年執政後，由於資源較多，黨工在薪資上也比過去更加優渥。因此，在各種工作條件的調整與發展下，春華認為這樣的工作環境，不免容易形塑出，後期進入的民進黨黨工，在從事黨務工作時，逐漸產生「公務員化」的心態。

簡言之，當這些制度福利與工作保障的規定越加完整，後期新進的年輕黨工理所當然比前期的年長世代黨工，就越享有跟一般其他工作類似的工作福利與權利，而她們對於黨務工作的看法也就自然比較傾向於一般工作的認知取向。⁶⁵

三、政治參與與性別角色的兩難

民進黨組織氛圍與制度在執政後雖有大幅變革，特別是在 1997 年民進黨針對內部女性參政保障制定後，一般而言，我們會假定當政黨中的制度設計對女性參政越友善時，參與其中的女性便更可能有動機或機會從事更高的政治職務工作（包含參選），因而間接對這份工作的認知產生更偏向政治參與的看法。不過，對於這些受訪的女黨工來說，當黨內相關性別平等制度建立後，她們似乎沒有因此對政治參與更加積極。而這個問題的產生與長久以來女性面臨公、私領域的難題有密切關係。

每個人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域中，必須面對自己在私領域及公領域中的身分角色。身為民進黨女性黨工，在工作中，她可能扮演著幹事、組長、副主任、主任等黨職身分，這些身分給子女黨工們在工作場合中應盡的責任義務。然而，回到私領域的家庭之中，已婚的女黨工還需要面對的是家庭中的母親、妻子的角色，而這種私領域的身分與責任往往帶給這些女黨工有著莫名的壓力。

小雯 2013 年離開黨部工作後，進入了同樣是民進黨立法委員辦公室擔任地

⁶⁵這裡必須提到的是，雖然年輕世代黨工進入民進黨的時間點多為黨的組織制度改造後進入（即 1996 年以後進入），不過在個案中也有年長世代黨工因為出國念書的因素，而使其進入政治工作的時間較為延遲，也就是進入的時間點也正值民進黨的制度改造有了一定成果之時，不過該個案的文琪並沒有因為組織環境的改善而與年輕世代黨工一樣更傾向一般的工作認知。這顯示黨的組織工作僅是影響黨工看待黨務工作的因素之一並非絕對，制度有誘因但也有限制。同時，個案也正再次凸顯世代所存在的集體記憶或許比黨的變革因素影響更大。

方服務處的助理，當我詢問她為什麼會選擇離開民進黨中央黨部時，她的理由是從家庭角度思考，她說：

第一個是因為進入婚姻，然後有小孩的關係，而整個生活上的時間必須要調整，那中央黨部的工作可能需要階段性的加班，這是對我們已婚有小孩子的婦女來說，是一個比較沒有辦法再持續的工作。

或許因為小孩還小，小雯認為自己已經結婚生子，是有必要把生活重心做些調整，從原本工作為主的生活，調整成既能兼顧工作也能照顧家庭的生活模式。而擔任不分區立委地方辦公室的行政助理對她來說，已經相對比中央黨部工作的負擔減輕許多。因為過去在中央黨部工作時，只要面對黨的大型活動，或遇到選舉年時，時常就需要面對晚上加班或假日也要上班的問題，而服務處的工作則有清楚的上下班時間。

除了小雯，在第四章中，我曾提到小靜認為「政治工作不能當飯吃」的說法，這句話放在此亦能更加凸顯，女性除了面對像小雯所需承擔的家務分工的母職責任外，身為母親亦是妻子同樣需要分擔家中的經濟來源，而小靜便是認為，結婚生子後，尤其又有三個小孩，這種家庭的經濟壓力成了她離職的重要考量。不過，除了家庭經濟壓力外，小靜認為：

其實在政治這一塊工作很難去兼顧到家庭，那在事業上有所突破的時候，婚姻跟家庭這個部分就很容易被影響。

她甚至提出自己的觀察說，「一般而言都會那樣，那如果說女性當到主管，要嘛就是離婚的。」然而，女性面對家庭與工作間的兩難，似乎存在於每一位職業婦女身上，也就是這種現象在台灣並沒有世代之別。年長世代的秀英第一次離開民進黨的原因，⁶⁶也是因為結婚生子的緣故。她說，「基本上不管是社運工作

⁶⁶第一次離開的意思是指後來秀英還是有再回到民進黨工作。

或者是政黨的工作，對於那個年代的我們來講，它都不是個穩定的工作。」她補充說道：

你要知道，這兩個部門（指社運、政黨工作），其實當年的財務狀況都是不穩的，我想即使到現在，社運部門的資金來源也應該不太充裕，都是靠募款，政黨可能還比較穩定一點。那我後來因為結婚了生小孩了，那我就覺得應該要有個穩定的工作。

對秀英來說，政治工作從來不是一個穩定的行業，但她仍然可以為了實現自己對環境保護的理念以及自身的政治價值而進入民進黨。然而，當她結婚生子後，過去理念為重的念頭卻有了轉變，她突然覺得自己必須為了家庭而找個相對穩定的工作。因此離開中央黨部後，她曾透過自己的英文長才在補習班教英文。不過，她也坦言，那段教英文的日子實在「憋」得很辛苦，因為這並非是她最想從事的工作。所以，半年後她又毅然決然離開相對穩定的英語教學工作。而後有一段時間秀英又先回社運團體，然後才又到民進黨的工作體系，繼續從事政治工作。⁶⁷

無論是小雯、小靜還是秀英，她們的例子都告訴我們，女性在外從事工作（特別又是秀英口中「不穩定」的政治工作）時，面對傳統女性被賦予的家庭照護的壓力，她們都在結婚生子後的不同時間點，選擇離開民進黨這種難以兼顧家庭與工作的就業場域（當然有些只是暫時離開這份工作，如秀英的例子）。這樣的結果，就如同 Abbott、Wallace 與 Tyler（2005）所說的，「女人屬於家庭」的意識形態，對許多女性主義者而言，她們認為並沒有什麼理由必須如此，但是這樣的意識形態，卻已經對許多已婚女性造成實際上的影響。

已婚的女黨工面對家庭壓力，除了像前面幾位黨工有轉職的決定，女人有了婚姻後，也可能會降低女性在黨內繼續升遷的念頭，如小珍說「因為她必須去評估說，有沒有辦法去面對家庭給她的壓力，而轉換成為所謂的非事務性的黨工去做組織發展，去做一些更多超時假日工作的一些非事務性工作，我覺得這個不是

⁶⁷回到民進黨工作後，秀英不久又到政府部門服務，直到結束政府部門工作，才到民間公司上班。

因為民進黨體制給她的壓力，而是來自於家庭讓她自己所做出來的選擇。」另一方面，目前仍然單身的小佩觀察，「…就我們部門的狀況，可是我觀察其他部門也是，就只要進入家庭特別是有孩子以後，可能就會比較希望回到行政性的工作。」

不過，小佩特別向我提醒一點，女黨工們面對家庭壓力，更甚者是她們有了小孩之後，勢必會對目前的工作情況做些調整，但是這不代表她們就不愛黨了，「她們還是愛黨啦，但是她們沒辦法二十四小時愛黨，就是會切割時間這樣，我覺得這一定會有影響，因為我們的工作真的是，尤其到了選舉的時候，是你沒有辦法想像什麼事都會發生。」

當然，也有些例子是黨工結婚生子後，仍然留在黨內繼續工作，甚至最後升遷主管階級，文琪的情況就是如此。曾經有三個禮拜因工作出國而沒回家的文琪，在結婚之後並沒有遇到太多來自家庭的阻力，這是因為她的丈夫過去也是在黨部工作的同事，婚後的家庭非但沒有給文琪太多額外壓力，同時對她的工作也有一定程度地支持。可見從事政治工作的女性，若要在職場上有一番成就，那麼家庭在背後無悔的支持便是一個重要關鍵。

另一個例子是，結過婚但沒有小孩，目前恢復單身的君梅。面對婚姻生活與工作時間調配問題，君梅認為縱使當時有婚姻狀態，「我在工作上的空間是非常大，一方面我沒有小孩啦，如果有小孩我想情況會不一樣…我可能的想法就會和現在不同，那不過因為我沒有，所以至少對我個人的狀況來說，沒有特別的差異，單身的時候跟已婚的時候沒有特別的差異。」君梅也強調，自己選擇離婚與從事這份工作並沒有絕對的關係，兩人不曾因為工作而有過爭執。不過，她亦感慨地說，「一個女性的政治工作者，她如果要做的久，必然她的家人要非常包容她的，因為她的工作不穩定，她的工作時間很長。」

談到離婚，讓我們回到秀英的例子來看。當我詢問她的黨務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情況，她帶著略有後悔的語氣說，「我跟你講，我當初就是太早了，現在想起來會有點遺憾啦。」秀英突然這麼一說，我剎那間有些模糊了，我接著問她，「是指太早離開民進黨的遺憾嗎？」這時秀英才補充說道：

太早…結婚生小孩，對，所以你不知道在那個部分（小孩子成長時期）應該要更投入，更專心陪伴他們，因為現在他們已經很大了。

秀英會突然這麼說是因為，她大學畢業後沒多久就結婚、生子，當時她的年紀還很年輕，只想衝刺工作，沒有在小孩還小的時候多陪伴他們。對於這段往事，她自責且遺憾地對我說，「是現在想起來覺得很愧欠自己的小孩，當初不會這樣想，我還蠻自私的，就是覺得成就自己蠻重要的。」甚至秀英還說：

我就覺得像我這樣子的人應該不適合婚姻、或者家庭，更不適合生小孩，恩…繁衍下一代是人類蠻重要的一個任務拉，雖然我覺得人口過剩也不用生太多小孩拉，但是不平均，像是台灣是負成長，那非洲就生太多了。問題是不管怎麼樣，我覺得既然孕育下一代的生命，應當對他們的生命有一份責任在，我不像一些好朋友們，他們其實會把好多心力放在培養自己的下一代身上，我沒有，我可能是因為也太早結婚了，恩所以其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責任，我確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責任，我很瘋狂的，我很熱愛我自己的工作，我把我的時間投入在工作裡，我真的是到年紀比較大了才去意識到說，我忽略了那一段跟小孩相處的時間，然後忽略到那一段應該要好好陪伴他們的時間。

從這段回應知道，秀英因為當時對工作的熱情而忽略家庭，因而感到有些遺憾。不過，說到底她的心理狀態或許無意識地存在兩種想法，一方面是想勇於突破或不想落入傳統性別角色，女性只屬於私領域的保守觀念，所以她後來還是選擇繼續從事社運或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她又一定程度地受到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影響，認為自己應該在婚後多回歸家庭生活一點，進而調整好工作與家庭間的時間分配，如此才能兼顧家庭。這種矛盾的心理狀態，正好說明女性參與勞動市場，在過去或現今台灣社會，仍然都需要面臨家庭責任與工作間的雙重考驗。⁶⁸

⁶⁸張晉芬（1995）曾提到過，雖然家庭是由兩性所共同組成，但即使夫妻同時都有工作，家務卻仍多由女性擔任，尤其因為女性需照顧年幼的子女，以致於許多女性只能選擇兼職或甚至無法工作。簡單來說，家務負擔確實常使女性在家庭與工作兩難之際選擇離職，造成工作經驗難以持續（1995:158-159）。

不過，從君梅、秀英、文琪等年長世代黨工的回應來看，縱使她們結婚之後，也像年輕世代黨工（如小雯、小靜）一樣面對了些許來自家庭的壓力，但她們選擇面對的方式大多仍是繼續接受工作的挑戰，雖然有沒有生小孩或許是女性從工作中選擇是否退回家庭的重要影響因素。然而，年長世代的個案仍告訴我們，同樣也有生兒育女，不過她們似乎仍比年輕世代黨工在婚後更堅持選擇這份政治工作。為何如此？兩種不同選擇的背後告訴我們什麼？

世代間的性別問題：性別平等意識的差異

在不同政治機會條件下進入民進黨工作的兩群黨工，各自所擁有的集體記憶與進入工作前的政治化程度彼此有所差異。因此，當她們進入實際的政治工作後，必然也會依照先前發展脈絡產生不同認知上的趨勢差異。而兩個世代黨工在面對政治工作與性別角色的問題時，似乎一部分也是從這樣的工作認知差異發展而來。不過，若要精確地來說，兩個世代面對的選擇問題仍有概念上的些許差異。

兩個世代縱使都有著工作與家庭間的兩難問題，然而對九〇前黨工世代來說，確切的命題應該是，政治參與和家庭關係的兩難問題；而九〇後的黨工面對的則是，從事一份工作與家庭關係的兩難問題。也就是說，性別角色的困境不同世代皆有之，但當兩者對應的選項不同時，所作的選擇便有意義上的不同，因此這成了兩件不同的事。

年長黨工比起年輕世代看待政治工作更多是帶著政治參與的認知意涵，而當從事政治工作越有高度政治參與認知時，女性在外工作所需負擔的成本，除了一直以來傳統社會對女性母職的性別角色期待，還要面對的是服膺自己的政治理念後，持續參與政治所需換來的成本。這個成本的擔負，就年長黨工個案經驗來看，指的就是犧牲個人的婚姻家庭，而這種犧牲可能是失婚或持續單身的狀態。那麼，這種為黨打拼、為理念價值犧牲的結果，在「選擇」背後還突顯出何種結構性問題？要回應這個問題，或許應該從時代中的性別意識談起。

相較男性黨工，婦女運動的發展結果對女性黨工而言，更有著切身的密切關

係。因為運動的成果關乎時代如何看待女性，以及社會整體的性別平等觀的差異。根據訪談結果，整體來說，兩個世代黨工多數仍認為，台灣性別平等還有改善的空間。然而，她們認為要改善的看法，世代間還是存在不同程度的看法差異。

「我覺得還有很多不平等！」語氣堅定的文琪說，有關性別間的不平等往往出現在許多男性不會注意到的細節裡。她舉例說，曾經聽過有位主席的秘書，當時在一間會議室等著開會，但那時有幾位政治人物走進辦公室作勢想摸女秘書一把，但女秘書並沒有讓他得逞，當場也沒讓他難堪，只是一個「巧妙的轉過身躲過。」文琪認為，這種舉動就顯示出兩性之間還是存在許多不平等的情況：

在工作上，其實有時候男性的言談或行為也會不小心讓女性覺得不受到尊重。我覺得這都其實還要努力才行。

另一位黨工秀英在離開黨部後，也曾選擇從事與政治無關的工作，對她而言，她既體會了政治場域中的性別不平等，也感受到一般民間企業中更嚴重的性別不平等。因此，在談論這個問題時，秀英特別針對工作中兩性擔任主管職的比例懸殊感到不平：

有，很多（指還有很多的不平等）！其實你知道後來政府部門有規定，現在叫做兩性，恩…以前叫做兩性平權，現在叫性別平等吧，不管它叫什麼名字啦，其實就是意識到女性的參與被剝奪，那整體來講，在民間企業更明顯，你說政府部門他用法律的規定去符合那樣的額度，可是在民間阿，你會看的到女性主管非常少，非常非常非常的少，這裡（指她目前工作的單位）也是，大概負責的都是男人，大概只有一位女的吧…

比起前面兩位，君梅對台灣性別平等的看法則更為悲觀。她認為，兩性永遠不會有平等的一天。

我：那整體來說，請問您對台灣社會上的性別平等發展有什麼看法？

君梅：呵呵，兩性永遠不會平等，只能盡可能的相互了解，並且相互尊

重，因為不會有平等這件事。

君梅舉例，「我覺得在特定的事務裡面，就像我講的政治事務，可能不只拉，因為我做政治的，政治事務或很多的學術研究裡面，或者是說一些政策領域裡面，通常能夠發聲主導的仍然都是以男人為主。」不只年長世代黨工認為性別還有很多不平等，曾經在婦女團體工作過的九〇後黨工小佩，對於社會存在的性別不平等的感觸尤其為深。然而，小佩對我說，她在生活或工作上算是幸運，不太有過性別不平等的經驗。不過，她提到民進黨還算是個比較陽剛的政黨，所以曾經有過幾次的工作經驗，因為自己是女性身分而備受「照顧」，縱使「我不認為我需要特別被照顧」。小佩說：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可能整個黨會做一些黨務工作的編制，譬如說我們就可能要去地方，真的跟地方的人接洽，或地方的一些幹部，可能是男性的幹部做接洽的時候，我自己覺得民進黨還是一個比較陽剛的政黨。然後，譬如說，幾次在進駐地方的一些選舉的時候，我的感覺是即便我是代表中央黨部，或者是即便我是代表競選總部的身分去跟地方做溝通，我還是很容易被當成是妹妹，因為是小女生，跟我對話都是我父親那一輩的長輩。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多東西就是，當然那是他們地方上的經驗，可是你的專業會完全被你的樣子或性別給掩蓋掉，那時候其實有點挫折。

相對前面幾位認為台灣的性別平等仍然需要改善，並且改善的程度還有很大的空間，小雯的看法則相較保守。她認為，台灣社會的性別平等已經平等許多：

我覺得這幾年其實已經平等很多了，但還是有所謂的不平等，但那是人為的疏失造成的，並不一定是制度上造成的，就是可能因為我們是中國人，台灣人的思想，以前文化的關係，還是會有一些比較傳統的觀念。

從小雯的觀點來看，她認為縱使社會還有不平等，但這並非是制度造成，而是傳統的觀念或思想還沒有全然修正所致。而她覺得性別平等的原因主要是從

「法規制度」層面思考，因為小雯畢業後，開始進入工作職場的時間，已經是婦女運動累積到一定成果的 1990 年代中、晚期了。也就是說，她體會到社會上的性別經驗已經是一個相較過去平等的台灣社會。所以，她的看法與感受，顯然與其所身處的時代背景有著相當程度的關係。類似看法還有小雅，她認為大致上台灣透過立法修補，性別關係相對已經平等（指性平相關修法），但「我覺得應該還是有一些不平等」。

當然，性別「平不平等」所涉及的議題層面相當廣泛，有人針對工作（工作平等），也有人針對家務分工（性別角色），但整體而言，若把性別平等視為一個總體性的概念時，兩個世代女黨工們多數仍然認為，台灣性別發展還是有不平等的現象存在。然而，細究兩個世代黨工對性別平權的感受，年長世代比起年輕世代的黨工似乎對目前的性別平等發展仍有較強烈的不滿意。換言之，對於年長世代黨工而言，她們認為要改善的原因是，台灣社會仍然存在許多性別不平等的現象。而對於年輕世代黨工來說，她們認為要改善的原因是，台灣社會相較過去已經較為平等，但「平等還需要更平等」，這是一種好還要更好的概念。然而，為什麼年長黨工相較年輕世代普遍有更強的性別平等標準或期待？以及性別意識與兩個世代面臨性別角色與工作兩難的關聯為何？

從集體的性別經驗差異來看，由於在高中、大學階段成長於戒嚴時期的九 0 前黨工世代，她們成長的背景普遍是一個相較保守、傳統的社會，縱使婦運在 80 年代已經紛紛展開行動，並想破除傳統社會中的男尊女卑觀念，但其成效比起民主化後的運動成果明顯有其侷限（如女性參與政治或平等的就業機會等）。九 0 前世代黨工因為體驗過社會在政治及性別上保守，所以面對家庭與政治工作中的所需負擔的政治成本與家庭母職照護時，所選擇的行為結果，似乎更有著象徵女性打破傳統公私領域二分的政治參與角度來看這份工作的意涵。

此外，婚姻中存在著各種可能性，就年長個案經驗觀察，參與政治工作並非必然導致失婚的結果，但失婚或單身狀態卻是她們參與政治工作後的一種結果表現。當然，失婚是一種失去婚姻的結果，但不代表失婚就是失敗的婚姻，失婚或

單身也可能是對傳統婚姻體制的一種不妥協後的結果。

這樣的結果表現或許如同 McAdam (1988) 發現，在 1964 年曾參與 Freedom Summer 計畫的女性志工者，在參與計畫後，她們似乎更能體會個人即是政治的意涵，也就是活動參與的經驗，使得這群女性更容易把個人生活 (personal lives) 與政治選擇 (political choices) 產生連結。而這種連結將強化她們對於自我的了解 (self-discovery) 與個人對自由的認知。同樣的，如果把政黨工作視為一種政治運動的參與，作為政治運動的參與者，九 0 前黨工世代一方面可能受到時代背景對性別意識的形塑，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過去參與政治活動或社運經驗，使得她們面對性別問題時，將有更強的性別意識觀念。

在時代轉換下，有別於過去婦運強調的社會分配正義等集體制度性的改革問題，九 0 後的新世代女性更要處理的是個人的身體政治、生育或家庭照顧等屬於認同政治的性別議題 (范雲，2003a、2010)。對於完成學業後多半已是 90 年代中、後期的年輕世代黨工來說，過去女性常被認為只要做好私領域的家務工作而不涉入公領域的參與，已有相當程度的制度與文化變革。或許如小雯所說，傳統觀念與思想往往難以撼動，⁶⁹但至少透過制度上的改正與婦團在社會上的論述努力，客觀上來說兩代的性別經驗確實是有所不同，因而也產生不同的性別意識。

而不同的性別意識體現於，當年輕黨工她們可以投入政治工作的職場時，在性別經驗的意義上，參與政治已不像傳統威權社會氛圍中，強調女性不要碰觸政治的保守價值，因此當制度與社會氛圍在 1990 年代中、後期產生變化時，對於成長於該時期之後而沒有直接體驗過去更傳統、更父權的社會文化的這些女性黨工，也就更能從工作的角度來看待黨務工作。而把政治工作中的政治意涵減弱後，九 0 後的黨工面臨工作與家庭生活兩難時，便相較不會有強大的誘因像九 0 前世代為了政治理念的高度價值實踐，而付出犧牲家庭的隱性成本問題。取而代之的是工作中的制度福利或薪資多寡是否足以保障，她們在選擇家庭與工作的過程時，

⁶⁹也如王雅各 (1999) 所說，婦女運動在不同時期中，從宏觀與微觀的角度都有不同的影響程度。宏觀指的是如法律、工作、政治等社會制度的改善，而微觀指的是個人認知、理念與期許的轉變。

能夠相對減少工作成本的付出。

總結來說，當兩個世代都同樣面臨家庭生活壓力與工作責任的兩難時，雖然她們都可能因此對黨務工作的認知產生些微轉變，但這種轉變的力道或態度，明顯也有程度之別。因為對年長世代來說，她們是在政治理想中找尋一切可能的答案，也就是追求政治工作中的一切可能；而年輕世代則是在工作制度化的出口中，尋求工作與家庭生活間的平衡。



第三節 跨世代的生命經驗：價值的變與不變

上一節從世代與個人生命經驗、世代與組織、世代中的性別意識等不同面向來分析兩個世代黨工的整體差異，但強調世代差異，也並非否定世代間存在的個體差異。上一章文末，我拋出一個問題，九〇後的黨工世代對於黨務工作的看法就一定傾向工作職業取向？或者偏重薪資福利嗎？其實，答案仍然要從整體的脈絡與個人的經驗審視，也就是雖然年輕世代都是在相同的社會政治結構的脈絡下發展，但隨著每個人的生命經驗或政治化的差異，仍可能使新世代的生命存有老世代的靈魂。

一、超越世代的價值觀

提到過的小佩是屬於年輕的九〇後世代黨工，但在年輕的小佩身上，似乎與多數的年輕世代存在許多不同的特質，並且在這些特質的差異上，似乎呈現出老世代的經驗，導致小佩在看待政治工作的認知中，比起年輕世代，卻更像年長世代的工作認知，也就是更加強調黨務工作的政治性。小佩的例子或許可以用這句話來形容她：新世代的軀殼中存有老世代的思想靈魂。

小佩，出生於 1980 年代，大學念的也是政治系，同時她也是家中的獨生女。2004 年進入民進黨工作的她，比起多數黨工幾乎都是確定在民進黨工作之後，才加入民進黨成為黨員，小佩則是早在 2000 年就已經率先加入民進黨成為黨員。為何如此？小佩說，「家裡一直都是比較支持民進黨」，而且「我們家都是黨員」她補充說。

其實，小佩對於民進黨的政治理念主要是來自家庭的影響，甚至她坦言，一開始加入民進黨的原因是，「因為父親希望我入黨」。可見小佩的父親在家庭中透過自己對於民進黨的認同，有意無意的已經將自己的政治價值影響了小佩。除了父親的影響，她還說：

就是小的時候，他們會說二二八的事情，那個是跟我們比較近的事情，就是祖父還有經歷過二二八，有目睹那一切，可能有一點點波及。

因此，家人彼此間會討論政治事件，對於小佩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啟蒙。而這種家庭互動的特色似乎與前九〇世代的黨工家庭有些許的類似。不過，當我接著詢問她，家人雖然都對民進黨有高度認同，但家人是否會在小時候教導你不要參與政治呢？小佩的回答是，他們不會特別要求不要碰政治。但是，她認為家人沒有特別提醒的原因可能是：

但是我覺得有可能是更糟糕的是，那個其實他們根本沒有想像女性可以從事政治這一條路，他不知道去警告你不要做政治，根本就沒有辦法想像你會做這件事情，那個時候他們可能只希望你時間到了就結婚生小孩，就沒有想像這個，這個是有可能的。

大學就讀政治系的小佩，其實在高中時期就對政治學領域中的國際關係產生興趣。她對我說，「之前本來生涯規劃是要走外交，結果就是進了大學之後，發現好像對那一塊比較沒有興趣，當然家人也不太同意，就是外交那一方面，因為如果有需要外派或什麼的，家裡比較不同意、不支持走那一塊。」

從這段話中可以知道，就在小佩就讀政治系之後，她發現外交領域似乎沒有想像中來的有趣，又加上家人不支持她日後繼續走外交工作，因此她的生涯規劃面臨了改變。不過，當她對於所學的國際關係失去興趣後，她也開始接觸了婦女團體，並且在大學期間時常抽空參與婦運團體的相關活動。有了這段參與婦運團體的經驗，小佩逐漸把婦女工作視為日後的職涯規劃之一。

當她大學畢業後，在進人民進黨工作之前，有一段時間曾短暫到私人貿易公司工作幾個月。不過，後來因為婦女團體有職缺釋出，她馬上轉職到大學時期就開始接觸的婦女團體工作，因為她對於婦女團體所推行或倡議的主張都有非常濃厚的興趣。然而，她也坦言，父母親對她在社會團體工作有些不滿。小佩說：

我家蠻反對我在團體工作的，因為可能大部分的人比較不能想像什麼叫做婦女團體，然後可能會覺得那應該是個沒有薪水的工作，因為團體沒有錢，其實也比較低薪啦！是真的，然後我爸以前都會說，台灣女人年輕就是在賣藥的嘛，⁷⁰哈哈，因為沒有聽過，即使連婦女新知他也不會聽過，跟他們的生活離得比較遠一點。所以，其實那個工作反而會被我的家人認為比較是不務正業的工作。就相較於我之前的工作，他們可能就是覺得在貿易公司工作比較有前途，怎麼會跑去一個婦女團體，然後也不知道在幹什麼，因為跟他們說現在在處理的哪些法案，或是你們（指婦女團體）在關心的一些議題，他們其實不太能夠理解這樣子。

雖然父母親不太支持小佩在非政府組織工作，不過，小佩後來離開婦女團體的原因並非因為父母親反對，而是一方面當年民進黨有釋出職缺；另一方面她認為，就算在團體裡面討論再多可以讓台灣性別平等更進步的主張，但如果沒有跟政黨合作的話，就沒辦法真正的施行，而「那時候又覺得，其實我們在團體的時候，非常、非常需要跟不同的立委跟政黨，大部分是跟民進黨，因為這些比較進步的價值還是跟民進黨這些比較有辦法溝通，有做合作。」小佩說。

因此，就在上述的考量中，她選擇進入民進黨工作，作為她實踐理念的一個管道或工具。然而，小佩跟我說，就婦女團體與民進黨的工作比較起來，雖然兩種工作的薪資報酬都不高，但父母還是比較支持她在民進黨工作：

（進入民進黨工作後）我的父母開心很多，因為情感上他們支持這個政黨，他們也是就是從黨外時期支持。但是因為一樣是普遍低薪的工作，不過因為在情感上有一個認同，所以他們就比較支持。可是我的其他朋友就覺得我一直在做沒有錢的工作，很多人其實沒有辦法想像什麼叫做中央黨部的黨工，是志工嗎？到現在還是有人問，你在中央黨部那有錢嗎？那是志工嗎？尤其因為本黨是一個相對比較弱勢，又比較窮，沒有黨產的黨，所以其實親戚朋友都會覺得我就是沒有在做正式的工作。

⁷⁰小佩確實說出他父親認為「台灣女人年輕就是在賣藥的嘛」的文字，但由於當時訪談並未深刻留意，賣藥指的是何意？因此，在此仍以訪談錄音聽到的說詞呈現於此。不過，整體來說，該段的意思並未受到賣「藥」的意思而有所曲解。

二、跨越世代差異來自共享的生命經驗

從小佩過去的生命經驗來看，似乎不難理解為什麼她會對政治或社會議題，比起其他年輕世代的黨工有更多的熱情或興趣，箇中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首先，在家庭互動方面，如同九〇前世代黨工的例子，除了她的家人會分享過去解嚴前的政治事件給她聽之外，特別是小佩的父親，對於小佩的政治態度與價值觀的傳遞是最為明顯。因為父親要求她們全家人都加入民進黨成為黨員，這個舉動顯示，父親由衷希望小佩也能像他一樣理解與認同民進黨的政治理念。因此，或許可以說，小佩在家庭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父親對於她的政治態度與日後的政治行為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另外，除家庭之外，小佩在大學期間也參與了婦女團體的許多活動，這種參與經驗影響了她日後對於婦女運動的興趣與熱情，而這股熱情或理想，最終因為理念與民進黨相近，後來選擇進入到民進黨的體制之中。在校園中參與了婦女團體，而畢業之後進入婦團工作，這種情形某種程度是與九〇前世代的黨工們，她們過去參與倡議型社團或者日後參與學運的經驗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結果。或許這樣表達不那麼精確，但可以嘗試這樣理解，參與婦運團體之於參與倡議型社團，參與婦運團體的活動之於參與學生運動。

簡單來說，小佩的例子告訴我們，在年輕世代的黨工中仍有可能存在強調政治理念的重要性，也就是對於黨務工作的態度是偏向年長世代黨工的看法。然而，有了這樣的案例，也並非完全否定了世代間存在的認知差異是個假象或不完全的存在。因為不同世代中對於黨務工作的看法，確實存在著大方向的趨勢差異，不過這樣的差異情況，卻可能因為特殊的個人生命經驗而有所不同。

換句話說，年齡世代雖然重要，但也可能被跨越。小佩的例子說明，在世代研究中，「生物性」的年齡世代（即特別強調年齡相仿的族群）雖然重要，但「社會性」的年齡世代也不能被忽視。前者的理論依據在於，在某一特定年齡世代的人，她們所擁有的社會共同經驗，將使符合那個世代年齡的人，特別容易有相似

的認同感。然而，小佩這種跨越所屬世代的人則是，當她擁有不同世代的生命經驗時，就可能擁有不同於原本所屬的世代所應有的世代認同感。

世代的特色強調的就是同一世代的群眾，她們的經驗往往具有普遍的相似性，不過也有少數人會有這種「跨越世代」的生命經驗。屬於年輕世代黨工的小佩，之所以會偏向年長世代看待黨務工作的看法，主要是因為在她的生命經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與年長世代黨工的生活經驗相當類似。這樣的例子，正好也證成了世代中存在的「共同或相似的經驗」，是不同世代產生態度差異的重要因素。

對本研究來說，這種共同或相似的經驗，確切指的就是，兩個世代在看待黨務工作認知的差異時，最大的不同是來自時代背景中，兩個世代群在社運團體，或社會運動參與情況的經驗差異所致。而會跨越世代則是因為小佩有著婦女運動的參與經驗，同時又來自深綠的家庭，種種與年長世代相似的生命經驗，造就了小佩在年輕世代的身體中，有著年長世代的思想靈魂。

總之，從以上的討論可以了解，黨工們看待黨務工作的認知，確實不可能有清楚的認知劃分（即重視工作或理念的二分），因為工作特質中存在的雙重特殊性，使得黨工看待政黨工作，會偏向或傾向某種認知的結果，並無法直接做出認知圖像的切割。同時，工作認知也是一種不斷變動的結果，對工作懷有高度政治參與的黨工，也可能因為長期在政治場域，體會到政治的現實感而減少對政治的熱情，進而往工作的認知態度傾斜（這樣的結果或許不至於對工作認知產生全盤的改變，但工作認知確實也會因此產生些微變化）。

此外，強調世代差異也並非否定世代間不存在的個體差異。世代差異中仍會出現跨越世代的工作認知，這主要是因為如果年輕黨工們的生活或學習經驗，與年長世代黨工越相似，那麼年輕黨工對於黨務工作的認知想像，也就可能越偏向年長世代黨工強調政治熱情的重要或政治理念重過一切（政治參與認知取向）。

第六章 結論

本文透過訪談曾任或現任民進黨中央黨部的女性黨工，試圖從政黨工作者的角度，爬梳與理解「政黨工作」可能存在的認知圖像為何？以及政黨工作者對工作認知的描述是否存在世代間的差異？如果有，則形成世代認知差異的機制又是什麼？這是本文所欲探究的核心問題。

第一節 研究結果

如果一位黨工說，「我從事政黨工作」。那麼，或許許多人的第一個直覺就是他或她從事的是一份「政治」工作。不過，除了「政治」之外，政黨工作還有其他的可能嗎？政治「工作」能否也是安身立命的一份工作呢？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從事政黨工作確實除了有傳統政治參與的概念外，對部分從事政黨工作者來說，政治工作其實還存在一種工作職業的認知取向。

當然，存有這種看法的黨工，她們並非就只是單純的把政治工作一分為二，讓政治的歸政治，工作的歸工作，而是相較而言，工作的特質並非只是一種固定的政治參與認知，政治工作也可能因為其他因素的影響，而使黨工對政治工作的概念也參雜了一般工作的認知。

不過，進一步要問的是，什麼因素可能影響黨工看待政治工作的認知差異？本研究發現，工作認知的圖像改變，是以世代為單位的集體性改變。如同世代研究的理論預設，時代的改變透過經歷不同政治民主經驗以及不同的性別意識氛圍影響，形成了民進黨兩個世代女黨工對工作的認知差異。也就是本研究使用性別世代概念所劃分的結果，九〇前世代黨工對黨務工作的認知是較偏向政治參與傾向；九〇後的黨工世代則傾向較把這份工作當成一般性的工作參與認知。

九〇前世代之所以偏重政治參與的認知，是因為這群黨工們所處的時代背景主要是威權轉型的階段，因此在相對「革命時期」進入黨部的黨工們，看待「政

治」的角度經常是懷有一種高度的價值目標，而這種看法一部分也是來自當時參與政治相較仍是敏感的行為。同時，由於當時的民進黨還是處於「草創時期」，各種的福利保障都尚未制訂完善。因此，面對在政治仍然緊張的「革命時期」以及黨部發展仍然不足的「草創時期」，當時進入民進黨工作者，勢必要有較高程度政治化，才會選擇從事這份工作。

然而，高度政治化如何形成？研究結果顯示，家庭政治社會化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為在這群世代中發現，她們幾乎都是來自政黨傾向「偏綠」的家庭背景。家庭的政黨傾向也造就了年長世代與民進黨連結的一個潛在因素。不過，另一個問題出現，為什麼研究中的年輕世代並沒有像年長黨工一樣多數來自民進黨支持者的家庭背景？也就是成長於在民主化的時代中，仍然有許多人同樣成長於高度民進黨認同的家庭，但民進黨中的新世代似乎沒有同樣呈現出九〇前世代黨工的政黨認同，這之間的不同其實也正突顯時代變遷對黨的組織產生的影響作用。

由於九〇後黨工成長的時代已經是民主時代，此時政治參與已經沒有過去瀰漫著危險或敏感氛圍，「政治」也不再是一種高不可攀的精神價值，而是存在於每個人日常中的生活議題。民眾對「政治」的想像，也就隨著民主制度的落實逐漸與前世代的看法產生變異。時代的遞嬗改變了政治，時代同時也對民進黨的組織制度產生影響，隨著工作條件與環境改變，如薪資待遇優渥、組織專業分工或從事的工作內容較無政治性等，都使傳統政治工作中充滿的政治味被沖淡許多。

也因為如此，此時進入民進黨工作者，也就相較不會受到過去革命或草創時期，需要高度政治認同者加入，取而代之的是擁有更多元價值背景、更多元的專業能力者進入黨部的工作體系。政治化程度的高低或許仍然是從事政治工作者的重要考量之一，然而，不可諱言的是，黨部組織的改造結果一方面影響了黨工看待黨務工作的態度；另一方面也透過改造，重新定義了政治工作者進入政治工作的條件。

世代的差異除了在民主化歷程中，帶來不同的集體經驗，性別意識在不同世

代中，也發揮不同程度的影響。對年長的九 0 前世代來說，由於她們也經歷過性別不平等的時代，因此發展出相較強烈的性別意識，而這些人往往也容易把個人生活與政治選擇連結一起，進而面對政治工作與婚姻時，九 0 前世代往往以政治工作為優先考量，產生對傳統婚姻體制的一種不妥協的結果。因此，這種現象某種程度造成了年長世代為什麼看待黨務工作仍以政治參與的角度審視。

不過，在政治民主化後，不管是對整體社會的大環境還是對民進黨黨內的組織制度來說，「性別」都以不同的形式浮上檯面。透過 90 年代以後的性別平等改革，台灣女性參與政治便不再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在傳統公私領域逐步鬆動的界線下，女性面對「政治」與面對政治「工作」便與前一代有著截然不同的認知圖像。然而，雖然兩個世代面對不同時代的性別經驗有所差異，但兩個世代也並非都截然不同，女性的政治參與在兩個時代中，同樣需要面對一時之間難以撼動的父權文化的隱形枷鎖，即年輕世代同樣需要面對工作與家庭間的兩難問題。

本研究嘗試將民進黨女黨工進行時間世代的劃分，並提出「九 0 前世代」與「九 0 後世代」的差別，透過這樣的劃分方式，除了想對黨工看待黨務工作的圖像有一了解外，同時希望可以協助理解民進黨的發展與台灣歷史脈絡的軌跡。此外，本文強調世代間存在趨勢差異，但也並非否定世代間存在的個體差異，尤其這些個別上的差異案例，背後所形成的因素，或許更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發展

本研究旨在探討民進黨女黨工在面對黨務工作時，是否存在著世代差異的認知？而此種差異化的認知背後又存在何種影響機制？在研究限制方面，由於本研究無法在事前取得所有曾經任職過民進黨事務性黨工的樣本清冊，因此在選擇訪談的對象上，並無法事先透過其他條件的控制篩選出兩個世代的受訪者。因而在受訪者的挑選上，可能較無法掌控受訪者的異質性問題，而使得研究對象的挑選可能產生系統性的偏差，這是本文資料所受到的侷限之一。同時，礙於本研究題旨需涉入政治場域與從事政治工作者對談，然囿於研究者並非是政治工作者，因此在接觸民進黨的過程中，仍有許多受訪者常因政治工作敏感性為由選擇拒訪。這樣的結果將導致本研究找尋或篩選受訪者的特質又增添一道難度。

因此，在時間與研究規模的考量下，本研究最終以兩個世代共十一位受訪者，所蒐集的訪談資料進行分析推論，雖然樣本不多，但受訪者的生命經驗特質仍然可以被信任且仍有其重要的意義象徵。當然，如若能將受訪人數增加，並找到更多元背景的受訪者，那麼應該更能夠確切描繪出兩個世代存在的細部差異。此外，如果未來有後續發展，也能夠加入男性黨工進行訪談，或許能進一步比較兩性在參與黨務工作的認知差異。另外，關於世代的劃分，本文主要以性別世代作為對民進黨黨內黨工世代區分的一個初步嘗試，不過由於世代研究的困境，無法迴避的一點是有過於絕對的問題（楊婉瑩，2011），也就是受訪者相差一年可能在世代的歸類上，就有所差異。或許這部分的問題，在日後可以透過更多經驗性的資料不斷修正與補足。

此外，由於本研究目前所探討的黨工世代為九〇年代前後為劃分依據，但隨著時間的發展，民進黨黨工的成員、組織制度等面向也都會隨之改變，民進黨黨工看待黨務工作的認知，勢必也可能有不同的圖像趨勢產生。對此，若有機會繼續發展該研究題旨，或許除了九〇前後世代的劃分，亦能夠在日後依據不同的時代變化發展，切劃出不同的黨工世代。

附錄一、變數使用與編碼

變數	使用題目	原始分類	編碼方式
加入民進黨原因	V03.1 請問您那時候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加入民進黨的？	1.認同政黨理念 2.可享有多種福利 3.認識新朋友 4.喜愛本黨政治人物（或民意代表） 5.支持政治人物（或民意代表） 6.工作 7.政黨輪替	加入原因六分類： 1.認同政黨理念 2.可享有多種福利 3.認識新朋友 4.喜愛或支持政治人 5.工作因素 6.政黨輪替
人口學變數	使用題目	原始分類	編碼方式
年齡	V15 請問您是民國哪一年出生？	受訪者自由填答	年齡三分類： 1.20 到 29 歲 2.30 到 39 歲 3.40 到 49 歲
教育程度	V16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1.國小及以下 2.國初中 3.高中職 4.專科 5.大學 6.碩士以上	教育四分類： 1.國中以下 2.高中職 3.大學及專科 4.碩士以上
黨齡	V01 首先，請問您加入民進黨有多久的時間了？	受訪者自由填答	黨齡三分類： 1.5 年及以下 2.6-10 年 3.11 年以上
性別	V20 請問您的性別？	1.男性 2.女性	1.男性 2.女性

附錄二、訪談大綱

(開場白) 您好，首先謝謝您答應接受我這次的訪談邀請，訪談問題如果您有覺得題意不清楚的，我可以在為您解釋一次，或者您覺得有什麼不方便回答的也請告訴我，這些問題的回答您可以完全隨著自己的想法意志回應，請勿擔心，訪談之後所有的受訪者資訊我都會依造學術倫理給予妥適保護，再次感謝您。

訪談提綱：(粗體字為訪談研究中提醒自己特別要詢問的問題)

1. 請受訪者介紹自己一些資訊。(出生年、**什麼時候開始從事黨務工作**、負責的業務、是否有暫時離開黨務工作、如已離職，追問當時為什麼會想離開民進黨的工作呢？黨齡多久？)
2. 請問您加入民進黨的工作團隊之前，是否有做過其他行業呢？(有的話是什麼念頭讓您想轉到從事黨務工作？沒有的話為什麼第一份工作就想從到政黨工作呢？加入民進黨工作的動機？)
3. **原本想從事的職業是什麼？對於未來的工作規劃有什麼想法呢？(進一步競選黨內更高的職務嗎？或其他政治規劃？)**
4. 您覺得社會上對於女性參與黨務工作的看法是什麼？您自己又怎麼看？(是否碰過什麼困難？)
5. 您覺得民進黨對待黨工有無性別上的差異呢？(舉例事件)。當工作上遇到性別不平等的事情，您可能的處理方式是怎樣？
6. 在您工作期間內，您認為不同黨主席對於女性是否有不同的對待方式呢？(舉例說明)
7. 您認為從事黨務工作有帶給您什麼好處嗎？
8. 您比較認為黨務工作是一種政治參與，還是只是一份工作呢？(工作的內涵是否跟一般工作有所差別？自己對工作的定義是？)
9. 您認為民進黨身為執政黨或在野黨，對黨工最大的差異影響是什麼？

10. 您家人支持您選擇的這份工作嗎？(如果家人反對,還會在民進黨工作嗎?)
黨務工作和家庭生活有沒有衝突?有的話怎麼處理?
11. 如果您在黨內的工作與您的上司意見看法上有所不同時,您會怎麼處理?(直接接受指示?或者會進行溝通?)那如果在社會上,政府在做決策時,當政治精英和民眾的意見不同時,您認為政府應該怎麼處理比較好?
12. 從您個人的經驗或您聽到對於戒嚴與解嚴的看法,對您來說,最大的影響是什麼?(是否影響您對於政治的看法?)
13. 您覺得對政治方面的事,年紀較大者應該或需要負起更大的責任嗎?
14. 請問您對於社會上有所謂男主外女主內的看法是什麼?{「男人的責任是賺錢,女人的責任是照顧家庭及家人」以及「政治是男人的事,女人最好少管」?}
您覺得職業婦女和家庭主婦的生活,對您而言,比較傾向哪一種生活?(兩者都會讓你覺得生活同樣充實嗎?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看法?)
15. 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台灣社會上的兩性平等發展有什麼看法?兩性之間還有很多不平等嗎?(為什麼?)
16. 從小您的家長會教育您,不要碰觸政治或政黨事務嗎?(可否舉例?)
17. 那您的教育程度是(取得學位、什麼科系)?
18. 婚姻狀況是(結婚與否、是否有小孩)?

追加題目:(訪談中因先前受訪者的回應而產生新的想法,特別新增訪談問題)

1. 有人說,來民進黨工作的女性和一般女性特質有些不同,您的看法是?
2. 就您觀察,您覺得在民進黨執政後,進來黨部工作的人員,會比較把這份工作,比較視為一般工作呢?還是一樣有政治理念或使命?
3. 父母親的政黨認同也是支持民進黨嗎?

附錄三、民進黨中央黨部黨務工作人員服務辦法相關附件

以下資料取自民進黨官方網站，「其他類全部法規」中的黨工服務辦法之相關附件。（網址：<http://www.dpp.org.tw/history.php>）

一、關於工作的進修

教育職訓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黨工到職滿半年，因業務之需要，得申請與業務有關之短期教育職訓。2. 由主管指派參加與業務需要之短期教育職訓者，於上班時間得申請公假，皆需檢附上課證明。3. 黨工個人申請自願參加與業務需要之短期教育職訓者，於上班時間得申請公假但需檢附上課證明，每星期不得超過四小時，非上班時間不得申請補休。4. 申請短期教育職訓不得超過三個月。5. 短期教育職訓之經費由各部門教育訓練預算中支出。
在職進修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黨工到職滿半年，因業務之需要，得申請與業務有關之國內外相關系所在職進修。2. 黨工個人申請自願參加與業務需要之國內在職進修者，於上班時間得申請公假但需檢附上課證明，每個星期不得超過四小時，非上班時間不得申請補休。3. 黨工個人申請自願參加與業務需要之國外在職進修者，進修時間得申請留職停薪，於結業後檢附學分證明並辦理復職。4. 申請留職停薪最長年限不得超過一年。5. 黨工個人參加與業務需要之國內外在職進修者，不得申請補助。

二、關於黨工權益政策的規定

育嬰 留職停薪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黨工於任職滿一年始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2. 黨工之任一子女滿三歲前皆可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每次以不少於六個月為原則，但不得逾二年。3. 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4.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不計入工作年資計算。5. 黨工於育嬰留職停薪間，得與雇主協商提前或延後復職。6.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得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原由黨工負擔之保險費，得遞延三年繳納。
------------	--

	<p>7. 黨工之配偶未就業者不適用，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p> <p>8. 黨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不影響考績或視為缺勤或給予其他不利之處分。</p>
育嬰留職停薪期滿之申請復職	<p>1. 黨工於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後，申請復職時，黨部因下列情形之一得予以拒絕：</p> <p>(1) 黨部依法變更組織、解散者；或黨務工作單位裁撤者。</p> <p>(2) 黨部因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者。</p> <p>(3) 黨部因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黨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者。</p> <p>(4) 其他特殊事故者。</p> <p>2. 黨部因前項各款原因未能使黨工復職者時，應於三十日前通知之，並應依規定發給資遣費或退休金。</p>
哺乳時間	<p>1. 申請哺乳時間適用於女性及男性黨工。</p> <p>2. 黨工於產後一年內有親自哺乳之需要者黨部依法給予哺乳時間。</p> <p>3. 女性黨工貯存母乳供子女食用之擠(集)乳行為，亦視為親自哺乳。</p> <p>4. 哺乳時間視為工作時間不予以扣薪。</p>
工作時間之減少及調整	<p>1. 黨工為哺育三歲以下之子女得以申請每日減少工作一小時或調整工作時間。</p> <p>2. 黨工因哺育三歲以下之子女申請每日減少一小時之工時，不予以核算薪資，其薪資計算方式為：$\text{月薪} - (\text{時薪} * \text{實際上班日數}) = \text{該月份之薪資}$。其年終獎金及年終考績獎金之計算方式，須依實際上班時數之薪資為基準，及應上班時數之比例核算。</p> <p>3. 前項之申請不影響考績或視為缺勤給予其他不利之處分。</p> <p>4. 依兩性工作平等法規定，黨工提出申請時，不得拒絕，但黨部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p>
家庭照顧假	<p>1. 黨工因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申請家庭照顧假。</p> <p>2. 申請家庭照顧假，應檢具相關證明資料或文件。</p> <p>3. 家庭照顧假申請之日數併入事假計算，全年以七日為限。</p> <p>4. 黨工於年度內之事假已請完，則不另行給不扣薪之家庭照顧假。</p> <p>5. 依規定每年事假為五日，家庭照顧假為七日，已申請五日事假者，再申請二日家庭照顧假者需予以扣薪。</p> <p>6. 未申請事假者，於申請家庭照顧假時，超過五日者需予以扣薪。</p> <p>7. 黨工之配偶未就業者不適用此條文。</p> <p>8. 黨工申請家庭照顧假不影響考績或視為缺勤給予其他不利之處分。</p>
生理假	<p>1. 女性黨工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其請假日數併入病假計算。</p> <p>2. 女性黨工於年度內之病假已請完，黨部得不另行給假。</p> <p>3. 黨工申請生理假不影響考績或視為缺勤給予其他不利之處分。</p> <p>4. 女性申請生理假工資照給。</p>

三、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職等薪級表

職等／職稱	行政幹事	副研究員	行政專員	研究員	資深行政專員
(職務加給)	6,500	9,000	9,000	9,000	12,000
職級／薪級	俸點—— 計算本薪之用				
一級	220	290	330	405	435
二級	230	300	340	420	450
三級	240	310	350	435	465
四級	250	320	360	450	480
五級	260	330	370	465	495
六級	270	340	380	480	510
七級	280	350	390	495	525
八級	290	360	405	510	540
九級	300	370	420	525	555
十級	310	380	435	540	570
十一級	320	390	450	555	590
十二級	330	405	465	570	610
十三級	340	420	480	590	630
十四級	350	435	495	610	650
十五級	360	450	510	630	670
十六級	370	465	525	650	690
十七級	380	480	540	670	710
十八級	390	495	555	690	730
十九級	405	510	570	710	750
二十級	420	525	590	730	770
二十一級	435				
二十二級	450				
二十三級	465				
二十四級	480				
每一俸點換	算為新台幣	81元。			

主管加給	
組長	3,000
副主任	6,000

專業津貼	
副研究員（五級以上）	3,000
研究員	5,000
資訊組	5,000

考績	職級調整
優等	晉本俸一級
甲等	晉本俸一級
乙等	留原薪級

職務加給	
駕駛員	12,000

新進黨工初任職級表			
學歷	經驗	初任職級	
高中畢	無	幹事 1 級	
專科畢	無	幹事 5 級	
大學畢	無	幹事 8 級	副研究員 1 級
專科畢	三年	幹事 8 級	副研究員 1 級
碩士	無	幹事 11 級	副研究員 4 級
專科畢	六年	專員 1 級	
大學畢	三年	專員 1 級	
碩士	一年	專員 1 級	
博士	無	專員 11 級	研究員 3 級
大學畢	八年	資深專員 1 級	
碩士	五年	資深專員 1 級	研究員 3 級

1.專員才能出任組長，資深專員才能出任副主任。
2.研究部門之副主任適用為行政職。

四、人事規則：評核項目與分數

評核項目 \ 擬升任之職位	副主任	組長
(一) 計劃、潛能發展	15 分	10 分
(二) 決策、分析能力	15 分	10 分
(三) 自信心、控制力	10 分	10 分
(四) 溝通、合作能力	15 分	10 分
(五) 授權、培養人員	10 分	10 分
(六) 指導、教學能力	5 分	10 分
(七) 屬員紀律、士氣	5 分	5 分
(八) 進取心、持續力	5 分	10 分
(九) 工作態度	15 分	15 分
(十) 工作績效	5 分	10 分
合 計	100 分	100 分

五、評核項目及評核重點

評 核 項 目	評 核 重 點
計劃、潛能發展能力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對設定的計劃，能設立合理的目標與期限（年度及月目標），並有系統達成。 2. 能針對特定目標做全盤計劃、並以長期為著眼點。 3. 能經常提供建設性意見，不斷改進工作程序與方法。 4. 具有潛在管理能力。
決策、分析能力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能及時、廣博收集資料。 2. 能過濾各類資訊、作有系統分析而釐訂合理的決策。
自信心、控制力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有足夠自信接受艱難工作的挑戰。 2. 能在缺乏指示下進行工作。 3. 在工作壓力下，能沉著應變。 4. 遭遇挫折仍能保持樂觀，積極處理問題。 5. 能有效運用現人員、設備及其他資源來達成目標。
溝通、合作能力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對上、下、平行之間，能有效溝通。 2. 能清晰、有條理地表達意見。 3. 能影響並說服他人。 4. 能與別人合作達成任務，且樂於幫助他人。
授權、培養人員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適當的分配工作並授權，促使部屬達成工作目標。 2. 願培育具潛力或可塑性高的屬員。
指導、教學能力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具有專業知識及技能。 2. 能有效傳授及技能。

	3. 能激勵部屬、引導完成任務。
屬員紀律、士氣	1. 肯學習、以增進知能。 2. 主動、積極地推動工作。 3. 工作上體能負荷情況程度。
工作態度	1. 對所屬機構忠心並保守業務秘密。 2. 能接受批評與建議。 3. 對工作熱忱。 4. 環境改變能隨即適應。 5. 能正確判斷並處理突發事件。
工作績效	指能達成自我設定的目標，如期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其工作的質、量與效果均能達到要求。

六、關於加班規定

加 班 規 定	
1.	黨工於規定上班時間外，經主管指派延長工作者，在部門預算許可下得申請加班費或加班補休。
2.	黨工加班，應由各部會主管視業務需要事先核實指派，簽請各部門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
3.	黨工加班，除專案外，平日每人每日以四小時為限；假日每人以十二小時為限；每月以四十六小時為限。
4.	黨工於加班結束，得視工作狀況及時間簽報加班費或加班補休，呈請各部門主管裁示後辦理。
5.	午休時間(一小時)不得申請加班費或加班補休。
6.	黨工外勤加班未能取得刷卡記錄者，得核發津貼補助。津貼核算方式如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加班二小時(含)以內發放津貼 400 元整；四小時(含)以內發放津貼 800 元整。 (2) 假日外勤加班超過四小時者，每滿一小時加發 200 元整，每日最高發放 2000 元為限。 (3) 申請津貼補助之加班時數不計入每月加班時數限制。

參考文獻

一、 中文文獻

- 王名駿，2005，〈女性菁英政治參與之分析—以第五屆女性立委為例〉，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王靖興、王德育，2007，〈台灣民眾的政治參與對其政治功效意識之影響：以2004年總統選舉為例〉，《台灣政治學刊》，11(1):69-107。
- 王雅各，1999，〈婦女解放運動和二十世紀的性別現象〉，《性屬關係上 性別與社會、建構》，王雅各主編，台北：心理出版。
- 王雅各，1999，《台灣婦女解放運動史》，台北：巨流圖書出版。
- 包正豪，2009，〈台灣地區民眾領袖情節的世代差異〉，《選舉評論》，7:45-68。
- 呂秀蓮，2000a，《新女性主義》，台北：前衛出版。
- 呂秀蓮，2000b，《重審美麗島》，台北：前衛出版。
- 李淑君，2013，〈性別民主與認同轉向—從兩本女性自傳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1:121-161。
- 吳重禮、鄭文智、崔曉倩，2006，〈交叉網絡與政治參與：2001年縣市長與立法委員選舉的實證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8(4):599-638。
- 吳泉源，1997，〈反對運動與新政治文化的形塑：一個社會民主的觀點〉，載於《民主鞏固或崩潰 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游盈隆主編，台北：月旦出版。
- 周碧娥，1999，〈台灣婦女與政治：1985-1994〉，載於《性屬關係上 性別與社會、建構》，王雅各主編，台北：心理出版。
- 林瓊珠，2011，《台灣政黨持續與變遷：參與度（2/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 NSC 99-2410-H-031-019-MY3。
- 范 雲，2003a，〈政治轉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動者及其生命背景為核心的分

- 析取向》，《台灣社會學》，5:133-194。
- 范雲，2003b，〈連結運動者與變動的政治機會結構：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個案研究〉，載於《兩岸社會運動分析》，張茂桂、鄭永年主編，台北：新自然主義。
- 范雲，2010，〈靜默中耕耘細節的婦運革命〉，載於《秩序繽紛的年代 走向下一輪民主盛世：1990-2010》，吳介民、范雲、顧爾德主編，台北：左岸文化出版。
- 唐文慧、王怡君，1999，〈女性參政者之角色扮演與政策議題—以 1998 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29:75-116。
- 陳淑蘭，2010，〈宜蘭縣菁英女性之政治參與—性別角色階層化觀點〉，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徐子軒，2009，〈不理性的平衡？—重新審視美國在 1995-96 年間台海危機的軍事干預行為〉，《東吳政治學報》，27(1):155-198。
- 陳光輝，2010，〈民主經驗與民主價值—兩個世代台灣大學生之比較〉，《台灣民主季刊》，7(4):1-45。
- 陳陸輝，2010，〈政治文化與政治社會化〉，載於《政治學》，陳義彥主編，台北：五南出版。
- 陳文俊，1997，〈大專學生的政治學習〉，載於《政治社會化與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大（專）學生的政治態度與價值之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
- 張茂桂、鄭永年，2003，〈導論〉，載於《兩岸社會運動分析》，張茂桂、鄭永年主編，台北：新自然主義。
- 張晉芬，1995，〈綿綿此恨，可有絕期？—女性工作困境之剖析〉，載於《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 年》，劉毓秀主編，台北：時報出版。
- 郭正亮，1998，《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文化出版。
- 梁雙蓮、顧燕翎，1995，〈台灣婦女的政治參與—體制內與體制外的觀察〉，載

- 於《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年》，劉毓秀主編，台北：時報出版。
- 盛杏媛，2010，〈政治參與〉，載於《政治學》，陳義彥主編，台北：五南出版。
- 彭芸，2001，〈2000年總統大選的媒介使用、選舉參與及投票對象〉，《選舉研究》，7(1):21-52。
- 崔曉倩、吳重禮，2011，〈年齡與選舉參與：2008年總統選舉的實證分析〉，《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26:7-44。
- 黃紀，2009，〈調查研究設計〉，載於《民意調查新論》，游清鑫主編，台北：五南出版。
- 黃桃芳，2005，〈台灣選民選舉參與之研究：總體與個體資料的結合〉，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黃長玲，2001，〈從憲法保障名額到性別比例原則—兩性共治的理論與實踐〉，《問題與研究》，40(3):69-82。
- 楊婉瑩、劉嘉薇，2006，〈探索性別差距的不同型態—以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為例〉，《東吳政治學報》，23:115-156。
- 楊婉瑩，2007，〈政治參與的性別差異〉，《選舉研究》，14(2):53-94。
- 楊婉瑩，2011，〈台灣婦運與世代價值差異〉，《政治科學論叢》，49:161-196。
- 游清鑫、蕭怡靖，2007，〈以新選民的政治態度論台灣民主政治的未來〉，《台灣民主季刊》，4(3):109-51。
- 游清鑫，2010，〈政黨與政黨制度〉，載於《政治學》，陳義彥主編，台北：五南出版。
- 游盈隆，1997，〈民主鞏固與台灣憲政體制的選擇〉，載於《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游盈隆主編，台北：月旦出版。
- 鄧丕雲，1993，〈三月學運（一）導論〉，《八〇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台北：前衛出版。
- 劉義周，1993，〈台灣的政治世代〉，《政治學報》，21:99-120。
- 薛化元，2010，〈學生運動與政治改革—從三月學運談起〉，《新智庫世紀論壇》，

49:71-75。

鍾年晃，2001，《失落的民進黨》，台北：商智文化出版。

蕭阿勤，2005，〈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一九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9:1-58。

二、 英文文獻

Andersen,K. (1975). Working Wome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3):439-453.

Abbott,P. , Wallace,C. and Tyler,M.(2005)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Feminist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Braungart, R.G. and Braungart, M.M.(1985).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Studying Life Course and Generational Politics.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1,269-304.

Banaszak, L.A.(2006). "An Introduction to the U.S. Women's Movement in Global Perspective." In Banazak, Lee Ann. Ed. *The U.S. Women's Movement in Global Perspective*. Oxford Press.

Brennan,T. and Pateman,C.(1998). " 'Mere Auxiliaries to the Commonwealth': Women and the Origins of Liberalism." In Anne Phillips. Ed. *Feminism and Equalit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Carroll,S.J. and Zerilli,L.M.G.(1993). " *Feminist Challenges to Political Science.*" In Ada W. Finifter 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I*. Washington,D.C.: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onway,M. M.(1991). "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 Washington,D.C. Press.

Chou,B.. Clark,C.,Clark,J. (1990). "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Women in Taiwan Politic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Evans, J. A.J.. (2004). *Voter & Voting: An Introduction*.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 Edmunds, J. and Turner, B.S. (2002). *Generations, Culture and Society*.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Jennings, K.M.(1982). Residues of a Movement: The Aging of the American Protest Gen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81,368-382.
- Jennings, K.M. and Niemi, G.R.(1974).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Adolescence: The Influence of families and schools*. Princeton Press.
- Jones, J.(2004) “*Rethinking Civic Engagement in the Age of Popular Culture.*” In *Entertaining Politics: New Political Television and Civic Cultur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Lovenduski, J. and Norris, P.(1993). *Gender and Party Politics*. Thousand Oaks,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
- Lamprianou,I.(2013).”Contemporar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search: A Critical Assessment.” In Demetriou, Kyriakos N. Ed. *Democracy in Transi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nsbridge, J.(1999). Should Blacks Represent Blacks and Women Represent Women? A Contingent “Y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61(3),628-657.
- MacKinnon, C. A. (1989). “*The Liberal State*” In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D.(1988).*Freedom Summ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ris,P. (1997).”Introduction: Women, Media, and Politics.” In Pippa Norris. Ed. *Women, Media, and Politics*. Oxford Press.
- Okin,S.M. (1998).”*Gender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In Anne Phillips. Ed. *Feminism and Politics*. Oxford Press.
- Pateman,C. (1987). “*Feminist Critiques of the Public/Private Dichotomy.*” In Anne

- Phillips. Ed. *Feminism and Equalit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Rosenstone, S.T., Hansen, J.M. (1993).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 Schneider, B.E. (1988). Political Generations in Contemporary Women's Movement. *Sociological Inquiry*, 58, 4-21.
- Schnittker, J., Freese, J. and Powell, Brian. (2003). Who are Feminists and What do they Believe? The Role of Gener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4), 607-622.
- Schuman, H and Scott, J. (1988). Generation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3), 351-381.
- Smith, E. (1999). The Effects of Investments in the Social Capital of Youth on Political and Civic Behavior in Young Adulthood: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Political Psychology*, 20(3), 553-580.
- Stacey, J. (1993). "Untangling Feminist Theory." In Diane Richardson and Victoria Robinson. Ed. *Introducing Women's Studies*. Macmillan Press.
- Tolleson-Rinehart, S. and Carroll, S.J. (2006). Far from ideal: The Gender Politics of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4), 507-514.
- Whitter, N. (2006). "From the Second to the Third Wave: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Grassroots Feminism." In Banazak, Lee Ann. Ed. *The U.S. Women's Movement in Global Perspective*. Oxford Press.
- Welch, S. (1977). Women as Political Animals? A test of some explanations for Male-Femal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iffer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1(4), 711-730.
- Westholm, A. (1999). The Perceptual Pathway: Tracing the Mechanisms of Political Value Transfer across Gener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20(3), 525-552.
- Verba, S., Schlozman, K.L., and Brady, H.E.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4th ed. Harvard Press.

Verba, S. and Nie, N. (1972).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Voet, R. (1998). "Debates on Feminism and citizenship." In *Feminism and Citizenship*.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Young, I. M. (1989). Polity and Group Difference: A Critique of the Ideal of Universal citizenship. *Ethics*, 99(2), 250-274.

Young, L. (2000). *Feminists and Party Politics*. Columbia Press.

Zukin, C., Keeter, S., Andolinam, M., Jenkins, Krista., and Delli Carpini, M. X. (2006). *A new Engagemen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ivic Life and the Changing American Citizen*. Oxford Press.

三、 網路參考資料

民主進步黨官方網站，<http://www.dpp.org.tw/index.php>，(查詢日期：2012年12月27日)。

中國國民黨官方網站，<http://www.kmt.org.tw/index.aspx>，(查詢日期：2014年6月16日)。

中央選舉委員會，<http://db.cec.gov.tw/histMain.jsp?voteSel=20120101A1>，(查詢日期：2012年12月27日)。

林楠森，2012，〈台灣總統選舉公布最後民調和預測〉，BBC 中文網新聞，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01/120103_tw_election_poll.shtml，(查詢日期：2012年12月27日)。

李欣芳，2012，〈蘇：設中國事務部 就是善意〉，自由時報電子報，<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jul/26/today-p3.htm>，(查詢日期：2013年4月1日)。

李元貞，2000，〈台灣婦運及其政治意涵〉，婦女新知網站，

http://www.awakening.org.tw/chhtml/topics_dtl.asp?id=91&qtagword，(查詢日期：2013年4月12日)。

葉菊蘭，1998，〈選戰，男女有別?!〉，第三屆全國婦女國是會議論文集，

<http://taiwan.yam.org.tw/nwc/nwc3/papers/forum214.htm>，(查詢日期：2013年4月23日)。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http://www.pwr.org.tw/about0.html>，(查詢日期：2013年4月23日)。

